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共和国之战

 **eBOOK**
网络资源 免费下载

第一部 金门之战失利揭晓

(1) 捷报声中，叶飞说：“此役必胜！”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此刻，分布在全国各地的国民党残兵败将总人数仍有200多万人，分为7个主力集团，主要分布于东部沿海地区、中南地区和西南地区，台湾及东部沿海地区已成为国民党最主要的战略基地。国民党海空军的200多艘舰艇和300余架作战飞机也部署于此。

早在1949年5月，我人民解放军解放上海总攻的前一天，毛泽东主席和中央军委就指示三野总部：“解放上海之后即可迅速进兵东南，提早入闽。”所以，我10兵团在解放了上海之后，很快就撤出上海，集结于苏州、常熟、嘉兴一带作短暂休整，进行紧张的入闽作战准备。

一时间，东南沿海成了整个世界为之关注的热点。

在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之前，中央军委尚未将解放台湾问题纳入行动计划。南京城解放之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根据国民党兵力部署的现实，决定立即研究解放台湾的问题。中央军委研究后认为，解放台湾，首先需要解决二大问题：一是迅速建立一支近期可以使用的空军；二是扫清屏护台湾的外围，占领攻台出发阵地。

7月10日，毛泽东致信周恩来，认为：“我们必须准备攻台湾的条件，除陆军外主要靠……空军。二者有一，即可成功，二者俱全，把握更大。我军空军要压倒敌人空军，短期内（例如一年）是不可能的。但仍可考虑选派三四百人去远方学习六至八月，同时购买飞机组成一支攻击部队……”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空军司令员刘亚楼提出了一个比毛泽东原设想更大的计划：通过向苏联人购买作战飞机和突击培训飞行员。一年内建成一支较国民党空军略占优势、拥有300-500架作战飞机的人民空军部队。这一计划得到了毛泽东的同意。

解放台湾前的另一项重要任务就是扫清屏护台湾的外围，占领攻台出发阵地。为此，第三野战军陈毅司令员将其属下的15个军、60多万人的4个兵团进行了战略划分：将第24军调往山东攻击由美军和国民党联合驻守的青岛；第7兵团准备解放舟山群岛；第8兵团警备宁沪杭地区并进行剿匪；最强的主力第9兵团在苏南休整训练准备用于以后的渡海攻台；第10兵团则负责进军福建，占领攻台出发阵地。我10兵团向福建沿海挺进后，捷报频传：8月17日，解放福州，歼灭国民党2个军9个师共3万9千人。福州解放后，国民党军的一个团逃到闽江口的马祖岛据守。

9月中旬，我10兵团28军，几乎未经激烈战斗，就轻松地解放了福建沿海最大的岛屿平潭岛以及大、小练岛、南日岛、湄州岛，歼灭守岛国民党部队9000余人。

10月15日，我10兵团开始渡海攻击厦门，经过两天两夜浴血奋战，于10月17日上午9时，全歼了国民党厦门的守军27000余人，为我军渡海作战写下了成功的第一页。

厦门大捷对10兵团特别是叶飞司令员是一次巨大的鼓舞，叶飞司令员应厦门市委的请求，命令10兵团兵团部由同安渡海进驻厦门，协助厦门市委

主持接管工作，并命令兵团后勤部在 10 月底以前，筹措大米 400 万斤，柴草 600 万斤，以保证部队和厦门市民的生活供应，攻击金门的战斗交由第 28 军前指执行。

素有“小叶挺”之称的叶飞司令员，由于被繁杂琐碎的地方工作牵制了大部分精力，而未能像过去历次战役一样，亲自分析、检查、准备，而且被胜利喜悦激励着的叶飞司令，竟以如下不切实际的理由说服了对这一决定有担心的韦国清政委的疑问：“你太多虑了，我的大政委，厦门是敌人有永久性设防工事的要塞，守军是号称‘小白崇禧’的汤伯恩集团，兵力充足，有海空军支援，已被我军攻克；而金门岛弹丸之地，又没有什么坚固工事，守军名义上是一个兵团，实际上不过 20000 残兵败将，说实话，要不是蒋介石严令固守，李良荣早在我军攻克厦门之际就弃岛南逃了。我用一个主力军加 29 军的两个主力团攻金，已是富富有余了。再说原作战部署本来就是由 28 军攻金的嘛，没有必要再改变部署，我还是那句话：此役必胜！”

（2）粟裕提醒三点事项。

进攻金门的任务由我 28 军 82 师全部、84 师 251 团、29 军 85 师 253 团及 87 师 259 团共 6 个团的兵力担任。

28 军是 1947 年 4 月由原八路军山东渤海军区的地方武装升级组建的华东野战军第 10 纵队发展起来的。

29 军原是 1945 年 11 月由原新四军苏中地方武装建立起来的第 7 纵队，1947 年初升为华东野战军第 11 纵队，主力北撤山东后留在苏中敌后进行游击战争。

在解放战争中，28 军脱颖而出，以善守称著；29 军以前缺乏打大仗的锻炼，在进攻上海时，三野的首长有意将其布列于主攻方向，使其积累一些经验。总的说来，这两个军的官兵已具备了攻坚作战的能力，但这两个军和全军其他部队一样，没有两栖作战的训练，而且，被胜利激励着的部队也没有对两栖作战的困难进行充分的论证，更为严重的是，指战员们根本不了解潮汐、船舶等因素在两栖作战中的影响力。

国民党驻守金门岛的是第 22 兵团第 5 军和第 25 军以及刚从台湾调来的第 201 师，拥有 8 个团 2 万人。其中，第 5 军原是国民党的“五大主力”之一，不过，第 5 军的老部队已在淮海战役中全军覆没，现在的第 5 军是其残余及征招新兵而重新组建的，且在厦门战役中，其 166 师已基本被歼，剩下的第 5 军军部和第 200 师约 30000 余人据守在小金门。第 25 军是一个屡战屡败的部队，早在淮海战役第一阶段，该军即被歼于碾庄，后在福建重新建军，又在我进攻福州的战斗中基本被重歼，残部逃到金门时仅缩编成一个团，之后，国民党空军又将机场警卫部队偏成 40、45 两个师，与原 25 军残部一起重新成立了 25 军。

刚刚从台湾调至金门的第 201 师是原青年军部队，是抗日战争末期蒋介石以“十万青年十万军”为口号组织起来的，其待遇、装备均较其他部队优越，被蒋介石视为心腹嫡系。

此外，金门岛还有一支装甲部队，即国民党战车第 3 团第 1 营，该营于 1949 年初组建，其主要成员均是从双堆集包围圈和华北战场上逃回的装甲兵人员，该营拥有重 15 吨，配置一门 37 毫米炮的美制 M5A1 坦克 21 辆，是反登陆作战强有力的力量。

战前分析，国民党在大金门岛和小金门岛各驻军 17000 和 3000 人，其

中，新兵又占多数，只有 201 师和战车营是较有战斗力的部队。当时，金门岛上虽然抢修了一些防御工事，但这些工事防御能力并不强大，多是成一线配置的野战土木工事。

28 军前指受命攻金后开始了渡海作战准备工作。然而，由于国民党从大陆沿海撤退时，对渔民的船只大肆破坏和掠夺，所剩渔船寥寥无几。这使我军准备渡海作战船只发生困难。直到 10 月 24 日才搜集到集中一次可航渡 3 个团约 8000 人的船只，这离 10 月 18 日下达的进攻金门作战的部署命令的总攻时间——10 月 20 日已推迟了 4 天。

10 月 18 日下达了作战部署命令，其时，兵团包括叶飞司令员在内的不少领导到达厦门才 4 天时间，命令要求：以我 28 军 82 师全部、84 师 251 团、29 军 85 师 253 团及 87 师 259 团共 6 个团的兵力分两个梯队进攻，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动作直插小金门。这一命令所要求准备的船只实际上直到真正发起总攻时也未完成。

由于无法筹措到一次性渡运 6 个团部队的船只，第 28 军前指作出了如下一个过于理想化的预想：第 1 梯队登陆 3 个团，纵使有部分损失，船只返回时第 2 梯队、第 3 梯队还可以再航渡 3 个团，这样总共可有 6 个团大约 13000 人登陆。

这预想未料到这些新筹措的船只的船员大多是外地人内航道不熟，又未经统一施训，故指挥调度十分困难。也未考虑敌情和海情的变化，敌人随时可能的增援，更未考虑国民党海、空军较为强大的作战能力。况且，在厦门之战结束时，金门守军已经得到了胡璉兵团 18 军的增援，岛上国民党总兵力已达 30000 人。

国民党总部不仅命令胡璉兵团 18 军增援金门岛，而且还不断派兵增援，这一态势已为 10 兵团领导所觉察。当解放金门的计划上报到主管华东野战军作战事宜的粟裕副司令那里时，粟裕曾特别强调了如下三点：（1）以原敌 25 军 108 师 12000 人计算，只要增敌 1 个团也不打；（2）没有一次载运 6 个团的船只不打；（3）要求苏北或山东沿海挑选 6000 名久经考验的船工，船工不到不打。然而，过于轻敌的 28 军领导和 10 兵团领导却轻率地认为，只要能在大规模增援之敌还未立稳脚跟前攻占小金门，就能赢得战役的胜利。叶飞司令员在胡璉兵团已到达金门岛时仍以为胡璉兵团还在海上徘徊，认为此刻发起登陆进攻是一个战机，如有延误，金门的情况很可能发生变化。于是，在未审核 28 军作战命令的情况下，召集兵团作战处长、情报处长和福建省有关人员仅凭 28 军的一纸电报进行研究，仓促地批准了第 28 军于 24 日晚攻击金门的战斗。

（3）第一梯队仓促登陆。

一场并没有经过细致研究，又缺乏渡海船只的两栖作战就这样在 24 日晚 7 时开始了。

28 军第 1 梯队登船完毕后，军前指曾一度犹豫，再次向兵团请示：是否按原计划行动？而怀着捕捉战机的兵团领导传来不容变更的指示：决心不变！

24 日深夜潮涨之时，由 28 军 82 师 244 团、84 师 251 团和 29 军 85 师 253 团组成的进攻金门第一梯队分别从蓬河、大橙岛、后村等地启航，原计划中的 82 师指挥所因船少而未参加第一梯队的登陆作战，由于渡海前各部队没有进行协同演练，所以，登陆船队一离开码头，即与上级指挥所失去联

系，而且在航渡中遭到国民党炮火拦截时，登陆船队间又缺乏协同作战的经验，一些船只已在航渡中被打散。

尽管如此，我第一梯队的3支登陆部队在25日凌晨2点分别登陆成功。左翼244团在金门岛蜂腰部北岸琼林、兰厝间登陆成功，抓获国民党官兵100余人，占领了敌十多个碉堡；中路的251团先头营在金门岛西北部的安歧以北、林厝以东顺利登陆后，后续营的登陆却遭到敌炮火的猛烈袭击，伤亡近三分之一；右翼253团在西北角的古宁头、林厝间顺利登陆后，随即向敌发起进攻，于拂晓前攻占了古宁头滩头阵地。

我第一梯队登陆是较为顺利的，但除了右翼的253团3营巩固了团的登陆场外（后来的事实表明，253团3营巩固的登陆场，为整个登陆部队后来坚持3昼夜的抗击创造了极为基本的条件），3支登陆部队没有统一的指挥，在“有几个人打几个人的仗，不等待，不犹豫，向里猛插”的战术思想支配下，兵分几路向纵深处猛插狠打，在突破了敌第一道防线之后，于拂晓前攻至西山、观音亭山、湖尾、湖南高地及安歧、埔头一带，之后，又乘胜向敌第二道防线发起了猛烈的进攻。

第一梯队登陆成功之前，28军前指已分别安排了3名军部参谋负责组织船队返航。临行前，28军副军长握着3位参谋的手说：“你们别无其他任务，你们的任务就是组织和督促船队抵滩登陆后迅速返航，切记！切记！一定要迅速返航！”可是，登陆部队成功登陆之后，船队却没有返航。

原来，第一梯队船只登陆时，在早晨2点钟左右，是涨潮的最高峰，国民党军原先设在海滩的障碍物多被潮水覆盖，许多船只冲到障碍物的上面，船底被挂住了，部队被迫在障碍物中下水，而船只却一时难以动弹，加上当时敌人的火力较猛，船工们纷纷躲避，各船抵滩也有先有后，3位参谋的叫喊声被巨大的枪炮声淹没了，只有等待我军攻占了滩头阵地后，才能将到处藏身的船工召回返航。可谁也没有想到，我军还未站稳滩头，大海就已开始退潮，而且退得极快，当三位参谋发现退潮时，潮水已经退到10米开外。

这几十艘返航的船只在离开金门岛时，就遭到敌滩头的排炮袭击，不少船只被击沉、击伤，后来，船队又遇到了国民党海军军舰的拦截，从古宁头返航的船队又莫名其妙地误驶入敌军舰潜伏区，后又被我军情报船误为国民党的增援船队，而后竟离奇地被我军布置在厦门湾、石码一线的远程炮群全部击沉。

25日上午6时，萧锋副军长，85师师长兼政委朱云兼政委等心急如焚，已经放亮的天空一片惨烈的景象留下了：指挥员们隔海看到了在敌军轰炸和炮击中燃烧的船只，原定运送11000人登岛作战的第二、第三梯队计划已经难以实施。无可奈何之中，他们向兵团领导请求援助。请求立即派船只支援，可此时哪里还有什么船只？

（4）老蒋不惜代价守金门。

我军的强打猛攻给国民党的守军以极大的杀伤，为了保住台湾岛的前沿阵地，为了给台湾岛留下一个屏障，蒋介石决定不惜一切代价守住金门岛。

25日凌晨4点，国民党海防第二舰队司令黎玉玺少将受命率舰队旗舰“太平”号自澎湖基地开往金门岛增援。黎玉玺到达金门之前，已令驻守金门岛的国民党海军进行海上封锁，敌202号扫雷舰、“南安”舰驶入古宁头西北岛沙水道，炮击我登陆部队，而“楚观”、“联铮”、“淮安”等舰和“203”

号扫雷艇、“15”、“16”号炮艇等则开至大小金门之间，守护大金门的四侧后方。

蒋介石在派海军封锁海面的同时，于25日凌晨4点30分派胡璉兵团的18军118师、19军14师、18师52团和11师的一个团在坦克和炮兵的配合下从料罗湾登陆。当时，解放军登陆部队离滩头阵地已达十多里路，胡璉看到这一情况，下死命令将该兵团主力18军投入战斗，来了个反包围，又派迂回部队占领了解放军滩头阵地，切断解放军后撤的退，并用炮火将解放军登陆部队因潮水退却而搁浅的船只全部击毁。

解放军244团团长刑永主带领全团战友一直顽强战斗到25日中午12点，在全团官兵大多牺牲的情况下仍坚守阵地。251团的主力则一直与敌激战到3点。之后突出重围，与古宁头的253团回合。

251团副团长冯绍堂带领固守林厝的两个班的战士，苦战了整整9个小时，打退了敌人的7次进攻，后来，为保存实力，主动突围到古宁头，与253团会合。我三支登防部队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一齐会合至古宁头与敌激战。整整一天一夜，我官兵滴水未进、粒米未入，而数倍于我的敌人则仗着人多势众、不断地轮换着包围解放军登陆官兵，就这样，战斗一直坚持到25日的黄昏，官兵们借助于夜幕才又赢得一个有利的作战时机。至此，解放军3个团的登陆兵力已损失半数以上，据岛上步话机的报告，第244团仅剩700多人，第251团剩下1200多人，第253团剩余人数较多，但弹药却十分缺乏，而国民党军队在黄昏前又投入较多兵力，企图将解放军首批登陆部队全歼于古宁头，后被解放军借助夜幕打退。

整个金门岛战役，10月25日晚至26日天亮前的一夜是决定整个战斗成败的关键一夜，关于这一夜的重要性，国民党第19军军长刘云瀚于1980年1月在台湾出版的《中外杂志》上发表了题为《追述金门之战》的文章中写到：到了10月25日入夜以后，成为最危险的一夜。因为我军经过了整天激战，所有的控制部队都投入战场，除伤亡相当大外，且多感疲劳，……甚至胜负之数还未易言。幸好由于匪军没有船只，无法继续航渡来援，所以我们能够平安渡过这最危险的一夜。

（5）弹尽粮绝全军覆没。

当时，面对隔海的金门岛我10兵团和28军前指的指挥员心急如焚。10兵团领导机关一面研究作战对策，一面再度派人搜罗船只。虽经多方努力，所汇集的船只只够截运4个连的兵力。28军前指的领导认为，以如此少的兵力“添油”式的增援，于事无补，还不如派船去尽量多撤退一些人回来。可兵团领导这时仍求胜心切，认为还有挽回局面的一线希望，基于此，28军前指决定由已内定为82师副师长的第246团团长孙玉秀率该团2个连及85师的两个连增援金门第一梯队登陆部队，并决定由孙玉秀负责整个登陆部队的指挥。

25日夜间，国民党部队最为担心的就是解放军进行后援，因而派飞机在海面上巡逻，并投掷了大量的照明弹，“太平”号旗舰也率两艘炮艇往返巡行于古宁头以北的海面上，拦截一切从大陆来的船只，并不断向大陆及古宁头方向炮击。

面对如此困境，孙玉秀带领4个连的官兵，不顾炮火袭击，机动灵活，利用夜幕的掩护躲过了国民党海空军的巡查，终于在25日凌晨3时分别在湖尾乡和古宁头登陆成功。

4个连分成两部分，从湖尾乡登陆的是孙玉秀带领的246团的2个连，他们一登陆即歼灭了国民党军1个营，随后又向双乳山一带推进，并积极与第一梯队取得联系。从古宁头登陆的85师259团的2个连，一上岸就走进被国民党部队封锁了的区域，他们只得利用火力占领了几个碉堡，然后依据这些碉堡顽强抗击了整整一天；打退了国民党部队的一次次进攻，直到26日夜间弹尽粮绝而失利。

26日凌晨，我第二梯队登陆的孙玉秀与第一梯队登陆部队取得了联系，当时，第244团团团长刑永生、第251团团团长刘天祥和第253团团团长涂博都向军前指报告，说部队受到很大鼓舞，并一致拥护孙玉秀统一指挥。

在孙玉秀的带领下，246团的两个连很快突破了敌人的封锁，来到古宁头，与第一梯队会合，不过，由于第二梯队增援人数实在太少，众寡悬殊且四面受敌而无法改变战局。

26日，是我进攻金门岛将士极为悲壮的一天，天亮后，岛上的情况急剧恶化，经过休整的国民党驻岛主力部队又一次在海空军的掩护下向古宁头、林厝、埔头一带猛烈反扑，据当天上午接到登陆部队川来的报告称，我251团、253团现存人数不过数百人。

26日上午，国民党第12兵团司令胡璉赶到金门，和汤恩伯等一起到前线督战。国民党步兵对古宁头久攻不克，胡璉、汤恩伯等要求台湾派飞机对村中建筑猛轰狂炸，再用坦克炮和火箭筒逐一抵近民房射击，即使如此，在我军顽强的巷战、肉搏战的坚持下，敌3个师的兵力经过整整一天反覆冲击，也未能冲破我军的阻击。

26日深夜，早已弹尽粮绝，两昼夜未进粒米的我登陆部队已难以支持，孙玉秀、刑永生、刘天祥、田志春、涂博华、陈立华在一个山沟里举行了临时作战会议，鉴于我军登陆的10个营已伤亡5000多人、已没有完整的连和营，决定将所存部队分为几股打游击，同敌人周旋到底。

22时，28军前指在毫无办法可施的情况下，电告我登陆部队，为保存最后一分力量，希望前线各级指战员机动灵活，从岛上各个角落，利用敌人或群众的竹木筏及船只，成批或单个越海撤回大陆，我们沿海各地将派出船只、兵力、火器接应刘抢救撤回的人员。

26日深夜之后，28军前指与登陆部队的联系逐步中断。27日凌晨，我253团团团长徐博来电说，该团1营600多官兵已在古宁头全部牺牲，剩余的150多人和244团的70多人正准备到海边找船，这是253团最后一次来电，之后！

就音讯杳无了。251团团团长刘天祥最后一次同军前指通电话说，我的生命不长了，为了革命没二话，祝首长好。新中国万岁！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刘团长的话还未说完，耳机内传来一阵爆炸声，刘团长光荣牺牲了。

26日午夜，我登陆部队在夜幕的掩护下向北突围，在海边寻船未获的情况下向东南方向转移，准备到山区与敌人长期周旋。以等待后续部队的到来。到27日下午，这部分官兵被敌发现，随即突围至双乳山附近，再度与敌遭遇，激战中，我官兵边战边再次完成突围。

然而，我完成突围的官兵遭到了国民党海军军舰的炮击，这些军舰绕到古宁头北面海上，用舰炮向地面炮火射击不到的死角轰击，在敌海陆武器的夹击下，我有武器的官兵一直战至牺牲，没有弹药的官兵被俘，至27日上午10时，金门战斗基本结束。

金门战斗结束后，我少数突围成功的官兵仍坚持在山区打游击战，一直到 28 日下午，我军官兵仍在山崖、浅滩处与敌军周旋，在 246 团团长沙玉秀的带领下，悄然到达沙头，遗憾的是，在沙头附近再度被国民党军队包围，在突围无望的情况下，孙玉秀负伤后自尽，其余战士全部被俘。我 244 团团长沙永生负重伤后被国民党军队包围，被俘后不久即牺牲。我 251 团团长沙天祥牺牲后，政委田志春率 50 人打游击，终因弹尽粮绝被俘。我 253 团政委陈立华在打游击中被包围，战至最后牺牲。另据台湾出版的战史称，253 团团长沙博隐蔽在山洞一个多月，靠夜间出来到农田中挖番薯过活，后经国民党部队反覆搜山而被俘。

至此，我登陆部队包括船工、民夫在内的 9086 人，无一个投降，除部分被俘外，大都壮烈牺牲。据我军战后得到的消息，国民党军总计伤亡 9000 余人。

(6) 叶飞含痛请求处罚。

金门之战的失利，引起了全军、全国震动，这次失利在我军战史上也是极其罕见的，过去战史上几次失利如长征中的湘江之战、红军西路军的失败及皖南事变损失人数也不少，但却没有一次全军覆没，而这一次，却损失了全部投入作战的 3 个团 9000 多人，竟成建制覆没。

金门失利后的第二天，28 军副军长萧锋和政治部主任李曼村面色惨白、失声痛哭地来到兵团叶飞司令员的办公室，叶飞司令员惨痛地对他们说：“哭什么，哭解决不了问题，现在你们应该鼓励士气，准备再攻金门。这次失利，我身为兵团司令员，由我负责，你们回去吧。”萧锋、李曼村刚刚离开叶飞司令员的办公室，叶飞就收到了第 3 野战军的批评：“查此次损失为解放战争以来最大者，其主要原因是因为轻敌和急躁所致。”同时要求 10 兵团“将此次经验教训深加检讨”。当天，10 兵团即向 3 野报告说：“我们检讨造成此次金门作战之惨痛损失原因，主要是我们急躁胜利冲昏头脑，盲目乐观轻敌所造成。……直到已发现胡涟兵团已开始从汕头船运增援金门，仍要求应在援敌未全部到达时予以攻击，在船只不足的情况下，未断然下决心停止攻击，这是最严重的罪行。”10 月 1 日，由当时的福建省委第一书记张鼎丞、兵团司令员叶飞、兵团政委韦国清、29 军军长胡炳云、29 军政委黄火星、28 军副军长萧锋和政治部主任李曼村参加的 10 兵团党委扩大会在厦门老虎山洞召开，萧锋第一个发言：“金门战斗的失利，是领导判断失误，指挥也有失误，是骄傲轻敌的结果，是违背了毛主席不打无准备之仗的指示，也违背了粟裕首长指示的三个条件。这次失利是我对福建人民犯了个极大的错误，请求 10 兵团党委、3 野前委给我应得的处分。”叶飞很决就接过他的话说：“金门战斗的失利，主要责任在我，我是兵团司令员、兵团党委第一书记，不能推给萧锋，他有不同意见，我因轻敌听不进，临开船时、在电话上我还坚持只要上去两个营，萧锋掌握好第二梯队，战斗胜利是有希望的。

是我造成的损失。请前委、党中央给严厉处分。”叶飞在会后真的给陈毅司令员起草电报，并报中央，请求处分，毛泽东主席当时表示“金门失利、不是处分的问题，而是要接受教训的问题。”11 月 8 日，毛泽东主席又提出：“以 3 个团去打敌人 3 个军，后援不继，全部被敌歼灭，这是解放战争三年多以来第一次不应有的损失。”中央军委同时命令叶飞总结经验，接受教训，准备再次攻金。

1950 年，美国悍然入侵朝鲜，党中央、毛泽东主席决定停止解放金门

的任务，集中全力剿匪，这样，叶飞将军和我 10 兵团的将士失去了一次“立功赎罪的机会”。

第二部 强攻海南岛纪实

（1）毛泽东三次电示四野。

海南岛是中国第二大岛，它的面积和战略意义仅次于台湾。对其进攻的难度，远远超出金门与舟山。

首先从地理位置上看：在当时国民党军所占的 4 个主要岛屿中，它比金门、舟山距大陆都要远。琼州海峡是世界上流速最高的海峡之一。

这给渡海航行造成困难。

其次从双方攻防力量上看：攻金门、舟山渡海距离都在 10 公里之内，人民解放军的炮兵可以直接掩护航渡和登陆，国民党军的军舰只能在远处以火力拦截；金门岛上当时也没有设备完整的机场，需要呼唤台湾进行空中支援。可是进攻海南岛则情况不同，由于海峡较宽，不仅航渡距离远，登陆点也在人民解放军的炮兵火力射程之外，无法进行火力掩护，国民党军的军舰还可以直接到中流拦截。在海南岛上又驻有二十多架作战飞机，可随时直接支援守岛的国民党军作战。四野渡海兵团还完全没有海空军的掩护，航渡工具只有木帆船，是以陆军单独向敌军陆海空三军的立体防御发起进攻。

对这一次比攻击厦门、金门规模更大的渡海作战，毛泽东十分关切，1949 年 12 月 16 日毛泽东出访苏联，但是在临行前仍研究了金门作战的教训，并于 12 月 18 日在途中亲自起草了对第四野战军司令员林彪的指示电报。这封电报可以说是人民解放军统帅机关第一次对于渡海作战规律的系统总结。电报强调指出：渡海作战完全与过去我军所有作战的经验不相同，即必须注意潮水与风向，必须集中能一次运载至少一个军（四、五万人）的全部兵力，与三天以上粮食，于敌前登陆建立稳固滩头阵地，随即独立攻进，而不要依靠后援。

电报还举出三野第 10 兵团在金门战斗的教训是：于占领厦门后不明上述情况，以三个半团九千人进攻金门岛上之敌三万人，无援、无粮被敌围攻，全军覆灭。

你们必须研究这一教训。

毛泽东同时还要林彪向粟裕调查了解渡海作战的全部经验，以免重蹈金门覆辙。

在苏联访问期间，毛泽东一直关注着渡海作战的准备工作，1950 年 1 月 10 日，他在苏联又致电第四野战军首长，提出“争取于春夏两季解决海南岛问题。”同时又分析了海南岛作战与金门作战的区别：海南岛与金门情况不同的地方，一是有冯白驹的配合，二是敌军战斗力较差，只要一次运两万人登陆，又有军级指挥机构随同登陆，……就能建立立足点，以待后续部队的续进。

毛泽东电文中提到的冯白驹，是琼崖纵队司令员兼政委。琼崖纵队是以 1927 年 9 月海南岛农民起义队伍为基础组建的。这支人民武装经历了长

期艰苦卓绝的斗争考验，终于创立了以五指山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到 1947 年 10 月中央军委授予它“中国人民解放军琼崖纵队”的番号时，其已辖 3 个总队共 10 个团约 2 万人的作战力量。于 1950 年初，已解放了占全岛面积三分之二的广大地区，成为支援我军渡海作战部队登陆海南的坚强力量。

在这封电报中，毛泽东又鼓励四野渡海兵团树立赢得海南岛作战的信心。确实如毛泽东所说的，进攻海南岛尽管在某些方面比进攻金门困难，可是也有有利条件。海南岛上的国民党（特别是过去的粤军精华第 62、第 63、第 64 军在中国旧军队中战斗力也属上等），但都是在被歼灭后刚刚重建的，装备和训练都不如胡璉部。

刘安琪兵团的第 32 军和新建的第 4 军在国民党军中也只属于战斗力中等的部队。

2 月 17 日，即毛泽东结束访苏的同一天，他又根据中共中央转到苏联的四野渡海兵团的报告发出指示；以运输准备确有把握而后动作为原则，避免仓促莽撞，造成过失。

（2）十万将士组成渡海兵团。

四野渡海兵团认真研究了金门作战的教训后，在战前进行了较长时间的训练。组成渡海兵团的两个军——第 40 军和第 43 军、都是有光荣历史的英雄部队，它们同第 38 军、第 39 军、第 41 军一样，都是第四野战军的头等主力。第 40 军的前身是东北野战军第三纵队，系抗战胜利后进入南满的八路军山东部队组成，成立后在东北解放战争中战绩卓著，是有名的“旋风队”。第 43 军的前身是东北野战军第六纵队，该部是人民解放军历史最悠久的部队。该军第 127 师最早的前身是 1925 年成立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 34 团（后改称独立团，由叶挺任团长），是中国共产党最早建立的一支武装力量，以后参加过南昌起义和井冈山会师，红军时期就是红四军和红一军团的骨干部队，进军东北后也是主力之一。这两支部队过去虽然从来没有水战的经验，但是部队的军事素质较高，士气高昂，在海边又进行了较长时间的实地演练，因而很快就较好地掌握以简陋的器材渡海作战的要领。

四野渡海兵团经过精心的准备，根据海南岛的具体情况，采取了一系列新的作战方式：吸取金门作战敌情、海情不明即仓促发起攻击的教训，进行了为时三个月的周密准备，特别是参战各部队进行了登陆和海上战斗的训练，研究了对付敌军军舰和登陆作战的各种办法。

吸取金门作战船只不足即实行登陆的教训，在广东全省大量筹集船只，先后征集到 4000 名船工和 2100 余艘船只，保证了一次运载 10 万人以上的登陆部队还有余。

吸取金门登陆部队上岸后立足不稳的教训，先以小部队实行偷渡，和岛上的琼崖纵队会合，便大部队一登陆就得到有力的接应，能站稳脚跟并稳步发展。

吸取金门作战第一梯队只以少数兵力登陆，以寡击众的教训，正式开始强渡时第一梯队就使用 5 万兵力，带足弹药粮食，准备不依靠后援独立发展。这样第一梯队上岸后与接应部队一会合，就同岛北面守敌兵刀相差无几，人民解放军的战斗力又高于国民党军，从而确保了陆上战斗的胜利。

（3）薛岳构置“伯陵防线”。

当时，国民党设在岛上的“海南防卫司令部”系由国民党琼崖保安司令薛岳的属下以及逃到岛上的余汉谋部和“海南行政长官”陈济棠的部队三

方组成的。辖有陆军 5 个军共 19 个师、海军第 3 舰队及海军陆战队 1 个团。配备有各型舰船 50 艘，空军有第 1、3、5、20 大队，计战斗机、轰炸机和运输机 42 架。“海南防卫司令部”的三军总兵力约为 10 万人。虽然在全中国迅速被解放的隆隆炮声中，海南守敌已成惊弓之鸟，惶惶不可终日，但是，薛岳自持有海峡屏障，又占据着海空军优势，加紧部署构建环岛立体防御工事，以图长期固守。

薛岳的“海南防卫总司令部”在岛上的兵力分布为：以 32 军为主编成第一路军，重点担负琼东区的防卫任务；62 军、暂编 13 师、教导师和琼北要塞纵队编为第二路军，担负琼北区的防卫任务、4 军、64 军编为第三路军，担负琼西区的防卫任务；63 军、琼南要塞纵队和海军陆战团编为第四路军，担负琼南区的防卫任务。而其海空军的主力大部配备在琼北地区，以在战事爆发时立即封锁解放军的进攻通道琼州海峡。

为了保证“后方安全”薛岳还命令岛上守军加紧清剿我军琼崖纵队，并摧毁该纵队的根据地和游击区。

薛岳在琼岛构成了环岛立体防御体系后，曾得意洋洋地用他的字号“伯陵”将这个防线命名为“伯陵防线”，声称其“固若金汤”。

渡海作战兵团根据四野首长关于“派出少数兵力携带电台偷渡一次，取得渡海经验”的指示，决定抓住岛上敌守军抽调兵力“清剿”琼崖纵队，两翼防卫力量相对薄弱的有利时机，安排 40 军和 43 军各组织 1 个加强营的兵力，分别向琼东北和琼西北两侧地区进行偷渡。

1950 年 3 月 5 日 19 时，由 40 军 118 师 352 团一个加强营（共 799）人，在 118 师参谋长苟在松的带领下，乘 13 艘木帆船，从雷州半岛西南端的灯楼角启航。临行前，兵团副司令员兼 40 军军长韩先楚将一面绣有“渡海先锋营”几个大字的红旗授给该营，使肩负重任的指战员们深受鼓舞。

先遣营的 13 艘战船起航后，顺风顺流，直向预定目标——琼西北白马井登陆点驶去。

然而，当他们距岛滩约 30 海里时，风突然停止了，木船只能靠人力划桨摇橹而行，航速缓慢，使先遣营按原计划于拂晓前在白马井靠岸的设想不得不改为灵活处置。

在这紧要关头，先遣营的总指挥：118 师参谋长苟在松立即下令各船组织好机炮火力，做好应付敌海空军突然袭击的战斗准备。

3 月 6 日拂晓时分，我军战士发现附近有几十只国民党军帆船行驶，为了隐蔽行动，先遣营指挥员要求伪装成民船，尾随敌船队行进，当遇上敌海上巡逻机侦察时，战士们便摹仿前面的敌船的做法，给予相应的回应。这一招，居然骗过了天上的敌机。

中午 13 时，先遣营船队终于接近了预定的登陆点，可惜，此时我军已无法隐蔽登陆意图，被岛上守敌发觉，只得与之交手。

海面上，有敌 2 艘军舰对船队实施猛烈炮击，空中，10 架敌机俯冲扫射，岸上 1 个营的敌军依托坚固工事进行阻击，妄图在我军尚未踏上沙雄之前，将其歼灭于海上。

我先遣营的 800 壮士，面对血与火的生死考验，临危不惧，一面勇猛地火力还击，一面奋力划桨，直逼岛岸滩头。

14 时许，先遣营在火速赶来的琼崖纵队一总 8、9 团的攻击接应下，终于击溃了登陆点守敌的阻击，一举登岛。

第一个渡海先遣营的偷渡作战成功，不仅极大的鼓舞了渡海作战兵团的士气，而且为后续部队的偷渡及正面强渡都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4天后，由43军128师383团一营及配属的92步兵炮连共1000多名指战员组成的第二个渡海先遣营，在383团团团长徐芳春的带领下，分乘21艘木帆船，于当日（10日）13时从湛江市东南方向拔锚起航，扬帆直取琼东北地区的赤水港。

这一次侧翼偷渡，虽然未遇敌海空军的海上袭击，但是却碰上了恶劣天气，当夜海面上风雨大作，狂风卷着巨浪肆虐，使先遣营船队的指战员们同样面临生死考验。

在有的帆篷被狂风撕破、有的桅杆被折断。

有的船舱给巨击穿的情况下，经过20小时的艰难航行，将士们终于在第二天（11日）9时左右在琼东北地区赤水港至铜鼓岭一带30公里的地段上分散登陆。

43军128师383团1营组成的这支1000余人的偷渡部队登岛后。由于通信联络不便，只好就地分散隐蔽。好在负责接应任务的琼崖纵队独立团与当地群众一起，通过种种努力，设法将部队一批批带到了预定集合地点，并以勇猛动作，一鼓作气突破敌守军一个团的封锁，于12日晨到达文昌地区。

解放军两批偷渡部队的登岛，令吹嘘防御体系“固若金汤”的薛岳气急败坏，他忙调集了6个团的兵力进攻文昌，企图趁我43军渡海先遣营立足未稳之际，一举围歼之。

先遣营不久果然在潭门一带遭到敌暂编13师1个多团兵力的钳形包围，形势的确对我不利。

战斗打响后，该营2连连长李树廷发现敌37团的团指挥所就在附近山头时，立即派出1个排向某发动正面佯攻，而自己则带领1个班从侧面冲进敌团指挥所，当场击毙该团团长。敌兵失去作战指挥，首尾难顾，在我军战士们的奋勇拼杀中，争相逃命。

就这样，该营在琼纵独立团和当地群众的紧密配合支援下，不仅全歼了敌暂编13师37团的1个营，而且还击溃了这个师39团的进攻。

战斗结束后，这支第二批渡海先遣营部队，很快转往琼东根据地地进行休整，海南解放后，43军授予该营“渡海先锋营”和该营2连“渡海英雄连”的荣誉称号。

（4）惊心动魄的三天大血战。

我军两个渡海先遣营偷渡登岛后，虽然为此次海南战役提供了宝贵的海上作战、登陆抢滩以及突破敌军围追堵截等方面的组织经验，但要接应整个兵团的大规模强渡海峡登岛，仍然显得兵力过于单薄。为此，兵团指挥机构决定，由40军和43军再各派1个加强团，向琼北地区实施正面偷渡攻击。

1950年3月26日傍晚（19时），由40军118师352团主力和353团2营及炮兵大队组成的第1个先遣偷渡团的3000名指战员，在琼崖纵队副司令员马白山和118师政治部主任刘振华的率领下，分乘81艘木帆船，仍从雷州半岛西南端的灯楼角起航，向着琼西北的临高角一路顺风而去。

但不巧的是，出航仅1个多小时，由于风力骤降，航速减慢，各船只好落下帆篷，由战士们划桨行船。到了下半夜，海面上气温下降，大雾弥漫，数米外便不见人物，而且此刻潮流流向也发生了变化，致使加强团船队无法继续保持队形，各级指挥员只得依靠手中的指北针判定方位指挥前进。

为了坚决完成正面偷渡登陆作战任务，加强团指挥所命令各营领导，即使在失去统一指挥的情况下，也要以船为单位，只许前进不许后退，那怕只剩下一条船也要抢滩登陆，表示了誓死完成任务的坚强决心。

在一夜大雾的掩护下，到第二天上午 5 时至 8 时，该加强团各船先后在偏离预定地点较远的临高角以东 20 公里宽的滩头地段分散登陆。

船向的偏离，将加强团的指战员们送到了琼岛守敌正面防御能力很强的区域，使他们经受了比前两批偷渡部队更加严峻的战火洗礼。

由于远离预定登陆点，岛上的琼崖纵队一时难以接应，加之所处地形利敌不利我，稍加犹豫或行动迟缓，便有被敌聚歼于滩头的危险。

在这种极端困难的情况下，饱经解放战争一系列重大战役锻炼的我军广大指战员，人人心中抱着“枪声就是命令”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耳听目寻，自动朝着枪炮最为激烈的地段靠拢，使登岛部队保持了战斗力。

在战斗中，出现了多起英雄个人和模范战斗群体。其中载入史书文献的即有曾荣获“四平战斗模范排”称号的 40 军 118 师 352 团 3 营 8 连 2 排。他们在营长冷利华的率领下，在琼岛林诗港附近登陆后，立即毫不迟疑地果断攀上两丈多高的悬崖峭壁，一路猛打猛冲，掩护后续部队直向敌纵深防御体系穿插。当敌人的碉堡群的密集火力封锁部队通道时，这个排的迫击炮手朱歧芳沉着镇定地架好炮位，瞄准目标，很快炸掉 1 座碉堡，并在身负重伤的情况下，连续发射 24 发迫击炮弹，摧毁了这个碉堡群，为保证部队前进立了头功。

与此同时，我军准备在玉抱港附近海岸登陆的 20 余艘战船，遭到敌海军 2 艘军舰及数架飞机的猛烈攻击，情况十分危急。这时，只见 352 团 2 营 4 连的 2 只战船马上转舵，与敌军舰和飞机拼杀，将其火力吸引过来，以掩护主力船队抓紧时间抢滩登陆，这 2 只船上的指战员打完了最后一颗子弹、以大部分壮烈牺牲的献身精神，为解放海南做出巨大的贡献。

尽管担负接应加强团偷渡任务的琼崖纵队一总队和 40 军先遣偷渡营一时未能接到我军第二批登陆部队，但他们坚决执行命令，在原预定的登陆点与敌军展开了浴血搏斗，牢牢地牵制住敌 2 个师的兵力，减轻了敌人对加强团的压力，保障了登陆作战的顺利发展。

经过整整 3 天的血战，第 1 先遣偷渡团先后攻破和摆脱了敌 62 军、64 军 10 多个营的层层阻击及尾追，终于在 29 日晚，在美厚村一带与接应的琼崖纵队一总队部队汇合在一起。

第 1 先遣偷渡团成功登陆的消息传来后，兵团决定按原计划由 43 军 127 师 379 团和 381 团 1 营共 3733 名指战员组成的第 2 先遣偷渡团于 3 月 31 日 22 时 30 分自雷州半岛东南端的博赊港出发，登陆点选在琼岛海口市以东的铺前港。

第 2 先遣偷渡团由 43 军 127 师师长王东保率领 88 只战船扬帆急驶，但 4 月 1 日凌晨 3 时左右，在船队穿越海峡中流后不久，即遭到已倍加防范的敌海军 1 艘大型战舰和 2 艘小型战舰的拦阻炮击。

一时间，加强团的战斗队形被打乱了，这时与第 1 先遣偷渡团一样，担负护航任务的“红五连”3 只火力船，迅速转舵驶向那艘敌海军大舰，根据多次“木船打军舰”的作战经验，与之展开了“贴身战”，在距离其 50 公尺左右时，3 只火力船上的战防炮，迫击炮和所有轻重武器一齐开火，并将一串串手榴弹抛在敌舰的甲板及炮位上。

战斗空前激烈，我火力船上的指战员虽然伤亡很大，但他们个个视死如归，死死咬住敌舰不放，打得它火光四起、浓烟滚滚。

大舰挨了打，2艘小舰自然不敢靠近，迫使大舰不得不开足马力夺路而逃。

登陆前的“海战”以我军的继续前进而告结束，不过由于敌海军的袭击，该加强团3营8、9连的船队在战斗中脱离了编队，只顾朝琼岛驶去，却误在敌兵力较强的海口市白沙门岛登陆。

结果陷入敌人的重重包围，在与之血战1天1夜后，大部分指战员英勇牺牲。

第3加强团登陆前，琼崖纵队独立团和3总队1团已于4月1日凌晨赶到了预定接应点北创港与铺与铺前港之间的塔市，全歼驻守滩头的敌守军2个步兵连和一个迫击炮连，紧接着又击溃敌2个团的阻击，于当晚会合加强团进至文昌地区隐蔽。

在不长的时间内，我军2批4支先遣偷渡部队均登陆成功，为迎接大兵团强攻海南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5)大兵团强渡作战开始。

1950年4月10日，渡海作战兵团指挥所决定，兵团主力分成第一、第二梯队向琼北实施大规模强渡登陆。

第一梯队由40军主力和43军一部构成，务于4月13日前集结完毕，等有利时机起航。

第一梯队的登陆点是以海南岛北部的马袅港为界，港西为40军，以东属43军。

兵团要求，第一梯队登陆后，必须迅速夺占并巩固滩头阵地，坚决顶住敌人的反冲击，保证后续部队的登陆安全。

第二梯队由43军主力担任，其任务就是在第一梯队登陆后立即启航，紧跟着“第一冲击波”登陆上岛，协同一梯队歼灭岛上守敌。

兵团还命令琼崖纵队和先遣偷渡部队，当强渡战斗打响后，要积极主动出击牵制敌军，以策应主力部队的强渡。

1950年4月16日下午19时30分，渡海作战兵团第一梯队共5万余人，分乘350只战船，分成东路、西路两编队，自雷州半岛南端各港湾同时起锚，以势不可挡的进军态势，直杀海南岛。

船队刚驶离岸边不远，便被敌海上巡逻队发觉，敌机一边打出串串耀眼的照明弹，一边对我军战船进行疯狂的轰炸扫射，渡海作战的开场锣鼓就这样打响了。

战船上的我军指战员沉着应战，除了迅速组织对空火力还击外，还对被打烂炸穿的战船及时在行进间进行了抢修。

“空战”结束后，当天下半夜，敌海军又赶来凑热闹。第一梯队的指挥员们见状，当即命令在编队两侧护航的我火力船队。迅速展开战斗队形，尽量从不同方位接近敌舰，利用其火力死角，来它个“海上拼刺刀”。这招果然颇见成效，前来偷袭拦截渡海兵团的敌舰，在挨了一顿“土炮艇”的机枪、手榴弹之后，只有灰溜溜地在远处乱放一通炮弹壮胆……第一梯队中的40军护航火力船队的指挥船，航行中因发动机发生故障而脱离了编队，在黑夜中单船飘流，直到天亮时，才观察到1艘敌海军大型军舰追踪而来。为了避免与敌正面交火，他们用篷布将火炮遮盖起来，大多数战士下舱隐蔽，以堆

满“货物”的民用运输船的面目来迷惑敌人。

经过伪装的战船主动向敌舰迎了过去，使敌舰放松了警惕。当我战船贴近敌舰右侧时，指挥员黄宇一声令下，炮手们顿时掀掉篷布向其猛烈开炮，一时间30多发炮弹雨点般落到敌舰要害部位，使之起火冒烟，掉头急逃。

“土炮艇”大显神威，居然无意间打跑了国民党海军第3舰队的旗舰——“太康”号，并使舰上的敌第3舰队司令王恩华在激战中身受重伤，不治身亡。

“木船打军舰”的奇迹，一时在我军传为佳话。该船战后被40军授予“战斗英雄船”称号。

一路血战，一夜拼杀，渡海作战兵团终于接近了琼岛。

在抢滩登陆作战中，我军广大指战员冒着敌人的炮火，在浅滩中便纷纷下水泅渡，迅速形成了攻击波。

在琼崖纵队和先遣偷渡部队的策应下，兵团第一梯队于4月17日早上6时，全部踏上预定登陆的地域。

第一梯队上岛后，各部队按战役预定方案向守岛敌军防御体系的纵深扩大战果。40军登陆部队在击溃了敌64军131师2个团的阻击后，又攻克了敌9个地堡群，拿下了临高山，并派出一部分兵力包围了临高县城。

4月19日拂晓40军118师在美台地区包围敌64军156师师部和1个团，经数小时战斗，将其大部歼灭。同日，40军119师奔袭位于加来地区的敌64军军部，并占领了该地。

43军128师主力登陆后，当即抢占了才芳岭、桥头等战略要点，歼灭敌64军1200余人，包围了花场港守敌。

薛岳慌了手脚，抽调4个团的兵力增援福山，妄图防止我军继续推进，威胁其首府海口市的侧翼安全。

福山守敌在此之前曾欲向北出动，被我127师先遣偷渡团阻截，与128师主力一道将其击溃，一举夺取了福山。

至此，琼北地区沿岸各要点，完全处于我军控制之下，为第二梯队的登岛，奠定了胜利的基础。

而薛岳面对我大军压境，起初居然仍旧认为是共军的“小部队偷渡”，尤其是他在对我128师实施了反包围之后，以为稳操胜券，甚至放出狂言“登陆共军即将被全歼”，连在海口市召开所谓的“祝捷大会”的会场也布置好了。

然而，随之而来的一连串沉重的打击，无情地粉碎了他的美梦。

(6) 10万大军全部登岛。

第一梯队的我43军128师登陆后，直接威胁到敌心脏机构——海口市的安全。4月19日，薛岳调敌62军集结于澄迈地区拦截，同时命海口市的敌32军252师驰援该地。

4月20日清晨，我128师在澄迈县城以北与敌252师师部及所属的2个团相遇，128师先敌动作，当即将其包围，展开攻势。这时，我43军127师先遣偷渡团已进至美仁地区，占领有利地形，准备打援。

薛岳见其252师主力被围，急令62军和暂编13师、教导师及25师的另一个团直扑我128师，又在我军外围构成了一层包围圈。

负责指挥整个渡海作战的我15兵团司令员邓华在分析敌我态势后，决定趁敌主力部队围攻43军登陆部队之际，在澄迈及其以北地区迅速展开一

场大规模的围歼战，以求将薛岳主力一举歼灭。为此，指挥部一面命令 43 军登陆部队坚守阵地，顶住数倍于己的敌人的进攻反扑，一面命令 40 军主力战胜饥饿疲劳，飞兵东进，尽快将围攻我 128 师的敌军再围它一层，同时还指示琼崖纵队三总队及独立团部队，积极协同登陆兵团主力作战。

4 月 21 日拂晓，敌 62 军等部在飞机大炮的支援下，开始向我 128 师阵地发动猛攻，128 师在这种情况下，果断以少量兵力抗击外线敌军的围攻，而将主力集中于内线，抓紧时机力求尽快歼灭已被包围的敌 252 师主力。

为了配合 128 师的战斗，127 师先遣偷渡上岛的 379 团在琼纵 3 总队和独立团的协同下，顽强顶住了敌 62 军 2 个团的多次轮番进攻，而先遣上岛的 381 团 1 营 1 连，在战斗中连续抗击了敌军从 1 个排到 1 个营猛烈冲击，牢牢坚守住了阵地。

在向内线敌 252 师主力发动强攻的激烈战斗中，我军 382 团 3 营 7 连向敌一处核心阵地攻击，数次受阻，全连只剩下 1 名排长和 6 名战士，在这时，副师长孙干卿直接指挥，营长刘连科用机枪掩护，冒着炮火硝烟冲入敌阵，将疯狂吐着火舌的地堡一一炸毁，占领了这一敌人阵地。战后，刘连科和刘万成被 43 军授予“战斗英雄”称号。

在 128 师全师上下英勇奋战之际，40 军接到兵团命令后，于 19 日夜间即率主力 7 个团从加来、多文地区出发，沿途冒着敌机的轰炸、扫射、马不停蹄地起往澄迈县城。在到达该地后，即又兵分两路北上，于 21 日 17 时抵达美亨东西两侧地区，将围攻我 128 师的敌军严密包围起来。

这时，战场态势出现了包围与反包围、内线与外线犬牙交错的复杂局面，在战斗中，敌我双方都不敢开炮，在许多地方展开了短兵相接的肉搏战。

4 月 22 日，兵团命 40 军、43 军与琼纵 3 总队独立团一方面向敌发起总攻。在我军强打猛烈的攻击中，薛岳这才弄清禁与之作战的并非“共军小股偷渡部队”，为避免主力全部被歼，急忙下令其残部向海口市退守。

此次场面壮观的琼北围歼战，我渡海第一梯队全歼敌 32 军 252 师，重创其 62 军、暂编 13 师和教导师等薛岳的主力部队，彻底捣毁了其环岛防御体系的核心阵地。

4 月 23 日清晨，我 40 军 119 师一部协同 42 军 128 师，于琼山地区一举歼灭敌 62 军 2 个师的大部，击毙 62 军少将参谋长温轰，攻占了琼山县城。上午 8 时，40 军 118 师与 43 军 127 师先遣团一道向海口市发起攻击，但敌守军已于 22 日夜间逃窜，我军未遇抵抗即占领了海口。

攻占海口后，渡海作战兵团第二梯队于 23 日 19 时开始启渡，于 24 日凌晨 1 时至 4 时左右在海口市以西的天尾港沿岸登陆。至此，参加渡海作战的我 10 万大军全部登上了海南岛。

薛岳眼见其苦心经营的琼北、琼东各防御体系及指挥机构顷刻间土崩瓦解，溃不成军，遂于 22 日下令全线南撤。其情势为：第一路军撤往乐令、万宁地区，第二路军残部撤往陵水、保亭地区，第三路军余部撤往北黎、八所地区，第四路军和海、空军集结于榆林、三亚地区。

薛岳在部署三军南逃方案后，同时又致电台湾，要求火速派舰船来琼接运残部撤离海南。

这两道“使命”完成后，他即于当晚与岛上的军政要员们乘机开溜了。

(7) 海南之战堪称奇迹。

薛岳残部分路南逃后，我渡海作战兵团即部署部队分东、西、中三路

大军展开追击战。

从4月24日开始，40军主力和43军128师、琼纵3总队、5总队及独立团组成东路追击部队，经万宁、陵水两地直插榆林、三亚地区，以切断敌退路。

这场比谁跑得快的战斗，我军打得游刃有余。也许是残敌自知大势已去，几乎没有哪个部队敢停下脚步负隅顽抗，他们唯一的希望是尽快逃到海边，坐上军舰也如他们的最高长官薛岳一样，到台湾去避开这场充满战火硝烟的噩梦。

这样一来，我军在连续作战、毫无休整、极度疲劳的情况下，依然士气旺盛，个个奋勇杀敌，人人力争夺功。40军118师的1个加强营，乘缴获敌人的汽车沿东线环岛公路展开追击，到第2天上午追上一股敌军，当即抓获2000余名俘虏，其势犹如牧民赶羊。

4月27日早晨，靠“铁脚板”追击的118师、在万宁地区截住敌32军大部和62军残部，并在该地的乌场港内对正在往4艘赶来接运的敌舰上撤退的敌军发动攻击，当即击伤其中的3艘，抓获敌兵3000余人。

40军119师在大追击中歼灭敌62军151师师部及2个团的残部，俘虏中将副军长兼151师师长韩潮及其官兵800余人；并于30日上午占领了敌空军在三亚的机场。

43军128师在陵水的新村港截歼候船逃跑的敌军2000余人，并乘胜占领了榆林、三亚两港。

西路追击部队由40军118师一部组成，水陆并进，配合中路友军追歼敌第三路军。中路追击部队由43军军部率129师及127师380团组成，该部在远距离追击作战中，克服种种困难，昼夜兼程，终于在4月30日赶至小岭、北黎、八所地区，将敌4军286师和90师1个团截住，在西路友军和琼纵1总队的协同下，将其全歼，捕获敌286师少将副师长邱国梁及其官兵3500人。

1950年5月1日上午，我军占领北黎、八所，海南岛全境获得解放。

在这次解放海南的渡海作战行动中，我军共歼灭敌军5个师9个团，总计33,148人，其中俘虏26,469人，缴获火炮418门、飞机4架、坦克和装甲车7辆、汽车140辆，击落敌机2架，击沉敌舰1艘，击伤5艘。我方亦伤亡4614人，其中400余人是在海战中牺牲的。

第三部 从台湾战役到抗美援朝

（1）蒋军秘密撤离舟山。

仅次于台湾的中国第二大岛——海南岛的解放，给台湾当局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为了安定人心，国民党的宣传机构竟把这一惨败说成是“从海南岛向台湾转移兵力顺利完成”。但明眼的人都清楚，对战略和经济利益都仅次于台湾的这个大岛若能守得住，何用“转移”？不过翻一翻国民党几十年的报纸就可知道，所谓“转移”从来不过是败逃的代名词。

然而，人民解放军并没有就此罢休。早在第四野战军积极准备攻击海南岛的同时，第三野战军就在积极准备渡海攻击舟山群岛，中央军委和第三

野战军还计划在舟山作战成功后，再乘胜以船队南下攻占金门（舟山位于北航线要冲，不攻下舟山北方的船队难以南下）。

大陆失败后，对蒋军来说，舟山群岛的战略地位就显得更为重要。自1949年年底，蒋介石将在金门的第19军和台湾守军中战斗力最强的一个军——第52军（这是第一批进入东北，在辽沈战役中唯一逃出来的一个军）调去增援舟山。至此，舟山群岛上的国民党军已达6个军，连同海空军共12万人，部署的军队数量超过了海南岛。

从1949年年末起，国民党空军根据蒋介石提出的“攻势防御”的要求，加紧了对大陆城市特别是港口和船只的轰炸。由台湾起飞的作战飞机到舟山的定海机场加油后，其航程可达到华东乃至武汉一带的各要地。国民党空军利用定海机场作为基地，在1950年1月和2月间对我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上海轰炸8次，同时又对华东沿海、长江下游各港口连续进行轰炸，以破坏大陆的国民经济恢复，并阻挠人民解放军向华东沿海集结船只。2月6日的“二六大轰炸”中，国民党空军出动17架飞机分四批轮番轰炸上海市区的电力公司、沪南和闸北水电公司，一次就炸死炸伤上海市民1400人，使上海电力丧失90%，多数工厂停产。国民党海军还利用舟山基地封锁长江口，运送武装特务袭扰江浙沿海地区。因此，攻占舟山，拔去定海基地这根钉子，已成为华东军区最重要的任务。

根据金门、登步岛失利的经验教训，人民解放军对舟山作战采取了十分谨慎的态度。接到毛泽东1949年11月14日致三野的关于准备未周宁可推迟时间的指示后，第三野战军决定将对舟山的攻击推迟到来年的1月或2月，11月22日华东野战军副司令员粟裕给中央军委回电，分析蒋介石有可能因金门、登步两战斗受到鼓励，将台湾兵力增强舟山、金门诸岛。这样虽然增加了我们攻占舟山、金门诸岛的困难，但如能在这些岛上尽歼蒋军，则对将来攻台行动在政治上军事上均属有利。因此，粟裕要求延长攻击舟山的准备时间。12月上旬，中央军委、毛泽东同意粟裕的意见，并强调进一步研究海空军配合的问题，同时还决定从新建的海空军中抽调部分部队配合陆军作战。于是，攻击舟山的准备工作改由陆、海、空三军一起进行。

5月1日，四野部队解放了海南岛的消息传来，使准备渡海的部队十分振奋，而台湾和舟山的国民党军万分惊恐。这时，国民党军已经了解到人民解放军将以陆海空三军发起舟山群岛的攻击，其打击力量势必大大超过海南岛作战，而国民党军仅剩的陆军部队有三分之一在舟山，如再遭惨重损失守卫台湾就更困难。5月上旬，蒋介石决定从舟山撤退，并在撤退前佯称“反攻”。5月13日撤退秘密开始，守岛的国民党军12万人分批登船，同时把岛上2万多名青年男女强行拉上船运往台湾，并炸毁了岛上的重要设施，连花费了4000万银元修筑的定海机场也在一阵阵爆破的巨响中被彻底破坏。

（2）毛泽东决定粟裕指挥。

早在1949年5月下旬，毛泽东就责成华东野战军副司令员粟裕组织三野部队进行攻台准备，因当时上海战役刚刚结束，华东许多地区还未解放，已占地区又需要分兵剿匪，所以只能抽出野战军主力第9兵团的4个军部队进行攻台的训练，并兼任上海地区警备。

金门和登步失利后，华东野战军首长对渡海作战艰巨性的认识不断提高，台湾战役的计划也一再被修改。

1949年秋天制定的台湾战役计划是投入8个军的兵力，其中以第9兵

团的4个军（第20、第23、第26、第27军）为第一梯队。1949年末华东野战军首长经研究决定增加投入战役的兵力，三野部队除担任剿匪和地方警备任务外，主力12个军全部参加攻台。中央军委马上同意了这一意见。当时，因为美国公开表现出和台湾国民党当局拉开距离的政策，所以一般估计攻台时美军不会介入。栗裕副司令员在《华东军区一九五零年政治工作指示》中曾解释说：直接参战在政策上、军事上都是对美帝不利的，所以美帝只能间接参战，如动员日本的“志愿兵”去帮助蒋匪。

基于这种估计，华东野战军在研究台湾战役的计划时，曾设想了同日本援蒋军人作战的可能性，并有信心消灭这些“志愿兵”。根据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中央军委认为应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完成台湾战役的准备，早日完成解放全中国的任务，以实现祖国统一。

为争取尽可能先在沿海岛屿歼灭国民党军主力，人民解放军在准备对舟山、海南岛和金门实施攻击时，都强调要集中优势兵力，确保登陆后能够有把握打歼灭战。经中央军委同意，在第四野战军攻击海南岛的同时，华东野战军决定调集第7、第9兵团共6个军（第20、第21、第22、第23、第26、第27军）20万人发起舟山战役；并调第24、第25、第32军入闽，接替第10兵团（辖第28、第29、第31军）的剿匪及修筑道路、机场等任务，以腾出该兵团用以攻占金门。

华东野战军还准备将对舟山、金门的攻击作为攻台的实战演习。

为了更细致地筹划台湾战役的具体事宜...1950年3月11日新任海军司令员的肖劲光同栗裕会商了攻台的准备工作。中央军委同意华野领导和海军会商的意见，设想投入50万部队用于渡海攻台，分两次运送。

当时作出这一设想，是对东南沿海国共双方军事力量进行对比分析后作出的估算。国民党陆海空军总共还有50多万军队，其中在舟山、金门和海南岛的部队随时又有撤回台湾集中力量防御的可能，再加上少量日本“志愿”人员的协助，还有一定的战斗力。解放军进行的又是背水的登陆作战，按照一般的登陆作战规律，第一批登陆部队要有能突破防线并向纵深发展的充裕力量，而最忌“添油”式的逐次增兵。所以预定第一梯队要有足够的兵力，再待第二梯队上岸，总兵力至少应和台湾守军大致相当。当时人民解放军各部队的战斗力明显高于同等数量的国民党军，有50万部队登陆就可以确保在短期内不间断地发展胜利，以占领全岛。根据这一设想，华东野战军准备在舟山战役结束后，以第7、第9兵团担任攻台的第一梯队，第10兵团和入闽的另外3个军担任第二梯队。这样，华东野战军的12个军部队连同后勤支援人员，投入台湾战役的总兵力将达50万人。在大陆内地，第四野战军以第13兵团（辖第38、第39、第40军）担任全军的战略预备队，西北野战军抽出第19兵团（原华北第2兵团，辖第63、第64、第65军），作为中央军委可以随时调动的机动力量。

当时，要实现这一登陆作战的设想，最大的困难来自两个方面：一是缺乏渡海船只，二是海空军掩护问题还有待解决。

解决渡海船只问题，在建国初期的条件下是一大难题。要运送50万部队渡海，连同装备、粮弹、饮水、燃料、马匹、车辆等，所需船只甚多。

根据金门作战的经验，第二梯队不能依赖第一梯队的船只返航接运，而必须自备船只。

因此，中央军委估计需筹集几十万吨位的船只。台湾海峡海宽浪大，

渔民的小帆船难以航渡，需用轮船或较大的机帆船。近代中国海运一直不发达，沿海地区机器动力的船只很少，国民党军从大陆撤退时又将大多数轮船带走或加以破坏，所以要靠从沿海现有的船只中筹集几十万吨位的机动船是办不到的。

解决海空掩护问题，也是保证渡海攻台成功所必不可少的前提，而人民解放军当时确实不具备这种条件。台湾距大陆最近距离也在 80 海里以上，平均距离则有 100 多海里，解放军对金门、海南岛发起进攻时，航渡距离只有 5 - 15 海里，以帆船航行几小时即可到达，完全可以在一夜间起航并完成登陆，从而能大大减少国民党空军的攻击和海军拦截的威胁，向台湾航渡则完全不具备这种夜航登陆的条件。解放军当时拥有的舰船时速大多只有七、八海里，向台湾航渡需要一天一夜时间，庞大的船队一旦没有夜幕遮蔽，在完全暴露的海面上必然会遭到国民党海空军的全力拦截攻击，没有海空军掩护的船队将会遭到极惨重的损失，根本不可能达成登陆成功的目的。因此有了渡海的船只后，还必须建成一支能够较敌方具有优势的海空军，才能保证台湾战役这种规模的渡海作战的胜利。

中央军委在筹划台湾战役时，鉴于上述的这两个主要困难，决定在不影响恢复国民经济的前提下，筹集财力物力修造船只，并尽快建设海空军。但是在当时中国工业基础极为薄弱、技术设备极其落后的条件下，筹集修造大量船只和建设海空军都非短期所能完成。

沿海地区解放后，人民海军征集到可用的商船、渔船仅有 169 艘，总吨位 6.48 万吨。

解放初期我国沿海的造船工业一般只能制造内河小船，修船能力也十分有限。当时国民党空军又以沿海的造船厂和较大的船只为主要轰炸目标，如 1950 年 1 月 25 日对江南造船厂一次轰炸，就炸毁炸伤“常州”号、“万寿花”号等 26 艘舰船，严重影响了修造船的进度，鉴于这种情况。

中共中央在加强对港口上空防护的同时，要求沿海地区各造船厂抓紧修复被破坏的轮船，并大量赶造投资少、工期短并有一定抗风浪能力的机帆船。此外，中共中央利用英国已承认新中国，想建立关系的有利条件，在香港购买到旧船 48 艘，总吨位 2.54 万吨，并向英商继续洽商购买。不过即便如此，至少还需要相当一段时间才能达到筹集几十万吨位船只的数量要求。

1950 年 6 月 6 日至 9 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七届三中全会。会上，华东军区副司令员粟裕汇报了解放台湾的各项准备工作。粟裕请求由中央军委直接组织指挥台湾战役，毛泽东则决定这一战役仍由粟裕指挥。中央军委、毛泽东作出这一决定，是由于粟裕在解放战争的多数时间里实际担负了华东战场的主要指挥责任，1948 年陈毅调任中原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后粟裕还担任了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在华东解放战争中显示出高超的指挥才能。台湾战役由粟裕担任指挥员，在当时是最合适的人选。

（3）危殆中的台湾出现了转机。

1950 年春夏之交，是台湾国民党当局最为恐慌的日子。自海南岛被攻占、舟山撤守后，许多人预感到下一个目标就是台湾。当时相当数量的“党国要员”对守台湾根本丧失了希望，而争相逃往海外。蒋介石在大陆的两个最有力的经济支柱都远飞而去——孔祥熙去南美洲经营橡胶园，宋子文去美国当了寓公。在国民党内位居第二的李宗仁更是在美国称病不归。蒋介石嫡

系的军事将领也有相当大的一部分自奔海外或寓居香港，其中特别有趣的是原徐州“剿总”司令官刘峙竟不顾自己的上将之尊，跑到印度尼西亚当了一个华侨中学的教员。

然而，危殆中的台湾，出乎蒋介石的意料降临了转机。这转机到来的如此及时，真使蒋介石惊喜交集。

1950年6月25日，蒋介石正在吃早饭，负责给蒋介石递送情报的蒋经国，送来一份简报，所获情报零星混乱，只知朝鲜南北发生战争。直到深夜10点，始接到国民党台湾政府驻南朝鲜大使邵毓麟的首次报告，才了解大致的战况。

令蒋介石望眼欲穿的第三次世界大战，似乎终露端倪。他对朝鲜战争的反应，大致与邵毓麟在报告中的分析不谋而合。邵说：韩战对于台湾，更是只有百利而无一弊，我们面临的中共军事威胁以及友邦美国遗弃我国，与承认匪伪的外交危机，已因韩战爆发而局势大变，露出一线转机，中韩休戚与共，今后韩战发展如果有利南韩，亦必有利我国，如果韩战演成美俄世界大战，不仅南北韩必然统一，我们还可能由鸭绿江，由东北而重返中国大陆。

如果韩战进展不顺而不利南韩，也势必因此而提高美国及自由国家的警觉，加紧援韩决不致任令国际共党渡海进攻台湾了。

果不出所料，韩战一发生，美国立即派第7舰队协防台湾，台湾因此而喘了一口气。对于美国公然武装入侵我国领土台湾，直接干涉中国内战的行动，中国人民表示了极大的愤慨。1950年6月28日，毛泽东主席发出号召，提出：“全国和全世界的人民团结起来，进行充分的准备，打败帝国主义的任何挑衅。”随后，全国开展了“反对美国侵略台湾、朝鲜运动”，这一运动不久以后发展为抗美援朝运动。

美国出兵台湾，使新中国面临的军事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6月30日，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向海军司令员肖劲光传达了中央新的战略方针：“形势的变化给我们打台湾增添了麻烦，因为有美国在台湾挡着”。“现在我国的态度是，谴责美帝侵略台湾，干涉中国的内政。我们军队的打算是：陆军继续复员，加强海、空军建设，打台湾的时间往后推延。”自美国出兵朝鲜和台湾后，新中国在东北和台湾海峡两个方向都受到严重的军事威胁，而当时的东北是中国的工业中心，战略地位更为重要，所以中共中央在军事上的注重点自然转到东北边防问题上。7月上旬，中央军委决定组建东北边防军。7月13日，中央军委任命粟裕、肖劲光为东北边防军的正、副司令员，邓华为第13兵团司令员（当时准备将东北边防军建成一个下辖几个兵团的大单位）。尽管粟裕、肖劲光二人因故都未到职，但是中央军委决定这两位原定的台湾战役的主要指挥员到东北边防军任职，这本身就说明了中央军委战略重点的转移。

在推延攻台计划的同时，中央军委对于是否攻击金门等沿海岛屿的问题还一时未最后决定。6月下旬至7月下旬，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部队对美国介入台湾海峡的程度采取密切注视的态度，攻金准备工作一时还未停止，原定入闽配合第10兵团进攻金门的第24军、第25军和炮3师继续按原部署于7月间入闽。7月上旬，人民解放军华东海军协同陆军攻占了浙江东北部海域的部分岛屿，7月12日解放军华东海军又突袭了浙东的披山列岛。7月下旬，福建军区发现金门守军有撤退迹象，于是派遣1个营渡海对大担岛进行武装侦察（因遇7级大风侦察失败）。在7月下旬以前，

美军的军舰只是在台湾海峡中巡逻，还未直接支援华东沿海岛屿上的国民党守军，这些岛上的国民党军仍准备撤退台湾。胡璉在 1976 年 8 月在台湾发表的《金门旧忆》中也公开承认说：七月中旬我军曾有放弃金门的计划。后经东京美军当局的劝告“与共产党斗争，寸土不让”，我乃仍坚守不放。正当决定撤守并准备实施时，7 月 23 日，国防部忽派专员送命令来——仍然准备在金门作战。

7 月 13 日远东美军司令麦克阿瑟率 16 名高级官员组成的代表团抵达台湾，次日和蒋介石签订了“保卫协定”；8 月 4 日，美国空军第 13 航空队司令抵达台湾，并成立台湾前进指挥所。

由于美军的直接干涉，国民党军停止从金门撤军，并又进占了刚刚放弃的浙东部分岛屿。

考虑到美军介入台湾海峡后的形势，8 月 11 日中央军委致电华东军区司令员陈毅，同意陈毅的意见并指示：台湾决定 1951 年不打，待 1952 年看情况再作决定。金门可决定在 1951 年 4 月以前不打，4 月以*蟠 倭蛄 K 婧螳 *民解放军停止了攻击金门和沿海其它岛屿。当时，美国拥有的世界上最强大的海空军，麦克阿瑟又预料人民解放军会在台湾海峡进攻，在那里做了充分的准备。据美国军方后来公布的材料说，“麦兑阿瑟特别关心福摩萨台湾问题。他发誓说，如果赤色中国愚蠢地去进攻那个岛屿，他将火速赶去指挥。”麦克阿瑟甚至说：“我每个夜晚都祈祷赤色中国能这样做——我常常是跪下来在那里祈祷。”在这种情况下，人民解放军再实行渡海作战显然是以我短击敌之长，而选择陆地战场同美国侵略者进行较量，则能充分发挥我军的优势。

(4) 毛泽东收到一份不合宜的“礼物”。

1950 年 10 月 1 日，是新中国成立一周年的纪念日。在北京的街头巷尾，到处是一片欢乐的节日气氛，一派和平的景象。

然而，共和国主席毛泽东，却在这喜庆的日子里，收到一份不大合宜的“礼物”——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金日成首相和朴宪永外务相打来的加急电报。内容大意是：毛泽东同志：……自 9 月中旬美军在仁川登陆以来，对我们已造成了很不利的情况。

敌人利用约千架的各种飞机，不分昼夜地轰炸我们的前方与后方，我们兵力和物资方面的损失是非常严重的。

敌人登陆部队与南线部队已经连接在一起，切断了我们的南北部队，如果敌人继续进攻三八线以北地区，只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是难以克服此危机的。

因此，我们不得不请求您给予我们以特别的援助，及在敌人进攻三八线以北地区的情况下，急盼中国人民解放军直接出动援助我军作战。

北京的国庆焰火尚未熄灭，欢乐的人群还议厅，毛泽东主席在紧张严肃的气氛中开始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面临的严重局势。

是日夜间，南朝鲜陆军第 3 师开始越过“三八线”向朝鲜北部进犯。10 月 2 日清晨，麦克阿瑟又根据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决定下达了“联合国军”第 2 号作战命令，命令正在“三八线”南侧集结待命的“联合国军”部队立即从陆地和海上同时越过“三八线”向北进攻。于是，在“三八线”两侧，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攻防战斗。但是，朝鲜人民军因火力、人力大大逊于“联

联合国军”而陷入劣势，被迫向北撤退，顷刻之间，装备有大量飞机大炮和坦克的“联合国军”猖狂北犯，将侵略战火迅速烧向中朝边境。

鉴于这种严重局势，毛泽东主席左思右想之后，于10月2日凌晨2时，给高岗、邓华发出紧急电报称：“（1）请高岗同志接电后即行动身来京开会；（2）请邓华同志令边防军提前结束准备工作，随时待命出动；（3）请邓华将准备情况及是否可以立即出动即行电告。”10月2日午后，高岗匆匆飞抵北京，他早已预测到，毛泽东此次紧急召他进京，无疑是出兵援朝问题，所以他内心已定：这次无论如何再也不能强调边防军准备不充分了。下午3时左右，毛、朱、刘、周、高及代总长聂荣臻等在颐年堂开会。毛泽东一开始就拿出一份电报对高岗说：“这是金日成来的急电，我们都看了，给你看看。”稍后，毛泽东说：“朝鲜的形势已如此严重，现在不是出兵不出兵的问题，而是马上就要出兵，早一天和晚一天出兵对整个战局极为重要。

今天先讨论两个迫切的问题，一是出兵时间，二是谁来挂帅。”高岗首先插问：“挂帅人选不是已决定林总吗？”毛泽东略显急躁地答复说：“挂帅人选原先考虑派粟裕同志，但粟裕确实有病，正在青岛休养，前些日子他托罗瑞卿给我带来的信中谈到病情仍很重，我回信就劝他安心休养吧。后来由于美军和其他帮凶国家的军队大批进入南朝鲜，飞机、坦克大量增加，形势越来越严重，我们认为出兵援朝已不是几个军就能够解决问题的，可能各个野战军将来都要参加援朝作战。根据这一变化，常委几个同志又考虑派林彪同志来挂帅，谁知林彪认为我们国内战争刚刚结束，各方面都未就绪，他强调美国是最大的工业强国，军队装备高度现代化，1个军就有各种火炮1500门，而我们1个军只有36门。美军有强大的空军和海军舰艇，而我们海、空军才刚刚开始组建。我军入朝作战既无空军掩护，又无海军支援，他认为在敌我装备极为悬殊的情况下，如若贸然出兵，必然是“引火烧身”。其严重后果不堪设想。”毛泽东吸了几口烟后接着说：“前些日子我找林彪谈了一次话，说明我们为什么冒险出兵，不出兵将来会有什么结果，出兵有哪些有利条件，对美帝国主义应该采取什么对策，可是林彪表示说他每晚失眠，身体虚弱多病，怕风、怕光、怕声音，哎呀呀，他有这“三怕”怎么率兵打仗呢！”实际上鉴于朝鲜战争发展变化的实际形势，使中国派兵援朝的必要性紧迫性越来越突出，中国援朝志愿军的挂帅人选问题对毛泽东的困扰也就越来越大。经过两昼夜的反复思考后，他考虑到了彭德怀。

（5）彭德怀临危受命。

10月的北京，几场秋雨过后，路旁的杨柳，虽枝叶茂盛，但已略显枯黄。4日下午4时10分，一辆汽车由西郊机场飞速地直奔西直门大街，大街上熙熙攘攘，一派节日的和平景象。旧式的有轨电车，叮叮当地穿来穿去忙个不停。

彭德怀从车内注视着街道两旁的机关、学校门楼上的大幅标语：“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周年。”他感慨地说：“咱们的新中国已经满一周岁了。新中国的诞生真不容易呀！”

这千千万万的生命换来的！这是我们党奋斗了几十年才取得的成果。”听了彭德怀的话，中央办公厅警卫处处长李树槐也说：“是呀！去年10月1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当时天安门广场人山人海热烈沸腾，中央和各大区的领导人差不多都来到北京参加开国大典了，可惜你没有亲眼看到当时欢乐的场面。”彭德怀若有所思

他说：“去年新中国成立时，我正在甘肃武威指挥部队进军新疆哩！不是不想来，而是前线离不开呀！”汽车通过具有民族风格的西四牌楼，很快就进入中南海的西门，然后汽车停在“丰泽园”门前，彭德怀急忙下车，随李树槐向后院的颐年堂走去。

当他来到颐年堂前时，周恩来总理首先迎来与彭德怀握手。周恩来解释说：“彭总，会议下午三点就已经开始了，来不及等你，因为政治局会议定得很仓促，昨天就准备派飞机去接你，可是天气不好，只好推迟到今天。搞得你很紧张吧？吃过午饭了吗？”“吃过了。”彭德怀一边回答一边随周恩来进入会议厅。

毛泽东主席和政治局委员们见彭德怀赶来参加会议，都站起来和他握手。

毛泽东发话道：“老彭，辛苦了，你来得正好！美帝国主义军队已越过三八线了，现在政治局正在讨论我国准备出兵援朝的有关问题，大家正在发表意见，请你也准备谈谈你的观点。”彭德怀坐定之后，猛然发现会议气氛很严肃，包括和他同舟共济，在戎马生涯中度过了几十年的朱总司令见了他也没说几句话，有的同志更是只握手不说话，使他立刻感到这是一次不寻常的政治局会议。由于他来京前，满脑子里装的是如何建设开发大西北的经济问题，对中央召开这样的紧急会议，思想上并无准备，所以他只好侧耳静听。从几个同志的发言中，他才知道对出兵支援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有些不同意见，有的主张不出兵，有的主张暂不出兵，共同的理由是：（1）我国经过了几十年战争的摧残，战争创伤急待恢复，而财政又十分困难；（2）国内还有部分边远地区和沿海岛屿尚未解放，约有100万国民党残余部队和土匪尚急待肃清；（3）广大的新解放区尚未进行土地改革，新建的政权也还不巩固；（4）我军的武器装备远远落后于美军的装备，更无制空权和制海权；（5）由于长期战争的艰苦生活，有些干部和战士产生了和平厌战思想情绪，等等。多加会议的大多数同志认为目前我国的情况是困难重重，出兵问题应慎重从事，聂荣臻元帅后来在回忆这次会议的情况时写道：“总之，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最好不打这一仗。”毛泽东听完与会者的讨论后，对我国是否应该出兵援朝问题，在会议最后讲了以下一段话：“你们说的都有理由，但是别人处于国家危急时刻，我们站在旁边看，不论怎么说，心里也难过。”因为彭德怀是在会议开了两小时后才赶到会场，还不了解会议进行的全部情况，对这事关国家命运的大事，他也就没有轻易发言表态。

第二天上午9时左右，邓小平受毛泽东委托来到彭德怀下榻的北京饭店。他和彭德怀两人在房间交谈约1小时后，即同车去中南海。因为在昨天下午政治局的会议上，彭德怀未曾发言，毛泽东不知道他对出兵援朝是什么态度，而且常委已决定派彭德怀率军入朝，因此想亲自听听他的意见和看看他是什么态度，所以特派邓小平接他来中南海个别交换意见。当彭德怀来到毛泽东的办公室，两人在沙发上坐下后，毛泽东点起一支烟用力吸了一口说：“老彭，据朝鲜来的情况，美军和南朝鲜军队正大批越过‘三八线’，因此政治局今天下午还要继续开会，在昨天的会议上，你没来得及发言，可你都听到了吧，大家摆了很多困难，当然，我们现在确实存在一些困难，有些是严重困难，但是怎样战胜困难，克服困难，我们还有哪些有利条件？不知道你彭老总是怎么考虑的！”彭德怀喝了一口茶，望了望毛泽东疲倦的眼神。直言坦率地说：“主席，昨天晚上我几乎没有睡觉。我把你讲的四句话，反

复思考了几十遍，我体会到这是一个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相结合的问题。如果我们只强调困难的一面，不同美军正向鸭绿江进犯的危急后果联系起来考虑，不仅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难保，就连我国东北边防也直接受到威胁。出兵有利还是不利？经过反复考虑后，我拥护毛主席出兵援朝的英明决策。”毛泽东听着彭德怀的话一边赞同地频频点头，一边兴奋他说：“嗯，好哇！还是你彭老总战略远见，看来你是百分之百地支持我的意见罗！”然后毛泽东又仰躺在沙发上高声说：“我们有些同志，只看眼前，看不到将来，更有人被美国的飞机、大炮吓破了胆！我们过去经历了几十年的战争，不都是以劣势装备战胜了优势装备的敌人吗？”毛泽东的话音越来越高，他的话，显然是有针对性的。

两人又沉默了一会儿后，彭德怀将话题接过来继续说：“我们确有时多困难，大家摆的情况也是事实，但是，敌人也有困难，他们兵力不足，补给线长，从美国本土离朝鲜大约 5000 多海里，我们应全面观察问题。但如果让敌人占领了全部朝鲜半岛，这对我国威胁很大。过去日本人进攻中国就是以朝鲜为跳板，首先进攻我国东三省，然后又以东三省为跳板，大举向关内进攻的，这段历史教训不能忽视。这次我们的作战对象，虽然是在武器装备方面占绝对优势的美国侵略军，我们既不能轻视敌人，但也不能过低估计自己。1947 年胡宗南进攻延安，他的兵力是 24 万人，有空军支援，武器装备几乎都是美式的，比我军装备不知要好多少倍。我军只有 25000 人，只占敌军的十分之一，武器落后，每枝枪平均不过几十发子弹。陕甘宁边区地瘠民贫，人口才 100 多万，为什么我们能打败了胡宗南？一是我们是正义战争，是自卫战争；二是边区群众的大力支援；三是靠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现在我们已取得了全国政权，有几百万军队，有全国人民的支援，我们有对付优势装备敌人的经验，只要我们在战略战术上不犯重大的错误，我们就有信心打败美国侵略军。”毛泽东聚精会神地听完彭德怀叙述的观点后高兴地用手捶了一下沙发大声说：“你分析得对喽！看来我们是想到一起了。现在美军、英军和南朝鲜军队正越过‘三八线’向平壤接近，麦克阿瑟已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发出最后通牒，朝鲜已处于危急时刻，金日成同志要求我国尽快派兵支援朝鲜人民军作战，当前出兵援朝已是关键时刻，如让敌人前进到鸭绿江边，其后果不堪设想啊！”彭德怀同意地说：“主席分析得很对，我们现在就是要和敌人抢时间，不能再举棋不定了。”话题至此毛泽东一面吸烟，一面侧过身来对彭德怀微笑说：“老彭，你看，带兵去支援朝鲜人民军作战，这样艰巨的任务，派谁挂帅合适呢？”彭德怀急问：“我听说中央不是早已决定派林彪同志去吗？”毛泽东即刻紧锁双眉两眼一闭，若有所思地叹了一口气：“是啊，前些天我和恩来、少奇、朱老总商量的一致意见是派林彪去，因为他在整个解放战争时期是东北地区的领导人，是东北第 4 野战军的司令员，现在集结在南满的 4 个军都是原东北地区的部队，一旦打起仗来，首先也要靠东北地区支援。我国长白山地区的地形特点，民情风俗和朝鲜北部的情形大体相似，从各方面考虑，派他去率军援朝，是很合适的。

可是 7 我前些天去征求他的意见时，他精神有些紧张，强调身体不好。每晚失眠，怕光、怕风、怕声音，硬是不接受任务。”毛泽东吸了一口烟继续说：“现在很明显，这场战火很快就会烧到我国的大门口，情况危急哟！我们必须当机立断，马上出兵。既然林彪说他有病不能去，常委几个同志商量的意见，这副重担，还是请你彭老总来挑，这是一场比保卫延安更艰苦复

杂的战争，不知你的身体情况怎样？你可能思想上还没有这个准备吧，你考虑有什么困难？”说到这里，毛泽东两眼注视着彭德怀。此时，屋里呈现短暂的沉寂。片刻之后，彭德怀面对毛泽东，两道浓眉一扬，刚毅果断地说：“主席，我这个人的脾气你很了解，我服从中央的决定！”“还是你老彭在中央为难之时，坚决支持和服从中央的决定，这我可就放心了。现在美国已大批向北冒进，我们不能再等待，要尽快出兵，今天下午政治局继续开会，请你说说你对出兵援朝的意见，摆摆你的观点。”深为感动的毛泽东略带感叹地讲。

10月5日下午，中央政治局继续在颐年堂开会，对是否出兵援朝问题再次进行讨论。

在发言中，仍有两种观点，即强调国内困难很多，主张不出兵或暂不出兵，彭德怀对出兵援朝问题早经过反复考虑，遂胸有成竹地讲了自己的观点，即：出兵援朝是必要的，打烂了，最多就等于解放战争晚胜利几年就是了。如让美军摆在鸭绿江岸和台湾，它要发动侵略战争，随时都可以找到借口。如等美国占领了朝鲜半岛，将来的问题更复杂，所以迟打不如早打，这样对国内外的反动气焰和亲美派也是个沉重打击。

在彭德怀发言后，毛泽东显然心中早已有数，他向会场环视一周后，用手敲打着桌面说：“我们国内当前存在着一些困难，这是事实，但我认为今天老彭的发言是一针见血，很有说服力。现在是美国人逼着我们打这一仗的，犹豫退缩、担惊害怕都没有用，这些心理和情绪正是敌人所希望的。现在我们只有一条路，就是在敌人进占平壤之前，不管冒多大风险，有多大困难，必须立刻出兵朝鲜。关于由谁挂帅的问题，既然林彪说他有病已前往苏联养病，我提议由彭德怀同志率领志愿军入朝，协助朝鲜人民军抗击敌人。至于志愿军入朝具体部署和细节，会后我们再和彭德怀同志研究。”在毛泽东发言之后，会场上严肃紧张的气氛顿时活跃起来，大家都以尊敬的目光投向彭德怀，一致同意由彭德怀挂帅率军援助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对此，彭德怀没强调任何困难，立即站起来表示：“我还是那句老话，服从中央的决定。”10月6日上午，彭德怀又参加了由中央军委周恩来副主席主持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

这次会议就志愿军入朝方案，更换武器装备，后勤供应办法和抽调干部组建彭德怀指挥所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并作出了有关决定。会议还决定，议定的各项工作均由代总参谋长聂荣臻负责筹办。

紧张的抗美援朝临战准备工作，是在绝对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朝鲜战场日益严重的局势，使彭德怀不能在北京久留。

10月7日吃过早饭后，他指示秘书把从西安带来的全部文件，清理登记后，马上移交给中央办公厅保密室保存。然后准备出发。当天，彭德怀到中南海毛泽东住处，和高岗一起共同研究志愿军出国第一步作战方案和后勤供应问题，关于彭德怀指挥所设立的位置，毛泽东的意见，为保证安全，免遭敌机轰炸可设在鸭绿江北岸一个隐蔽位置。但彭德怀不同意，彭主张过江入朝与金日成在一起，以便协调两军统一指挥作战。

关于志愿军出国作战前后的宣传报道问题，彭德怀向毛泽东提议：“在战斗打响之前，应绝对保密。打响之后，新华社在报道和广播方面也应注意分寸。要设法转移敌人的视线，使其产生判断上的错觉，以便我军各路部队迅速隐蔽过江投入战斗，取得战斗的主动权和有利战机，力争初战的胜利，

以提高士气，稳定人心，扭转被动局面。”千斤的重担，紧张的工作，使彭德怀废寝忘食地忙碌了一天，直到晚上才赶回饭店。因为次日就要离京，他首先进屋看了这两天接来和他短暂团聚的侄儿侄女们，此刻他意识到，这次离别后，何时再见很难预测，遂把他给孩子们买的衣物分给每个人，然后语重心长他说：“伯伯明天就出发执行任务去了，你们要好好学习，不要想家，要经常给妈妈写信，把你们在北京的情况告诉妈妈。”幼小天真的孩子们立刻反问：“伯伯，你明天到哪里去？还是回西安吗？”彭德怀拍拍孩子们的肩膀笑道：“等你们长大了就会知道的，你们现在的任务就是好好学习。”接着他叫来秘书吩咐说：“你和小郭把我们需要带的东西今夜准备好，明晨出发。”10月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以特急电报发布命令，内容如下：1. 为了援助朝鲜人民解放战争，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们的进攻，藉以保卫朝鲜人民、中国人民及东方各国人民的利益，将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迅即向朝鲜境内出动，协同朝鲜同志向侵略者作战并争取光荣的胜利；2. 中国人民志愿军辖13兵团及所属38军、39军、40军、42军及边防炮兵司令部所属之炮兵1师、2师、8师，上述各部须立即准备完毕，待命出动；3. 任命彭德怀同志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4. 中国人民志愿军以东北行政区为总后方基地，所有一切后方工作和供应事宜以及有关援助朝鲜同志的事务，统由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高岗同志调度指挥并负责保证之；5. 我中国人民志愿军进入朝鲜境内必须对朝鲜人民、朝鲜人民军、朝鲜民主政府、朝鲜劳动党及朝鲜人民的领袖金日成同志表示友爱和尊重，严格遵守军事纪律和政治纪律，这是保证完成军事任务的一个极重要的政治基础；6. 必须深刻地估计到各种可能遇到和必然会遇到的困难情况并准备用高度的热情、勇气、细心和吃苦耐劳的精神去克服这些困难，只要同志们坚决勇敢、善于团结当地人民，善于和侵略者作战，最后胜利就是我们的。

同一天，毛泽东还亲自起草了发给我国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大使倪志亮转金日成同志的特急电报，电文如下：1. 根据目前形势，我们决定派遣志愿军到朝鲜境内，帮助你们反对侵略者；2. 彭德怀同志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司令员兼政治委员；3. 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后方勤备工作及其它在满洲境内有关援助朝鲜的工作，由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高岗同志负责；4. 请你即派朴一禹同志（内务相）到沈阳与彭德怀、高岗二同志会商与中国人民志愿军进入朝鲜境内作战有关的诸项问题。彭、高二同志由北京去沈阳。

10月8日晚上，当倪志亮大使和参赞柴军武将此电报面交金日成首相时，他高兴得两手一拍说：“太好了！”他立刻用手分别拉着倪、柴两人的手进入会客厅，随手拿出几瓶酒请倪、柴一起喝酒言谈。其间他一再对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和中国人民的大力支援表示深深的感谢，并称赞中朝两国人民的战斗友谊将永垂青史。

（6）斯大林临阵犹豫。

关于出兵援朝问题，本来中苏双方早已商定：地面兵力由中国负责。空军掩护支援由苏联负责。因此当中共中央于10月2日决定出兵援朝后，毛泽东于当日深夜即将决定电告斯大林，以便苏联空军作出准备。但是当8日晚周恩来飞抵莫斯科后，被告知斯大林正在苏联南方黑海之滨克里米亚附近的阿布哈季亚别墅休假，9日上午周恩来和翻译师哲在苏联元帅布尔加宁

的陪同下，乘苏联政府专机飞抵克里米亚，然后乘汽车前往克里米亚以东的阿布哈季亚，当晚7时与斯大林开始会谈。苏方参加会谈的有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贝利亚、米高扬、布尔加宁和莫洛托夫。会谈主要协商在中国志愿军入朝时，苏联能出动多少战斗机和轰炸飞机支援中国援朝志愿军，并由谁担任指挥，以及中国地面部队更换苏联武器装备等问题。

出乎预料的是斯大林根据朝鲜战争10月2日以后的事态发展，判断美国已不惜代价和风险，决心向鸭绿江边中苏边境进攻。他担心如苏联空军在中、苏、朝边境与美国飞机和地面部队作战，可能会引起苏美之间的直接军事冲突，有诱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危险。所以，在出动空军支援中国志愿军作战的立场上犹豫后退了。

斯大林在与周恩来的谈判中，明确表示，苏联可以先给中国20个师的武器装备并尽快运到满洲里，但是苏联空军目前尚未准备好，暂时无法出动。其实，空军和陆军不同，飞机调动转场不过两三天就可准备完毕，而当时还有10天准备时间，完全可以作好一切准备工作。斯大林的态度，不过是犹豫推委之意。

中苏这次高级会谈直到次日凌晨5时才结束，中方代表周恩来对这一突然变化大吃一惊，立刻感到事关全局，于是他在苏外长莫洛托夫陪同下，赶紧于10月10日飞回莫斯科，在中国大使馆将苏联空军暂时不能出动的情况迅速电告毛泽东。

毛泽东10月10日下午收到周恩来的电报未曾料到的突然情况立即使他陷入焦虑之中，是马上出兵还是暂缓出兵呢？当夜他又突然收到彭德怀自安东发来的准备11日晨入朝与金日成会谈的电报，这两份电报使他翻来覆去更感决心难定。经与代总长聂荣臻商谈后，他决定立即给彭德怀发电，通知彭明天先不要入朝而是和高岗一起迅速回京开会。

这时已是深夜，聂荣臻考虑万一明晨以前彭德怀收不到电报，彭就将入朝会见金日成，于是聂荣臻于11日晨1时左右赶到总参谋部作战室给彭德怀打电话：你来电已收到，原定方案有变化！

有变化！主席请你和高岗明天迅速回京，中央有要事讨论。”10月11日下午，彭德怀奉命带了指挥所负责人成普由安东乘火车于深夜抵沈阳。12日，彭德怀在沈阳和高岗召集东北局和东北军区的领导紧急开会，针对他在安东调查到的部队存在的困难，特别是后勤供应问题研究了一些紧急措施和解决办法。当晚8时，彭、高又接到毛泽东急电：（1）10月9日命令暂不实行，13兵团各部仍就地进行训练不要出动。

（2）请高岗、德怀二同志，明日来京一谈。

13日早饭后，高岗、彭德怀即乘专机由沈阳飞回北京，由聂荣臻代总长在北京饭店迎接，聂说：“下午要召开政治局会议，对出兵问题再次讨论。”在彭德怀与高岗奉命回北京之前，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已全部越过“三八线”，并已作好大举进攻平壤的准备。10月9日麦克阿瑟以威逼口吻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领导人发出最后通牒：最后一次要求你和你指挥下的军队，立即放下武器并停止作战。

10月10日下午4时，印度驻中国大使潘尼迦又到我国外交部转交了英国外交大臣贝文致我国外交部部长周恩来的电报，称：“如果北朝鲜不愿放下武器，那么‘联合国军’统帅将无他途可循。”面对敌人大军压境威胁吓的情况，金日成首相于10月10日紧急召见我国驻朝鲜临时代办柴军武同

志，明确表示：“我们决不会放下武器，决不会投降，我们要抵抗到底。”11日金日成首相以誓死保卫祖国的决心向朝鲜全国发表广播说：“今天我们最重要的任务是用鲜血保卫祖国的每一寸土地。”10月13日下午，毛泽东主席再次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了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彭德怀在会议上汇报了三个问题：（1）与朝鲜代表朴一禹会谈的内容。（2）当前侵朝“联合国军”兵力部署和动向。（3）志愿军各部备战情况和存在的亟待解决的问题。

经彻夜会议后，政治局同志一致认为，即使没有苏联空军的支援，也必须立即出兵援朝。

会议号召要自力更生，发扬我军历史上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敌人的丰富经验，克服各种困难，即刻入朝迎击冒犯之敌。

聂荣臻元帅在回忆毛泽东主席在政治局会议上对是否出兵援朝作战时写道：“对于打不打的问题，毛泽东同志也是左思右想，想了很久。

毛泽东同志对这件事确实是思之再三，煞费心血的，最后才下了决心。中央作出最后决定后，彭德怀为防止部队对出兵援朝产生怀疑和松懈情绪，立刻在中南海给与他同机飞回北京正在军委作战部待命的成普打电话，让他给志愿军参谋长解方发出急电，要求志愿军各部仍要继续作好出国准备。”就在13日政治局会议结束后的当晚，毛泽东给仍在莫斯科的周恩来发了火急电报：与政治局的同志商量结果，一致认为我军还是出动到朝鲜为有利……我们采取上述积极政策，对中国、对朝鲜对东方、对世界都极为有利。而我们不出兵，让敌人再压至鸭绿江边，则对各方却不利，首先是对东北更不利，整个东北边防军将被吸住，南满电力将被控制。总之，我们认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

政治局紧急会议结束后，毛泽东还与高岗、彭德怀进一步研究了志愿军出国时间、渡江方案，以及东北对志愿军后方供应保障问题。

14日清晨，由于天气不好，飞机飞行有困难。根据毛泽东的指示，高岗先乘火车离京返回沈阳，立即召集志愿军、东北军区和东北局的负责人开会，传达了政治局的最后决定。

宣布立即作入朝的各项准备，并决定准备召开参战部队师以上干部动员大会。

14日全天，毛泽东与彭德怀又详细研究了志愿军的出兵和作战方案，最后确定志愿军各部于10月18日或19日分批渡江，先在平壤以北适当山岳地区组织防御，待机歼敌。

10月14日21时，毛泽东将中共中央政治局10月13日作出的关于立即出兵援朝的决定和第一步作战方案电告周恩来，其要点如下：（1）我已告彭德怀在他到德川研究情况后，在平壤至元山铁路线以北，德川、宁远公路线以南地区构筑两道至三道防御阵地。如敌来攻，则在阵地前面分割歼灭之；（2）美军进攻到平壤需要时间，由平壤再向德川进攻又需要时间；（3）我军决于10月19日开动，全军26万人渡过鸭绿江需要10天时间；（4）为准备在11月内在敌进攻德川区域时，打一个胜仗，我们决定12个步兵师3个炮兵师均开进为好；（5）在我军开进修筑工事期间，朝鲜人民军方面还是继续抵抗，尽可能迟滞美伪军前进为有利。

毛泽东为什么将上述决定告知周恩来？因为“斯大林本来希望我们出动6个师”而中央根据彭德怀的建议改变了原来的方案，将12个步兵师和3个炮兵师及战车团、高炮团、工兵团等全部出动。中央认为这种改变出兵

方案，有必要通告苏方，以便苏联方面了解我国出兵情况，从而尽快解决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困难。

10月15日清晨，彭德怀乘飞机自北京飞回沈阳。这一天他在沈阳一面部署志愿军出兵援朝的各项准备工作，一面又利用短暂时间视察了鞍山钢铁厂和沈阳兵工厂。因为他知道东北是我国重工业基地，打仗要靠重工业，战争的胜负，除了人是主要的因素外，武器是重要的因素。

当他在沈阳参观了刚试制生产的六管火箭炮实弹射击后，又惊又喜地称赞工厂的负责同志说：“你们工作很有成绩！我们也有自己的火箭炮了。”他还亲切地鼓励职工们加紧生产，支援前线，要在技术上精益求精，并指示工厂领导要采取措施，改善工人的生活条件和劳动条件。

15日，由于敌军已全面开始围攻平壤，平壤危在旦夕。金日成首相特派副首相兼外务相朴宪永前来沈阳会见彭德怀。朴向彭说明敌军已逼近平壤，金首相要求中国尽快出兵，并希望与彭德怀同志早日会面，彭德怀告诉朴：“我们中央已最后决定，预定自10月19日开始，部队分批渡江，希望人民军继续阻击敌人，迟滞敌人，我同高岗今天要赶赴安东，去布置13兵团部队渡江计划……”。

（7）蒋介石三度准备出兵朝鲜。

1950年6月25日晚，蒋介石在收到驻南朝鲜大使邵毓麟关于朝鲜战争的报告同时，也收到了李承晚由其驻台湾的大使面交的告警求援急电：他当即向李承晚驰电声援，并予以鼓励，表示将来取有效步骤对南朝鲜进行援助，同时在台北阳明山“总统官邸”召集紧急军政会议，出席人员中有陈诚、王世杰、谷正纲、黄少谷、张道藩、张群、雷震、张其昀、吴国桢、俞大维、叶公超、何应钦、周至柔、孙立人、王叔铭、桂永清、蒋经国、黄镇球、彭孟缉等。会上决定台湾、澎湖、金门、马祖地区从6月26日零时（即25日午夜后）起，全面进入紧急备战状态，实行宵禁，停止三军官兵的休假和外宿，加强台湾海峡和大陆沿岸的海空巡逻，加强各岛及台湾海防的战斗准备，加强台湾的防空和民防措施，加强对交通运输和经济活动的管制，加强特务活动。台湾岛顿时处于弓上弦，刀出鞘的临战状态。

据麦克阿瑟派到台湾担任联络的费尔德上校和汉斯上校透露，1950年6月25日清晨朝鲜战争爆发后，当天一早，麦克阿瑟在东京就得到了布朗（驻南朝鲜军事顾问团团团长）和穆西奥（驻南朝鲜大使）的战况报告，立即同正在东京的约翰逊和布莱德雷、塔斯塔德举行紧急磋商。

中午和下午又陆续得到了朝鲜战况的进一步报告，获悉：南朝鲜第一师在瓮津、开城被歼，第七师被击溃，春川被围，江陵失守，共军主力指向汉城。麦克阿瑟、约翰逊、布莱德雷和诺斯塔德再次开会到深夜，会上，麦克阿瑟提出了一份“在亚洲遏制共产党的战略计划”，经约翰逊、布莱德雷等人研究赞同后，交由约翰逊向杜鲁门转达。该计划的主要内容是：1、立即援助南朝鲜，并建议由台湾调一个军驰援南朝鲜；2、认为台湾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应以海空军保卫该岛，并给予蒋介石以广泛的军事援助；3、加强菲律宾和印度支那的军事力量；4、保卫日本的安全。征得约翰逊和布莱德雷同意后，麦克阿瑟连夜派出以费尔德为组长的“驻台湾军事联络组”进驻台湾，同时致电蒋介石，通报朝鲜战况和向台湾派驻联络组的决定，并询问蒋介石在确保台湾安全的前提下能否派一个军驰援南朝鲜以及台湾所急需的援助，并请蒋介石严密监视大陆中共的动态，对大陆沿海采取积极的行

动，以探测中共对台湾进攻的紧迫性。

6月26日晨，李承晚再次向蒋介石急电求援，蒋介石便立即召集陈诚、俞大维、叶公超、周至柔、孙立人、王叔铭、桂永清、黄镇求、彭孟緝、萧毅肃、俞济时和王世杰等在阳明山“总统官邸”开会，直到深夜。

26日中午稍过，差军驻台湾军事联络组在组长费尔德率领下，由东京飞达台北。“国防部”厅长赖名汤、刘廉一前往接待，并陪同费尔德到阳明山会见蒋介石，费尔德向蒋面交了麦克阿瑟的亲笔信件。

当蒋介石“得悉北朝鲜发动了全面的武装进攻，已断定南朝鲜将难以进行有效的抵抗，所以他首先考虑的是用什么办法及时地对南朝鲜作有效的援助，以“击破北朝鲜共军的进攻”。蒋介石同费尔德等人从外交到军事，从保卫台湾到援助南朝鲜等各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决定派遣52军（附3师）立即作开赴朝鲜战场的准备，并对52军的干部配备、兵员装备的补充更换、运输等问题作了部署。当天下午蒋介石分别向李承晚、麦克阿瑟复电，表示一经同意，52军即可经空中和海上运赴朝鲜战场，投入战斗。同时通过外交程序向杜鲁门提出这项建议。

在美国布莱尔大厦杜鲁门召集的晚餐会宣读麦克阿瑟关于“在亚洲遏制共产党扩张的计划”时，宣布了蒋介石的这项建议。当时，约翰逊、布莱德雷和柯林斯从朝鲜战争的实际需要和军事原则考虑，都主张接受蒋介石的建议。杜鲁门也表示：当他听到蒋介石愿意派兵援助南朝鲜时，他的“第一个反应是应当接受蒋委员长的这番好意”。他并且希望看到有尽可能多的联合国会员国积极地参加“对朝鲜的行动”，他还希望联合国发出号召并组织行动。

国务卿艾奇逊则对台湾出兵南朝鲜一事坚决反对，他说：“当前台湾是最容易受到攻击的地区，麦克阿瑟明确指出了这个危险，所以我们才决定派第7舰队和13航空队去保卫台湾，怎么反而叫台湾跑到别处去保护他人呢？况且蒋介石的军队并不见得比南朝鲜军队高明。这样就不如把这些需要给蒋介石的装备直接送给南朝鲜，其效果是可以预期的。”约翰逊马上进行辩解，说台湾只是缺乏海空军，其地面部队在亚洲地区的反共国家中却是最强大的。蒋介石要求派去支援南朝鲜的52军，是蒋介石在东北的60万军队中唯一没有被中共消灭的一个军。约翰逊认为在第7舰队进入台湾海峡后，从台湾调52军去增援南朝鲜是可取的。杜鲁门看到双方相持不下，争论不休，遂宣布暂予搁置，望待下次会议再从长计议。

6月27日，麦克阿瑟又向杜鲁门告急，并再次请求批准蒋介石的建议。而艾奇逊却将地收到的建议蒋介石出兵的电报擅自扣压，并继续反对讨论蒋介石派兵援助南朝鲜的建议。

6月28日，蒋介石驻美大使顾维钧和胡适在白宫会见杜鲁门时，面交了蒋介石建议派军驰援南朝鲜的电报副本。杜鲁门表示他是十分愿意接受蒋介石的意见，同时答应将扩大对台湾的军事援助。

麦克阿瑟于6月29日，从朝鲜前线视察回到东京后，第三次急电杜鲁门，请其从速采纳蒋介石的建议。空军参谋长范登堡上将也向杜鲁门进言，应当接受麦克阿瑟的请求，批准蒋介石的建议。杜鲁门、约翰逊、布莱德雷、柯林斯都主张动用蒋介石的52军，而不急于使用在日本的两师美军。他们认为，这样做不但可以争取时间，及时稳定战局，并且可以减少美军的伤亡损失，使有限的美国地面部队能够在紧急情况时使用到别的更重要的地方

去。

可是，艾奇逊和国务院却一致反对。艾奇逊用一种歇斯底里的神情提醒约翰逊和布莱雷德等人注意中共 6 月 28 日声明所包含的严重性和蒋介石关于援助南朝鲜声明发表后在西方盟国中所引起的震动和惊愕（注：中共声明即 6 月 28 日周恩来针对杜鲁门的 6 月 27 日所发表的声明。蒋介石声明，系指蒋介石在 6 月 26 日晚广播讲话中所讲对南朝鲜将进行军事援助和派兵驰援的事）。艾奇逊说：“中共的声明不只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威胁，而且是他们打算出兵干涉的预兆。如果蒋介石的军队开进朝鲜打击北朝鲜共军，毫不怀疑，中共必将加倍地进行还击。那样一来，朝鲜战争马上就会扩大，局势的发展也必然难于控制，其结果不仅美国将要深深地陷进去，而且会把我们的盟友吓跑。”蒋介石的建议和麦克阿瑟的三次请求，终于在艾奇逊的阻挠下，于 6 月 30 日被杜鲁门最后否决。

7 月 1 日，52 军各部队也先后收到命令，重新恢复正常的军事训练和沿海的防卫施工。

蒋介石二度准备出兵朝鲜是美军在朝的“圣诞节攻势”遭到了彻底失败之际，当时美第 8 军和 10 兵团都面；临着极其危险的处境，麦克阿瑟立即请求采取下列步骤，以期挽回败局，减少美军伤亡：（1）紧急从台湾空运一个军增援第 8 军，进而救援在东线被围的第 10 兵团向兴南突围。

（2）请求授权他派飞机轰炸中国境内的军事目标，并封锁中国的海岸。

（3）促使蒋介石在华南、华东地区采取积极的军事行动以牵制中共，使其不敢向朝鲜战场增兵。

同时致电蒋介石告以南朝鲜在战争中的危急情况，请其仍派 52 军前往朝鲜战场解第 8 军之围，并说已分别从冲绳和菲律宾派出飞机和船艇载着补充 52 军的武器装备驶向台湾，以接运该军从空中和海上驰赴平壤地区。

麦克阿瑟希望 52 军从速完成作战准备，一俟杜鲁门总统批准，即可启航赴朝。他还请蒋介石火速派出一个参谋指挥军官代表团，立即飞赴汉城，会晤联合国军司令部参谋长诺斯塔德和第 8 军军长华克，当面商定 52 军到朝鲜战场后有关问题。

11 月 28 日上午，蒋介石收到了麦克阿瑟的上项电报，下午便在阳明山召集紧急军事会议。参加者有周至柔、肖毅肃、侯腾、孙立人、王叔铭、杜永清、黄镇球、刘玉章、胡涟、刘安祺、唐守治、阙汉騫、赵家骧、陈麓华、郭永、王楚英、杨敬斌、何志浩、刘明奎，另外还有陈诚、俞大维、叶公超、王世杰、蒋经国及其美军联络组长费尔德等。蒋介石扼要说明朝鲜的战局和麦克阿瑟的请求后，宣布：仍然决定派 52 军驰援南朝鲜，限 24 小时内完成出发准备，要求空军加强对大陆的侦察，海军及金门、马祖的防卫部队要加强战备，随时应付共军的进攻；空军、海军均应密切同第 7 舰队及驻台美国空军的联系；另就加强台湾防务和增援前线岛屿作战的问题，52 军的战备问题及将运到台湾的武器装备的接收处理问题等，进行了研究并作出了决定。

同时他又指派侯腾、陈麓华、郭永、王楚英于 29 日凌晨飞往汉城，同华克等商洽 52 军到达朝鲜战场后的作战行动及其他有关事项。

麦克阿瑟于 28 日急电杜鲁门，要求空运台湾的 52 军驰援南朝鲜，杜鲁门接电后立即召集国防部和国务院有关首脑会议，研究有关问题。

虽然柯林斯和布莱德雷主张接受麦克阿瑟的意见，空运台湾的 52 军援

助南朝鲜并轰炸中国东北，但艾奇逊、杜鲁门都害怕苏联出兵和中共增加兵力，再加上英国的反对，杜鲁门于 29 日复电麦克阿瑟拒绝其建议。麦克阿瑟一气之下，又于 12 月 3 日再次给杜鲁门发去一份措词激烈的电报，电述朝鲜局势严重，如不采纳他的建议，后果不堪设想，但是，杜鲁门不仅不为麦克阿瑟的威胁所动，而且下决心要除掉麦克阿瑟，遂于 12 月 6 日给麦克阿瑟下了一道严厉的命令：(1) 禁止他采取任何未经许可的行动，并责成他用现有的兵力保住阵地并尽力保存实力。

(2) 禁止他发表任何未经国务院批准的政策性声明但麦克阿瑟却不甘心受杜鲁门的桎梏，分别向马丁、惠里等申述他与杜鲁门、艾奇逊在朝鲜、台湾问题上的不同观点。他已知道杜鲁门正在策划除掉他的步骤和设置整他的圈套，但出于与蒋介石的密切关系和要全力给予支援的目的，他在 12 月 6 日电告蒋介石取消 52 军行动计划的同时，向美国国防部建议将驻台联络组升格为“美国协防台湾军事顾问团”，保荐骑一师少将师长蔡斯任团长，进一步扩大对蒋介石的军事援助，并把南朝鲜的兵力扩充到 30 万人，再编 25 个师。这项建议在马歇尔、布莱德雷的赞同下，很快被批准，52 军驰援南朝鲜的行动于 12 月 6 日第 2 次被取消了。

蒋介石前两次要派 52 军驰援南朝鲜之事已成为过眼烟云。但是，到了 1952 年 5 月，在李奇微调往欧洲，克拉克到东京上任不久，又刮起了一阵“从台湾调一个军去朝鲜战场替换美军”的风。于是，第三次从台湾国民党调 52 军开赴朝鲜战场作战的计划又在东京、台北、华盛顿之间热烈地讨论起来了。克拉克由意大利调到东京后，发现在苏联虎视眈眈之下，日本的防务极其空虚，除 7 万 5 千名警察外，竟无一营美国的地面部队，他非常吃惊，遂向五角大楼和白宫建议：从台湾抽一个军到朝鲜战场，以便从朝鲜战场抽出 3 师美军去防守日本。他满以为这项建议能获得通过，遂同时电告蒋介石预作准备。蒋介石明知只要杜鲁门还在白宫、艾奇逊还当国务卿，从台湾派军队去南朝鲜的事就永远无法实现，但他为了配合克拉克的行动，还是叫孙立人进行准备。到了 6 月下旬，艾奇逊又顶住了五角大楼和国会的压力，再一次使杜鲁门拒绝了克拉克的建议。克拉克深怀歉意致电蒋介石，请其撤销 52 军支援南朝鲜的安排。自此之后，52 军驰援南朝鲜一事就再也无人提起了。

(8) 志愿军跨过鸭绿江。

就在中国人民志愿军积极准备渡江出国与美军作战的同时，在美国方面，却出现了十分乐观的气氛。美国五角大楼的官员们认为“苏联和中国出兵干涉的时机已过”。所以他们判断美军在向鸭绿江边前进时，不会受到阻碍。

麦克阿瑟猖狂扬言要在感恩节（1950 年 11 月 23 日）前占领北朝鲜，直达鸭绿江边。

他曾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联合国军的空军具有绝对优势，共产党人要跨过鸭绿江进入朝鲜，他们的军队就会损失一半”，“红色中国的干预会被迅速报复的威胁所吓住。”美方要员们根本就没把中国放在眼里，更没料到经过长期战乱、百废待兴的新中国竟敢与美国相抗衡。这些错误的判断，是美国政府的战略上的重大失策，也是导致美军在朝鲜战场上失败的基本原因。彭德怀在安东部署渡江方案时曾说：“麦克阿瑟越猖狂，对我们越有利，我们可以利用敌人的错误判断，隐蔽渡江，对敌人进行突然反击。”毛泽东

在此时也来电指示，“我各部派遣的援朝志愿军侦察队，均要扮装成朝鲜人民军，而不要称中国人民志愿军，借以迷惑敌人。”同电又指出：“稳定改变战局的关键，在于能不能利用突然袭击。”美国总统杜鲁门的头脑毕竟还是比较清醒些，他在进入10月以来，不断收到来自各方面判断中国可能要出兵的情报。这些情报有的估计：“中共在满洲已集结了30万人的兵力。”有的估计“中共约有45万人的军队正在满洲集结”，这使杜鲁门“对中国在北朝鲜进行干涉的可能性日益担心。”于是杜鲁门紧急决定，必须和麦克阿瑟进行当面磋商，以便从麦克阿瑟那里得到关于中国出兵的第一手材料和判断。

10月15日，杜鲁门由华盛顿乘飞机经过30个小时的飞行，飞抵太平洋上的威克岛，与麦克阿瑟当面谈。杜鲁门问：“中国进行干涉的可能性怎样？”“可能性极为微小。中国在满洲约有30万军队，其中不超过10万至12.5万人部署在鸭绿江边，但只有5万至6万人能够渡江作战，他们没有空军，如果中国人试图前进到平壤，那将会出现一场最大规模的屠杀。”麦克阿瑟毫不含糊地回答。他向杜鲁门断言保证：“朝鲜战局是赢定了。中国共产党人不去进攻，我认为到感恩节，正规抵抗在整个朝鲜就会终止。”杜鲁门和麦克阿瑟的会谈，使美国政府认为侵朝战争已近尾声。于是杜鲁门亲自授予麦克阿瑟一枚像叶勋章，以示对麦克阿瑟在朝鲜所谓卓越功绩的表彰后，于10月16日返回美国旧金山。17日杜鲁门得意地向全国发表广播演说：“我们在美国国内的人们对我们自己的陆、海、空军和陆战队战士们的卓越成就特别感到自豪。联合国要求我国为联合国提供第一位司令官也是我们莫大的光荣。我们有这么一位合适的人选来完成这个历史使命，真是全世界的幸运，这个人就是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一个非常伟大的战士。”就在杜鲁门和麦克阿瑟为暂时的胜利兴高采烈的同时，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彭德怀司令员的领导下，正紧张地为出国作战加速准备工作。

17日上午，彭德怀指示参谋长解方带作战参谋龚杰随朴宪永过鸭绿江到达新义州李委员长处，商谈彭德怀司令员和志愿军渡江后进一步展开行动的具体安排。下午，彭德怀与高岗乘飞机返回沈阳与东北局、东北军区等领导同志进一步研究志愿军出国作战的装备器材，被服和医院的保障问题。

但此时，彭、高突然又接到了邓华和洪学智的来电称：昨日渡江部署会议结束后，经过讨论许多同志表示，现在部队高射炮太少，又无空军支援，敌人可集中大量飞机、大炮、坦克，毫不顾虑地向我阵地进行大规模攻击。而朝鲜多为山地水田，天寒地冻，工事更不好挖，如敌大举进攻，则阵地很难坚持。大家认为，各项准备工作也不充分，政治思想未普遍深入动员，建议渡过冬季明春再出动为宜……。

彭德怀和高岗接到来电后，感到此事有关战略全局，问题重大。正好这时又接到了毛泽东17日下午5时发来的急电，令他俩于18日乘飞机火速回京。这县因为周恩来定于18日自莫斯科回北京，所以毛泽东电告彭、高：“对出兵时间，以待周18日回京向中央报告后确定为宜。”并要求彭、高紧急回京参加中央会商。

18日清晨，彭德怀与高岗乘飞机返回北京，当面向毛泽东主席汇报了渡江部队的情况和邓、洪17日来电内容。

此时敌进甚速，平壤告急。就在当日晚召开的中央会议上，当周恩来和彭德怀各自汇报了情况后，毛泽东主席最终决断说：“现在敌人已围攻平

壤，再过几天敌人就进到鸭绿江了。我们不论有天大的困难，志愿军渡江援朝不能再变，时间也不能再推迟，仍按原计划渡江。”随后毛泽东又指示彭德怀先以电话通知邓华、洪学智等，要求志愿军各部队严格保密，严密伪装，立即进行政治动员，补足食品弹药，召开誓师大会，立即准备出国作战。

彭德怀奉毛泽东指示，以毛泽东的名义，给邓、洪、韩、解及东北军区副司令员贺晋年发出了特急绝密电报。电文如下：邓、洪、韩、解并告贺副司令：四个军及三个炮兵师决定按预定计划进入朝北作战。自明（19日）晚从安东和辑安线开始渡鸭绿江。为严格保守秘密，渡江部队每日黄昏开始至翌晨4时即停止，5时以前隐蔽完毕，并须切实检查，为取得经验，第一晚（19晚）准备渡两个至三个师，第二晚再增加或减少，再行斟酌情形。

余由高岗、德怀面告。

毛泽东。

10月18日21时。

同一天，为加强和统一志愿军司令部的指挥机构，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决定：“彭德怀的临时指挥所与团部（即原东北边防军司令部）合并，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邓华、洪学智、韩先楚为副司令员，解方为参谋长。”当此紧张时刻，一个统一的精干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正式成立了。同时志愿军各路渡江部队亦开始向鸭绿江边急速开进。中华人民共和国伟大的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战争的序幕就此揭开了。

10月19日清晨，彭德怀、高岗由北京乘飞机火速赶回安东。当天黄昏时分彭德怀仅带了一名参谋，两名警卫员和一部电台乘一辆吉普车，在渡江部队的先头，开始跨过鸭绿江大桥。

在硝烟弥漫、炮声隆隆的朝鲜战场上，我党我军的一代名将——彭德怀又开始导演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为威武雄壮的一幕战争活剧。

这场战争，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经过3年的浴血奋战，打败了不可一世的美军，实现了朝鲜停战，保卫了世界和平和祖国人民的安宁！

第四部 西藏和平解放始末

（1）伸自大西洋的黑手。

1949年的春天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季节。

国民党政府的即将覆灭使西藏一部分亲帝上层人士看到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深夜，古城拉萨刮着干冷凄清的季风。贵族府邸的深宅里，古刹名寺的密室里，黑影憧憧，酥油灯摇曳；神秘的电波在夜空颤动，如同星光在天河里颤动……一个眼睛碧蓝戴着雪白手套的外交官，频繁出入于西藏地方政府——噶厦的官邸。还有一些来历不明的外国人像是赤尾狐那样诡秘地出没于豪门巨户……当这个春天即将逝去的时候，暗夜中的策划已经接近完成了。

1949年7月8日，噶厦政府通过印度噶伦堡电台，通知国民党政府及其驻西藏办事处：“为防止赤化的必要措施，决定请彼等及其眷属立即准备离藏内返。”就在同一天，噶厦政府的三位噶伦和基巧堪布，会见国民政府

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代处长陈锡章。首席噶伦然巴说：国共内战打得很厉害，国民党在哪里共产党就追到哪里，为避免在藏国民党官员把解放军招引进来，西藏官员大会决定：西藏政府与国民政府暂时断绝政治关系，请国民政府驻藏办事处人员两周内离藏赴印，转道回内地。

随后，大批手持英式枪的噶厦兵，包围了国民党政府驻藏办事处，电台被查封，学校被关闭，测候所被抢占；那些“共产党汉人”嫌疑人员，更是依照秘密提供的名单被一一拘留。从拉萨到西藏各地，乃至严密布防的藏东重镇昌都，无不刮起一股驱逐汉人的黑风。国民党驻藏机关的官员眷属和其他汉族人员二百多人，被严密监视，于7月11日、17日、20日分三批驱逐出西藏，送往印度，再经海路遣返回内地……这便是震惊中外的“驱汉事件”。

向噶厦政府提供拉萨“共产党汉人”名单的，便是那位蓝眼睛白手套的外交官——理查逊先生。他是不大列颠帝国在东印度的重要人物，当时的身分是印度驻西藏总领事。

跟这位理查逊先生遥相呼应，紧密配合的，是美利坚和英吉利的无线广播电台：——美国合众社电讯：“西藏利用国民党的行将崩溃，完全可能脱离中国政府之主权。”——英国通讯社专稿：“英国从未承认西藏是中国一部分并受中国管辖的说法。”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评论员”，英国政府派来的“工程师”，在拉萨活动着……拉萨原有的通讯联络电台，很快变成了“西藏广播电台”，昼夜使用藏、英、汉三种语言向外界播音。它起劲地传播：“汉藏关系只是宗教上的供施关系，西藏在历史上就没有属于过中国”，“解放军违背神的意愿，与西藏政教水火不能相容”，煽动西藏僧俗人民“要南死女顶，前仆后继”，对解放军“坚决进行武装抵抗！”同样是这位颇有绅士风度的理查逊先生，对年迈昏庸的西藏摄政达扎说：“不能坐喊独立，应当向联合国写信呼吁”。于是，噶厦政府草拟了《西藏独立宣言》，由理查逊先生亲自修改定稿，并译成英文本，决定派遣达赖的二哥嘉洛顿珠和孜本（审计官）夏格巴去联合国呼吁，请求支持。

此后，理查逊先生又伙同来自美利坚的神秘人物劳威尔·托马斯，和摄政达扎等秘密商定，组织了一个由6位官员组成的所谓的“亲善代表团”，打算分别派往美、英、印（度）、尼（泊尔）4国，请求援助。各位代表都携带盖有达赖喇嘛和摄政达扎印鉴的书信，信中称：共产党已占领内地多数省，业已临近藏界，请求4国指导我们如何作战，并希望派来一批有技术专长的人员，借贷一批美元，为实现西藏独立、加入联合国组织给予支持……他们的阴谋一旦得逞，面积相当于12个浙江省的棕色土地，将从中国的版图上冰裂而去。

那片环抱一千多个湖泊的美丽高原，那些蕴储无数宝藏的崇山峻岭，特别是跟华夏各民族血肉相连的百万藏族兄弟，都将沦入异邦异族的手中；原本是祖国最可靠的西藏屏障的喜马拉雅山脉，也将被利斧斫裂而去了……藏与华夏古族是同源同种，同胞骨肉。他们土地相连，文化相融，共建共拥东方第一大国，也已历经七百多个春秋了。现在，当自己的祖国如醒狮一般将要跃起于世界的时候，这片第三极地，难道将要发生令高山扭痛、大河淌血的离心的裂变吗？整个世界注视着西藏，毛泽东的眼光也注视着西藏。

1949年9月3日，新华社发表社论，严正指出：“西藏地方当权者驱逐汉族人民及国民党驻藏人员的事件，是在英美帝国主义及其追随者印度尼赫

鲁政府的策划下发动的。”解放军将“不容一寸土地被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统治之外”。

仅仅隔了4天，9月7日，《人民日报》又发表社论《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西藏》，号召西藏人民团结起来，迎接解放。

但是，封闭于雪山峡谷中的噶厦地方政府，对来自北京的忠告和规劝充耳不闻。他们受那些蓝眼睛白手套的蒙蔽太深了，对自己的力量也估计得太高了。从拉萨通往藏东重镇昌都的驿路上烟尘滚滚，七千大军被调往金沙江西岸，他们将要凭据天险和神符，顽固抵抗解放军进入西藏。

(2) 新生的共和国面对艰难而严峻的考题。

逆历史潮流而动，背全国人心所向的所谓“西藏独立”的阴谋，受到中国各族人民的一致谴责和声讨。

首先对“西藏独立”阴谋表示极大义愤的，是藏民族各阶层爱国人士和甘、青、川等藏族聚居省的人民。

1949年10月、日，新生的人民共和国成立的这一天，西藏黄教两大教主之一的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从青海致电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凡有血气，同声鼓舞，今后人民之康乐可期，国家之复兴有望。

西藏解放，指日可待。班禅谨代表全藏人民，向钧座致无尚崇高之敬意，并矢拥护爱戴之忱。”在瑞雪飘飞的1950年1月的最后一天，班禅堪布会议厅再一次代表西藏爱国人民致电中央人民政府：顷闻西藏拉萨，反动当局，以“亲善代表团”名义，派遣非法代表，赴英、美等国活动，表示“西藏独立”，企图勾结帝国主义，反抗人民政府，以达其脱离祖国、出卖西藏的阴谋。西藏系中国领土，为世界所公认，全藏人民亦自认为中华民族之一。今拉萨当局此种举动，实为破坏国家领土主权完整，违背西藏人民意志。谨代表西藏人民，恭请速发义师，解放西藏，肃清反动分子，驱逐在藏帝国主义势力，巩固西南国防，解放西藏人民。本厅誓率西藏爱国人民，唤起西藏人民配合解放军，为效忠人民祖国奋斗到底。

早年从西藏逃亡内地的爱国势力“热振派”的代表益西楚臣，在西宁拜见中央代表，痛哭流涕地再三“敦请中国人民解放军尽快尽早进军西藏，拯救同胞于水深火热，使西藏回到祖国怀抱”！

1949年11月21日，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复电班禅，电文中说：西藏人民是爱祖国而反对外国侵略的，他们不满意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政策，而愿意成为统一富强的各民族平等合作的新中国大家庭的一分子，中央人民政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必能满足西藏人民的这个意愿。

当1950年的春天来临的时候，人民解放军的旗帜所向，四川、青海、甘肃、西康、云南5省境内藏族聚居地区已全部解放，新生的人民政府相继建立。

与此成鲜明对比的是：在近一年的时间内，在帝国主义分子的策划和挑唆下，西藏一小撮反动上层已经在分裂的道路上越滑越远了。

继“驱汉事件”之后，美利坚合众国的间谍分子进入西藏秘密活动，鼓励西藏成立一支有技术的部队，接受他们的技术训练，抵抗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西藏当局即向美国要求提供“十亿美元”的援助和给予第二次世界大战使用的武器。接着，第一批美国武器经印度加尔各答运到了拉萨，藏军司令亲自带人到江孜印度兵营接受训练。

1950年1月，美国合众社向世界发出电讯：“西藏将派出亲善使团分赴英、美、印、尼和北京表示独立”。

1950年1月20日，新华社发表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发言人的谈话，严正指出西藏是中国神圣领土的铁定事实，声明西藏无权擅派任何使团，更无权表示所谓的“独立”。

但是，西藏反动当局已经利令智昏，迷途难返。雪域之地上法号凄厉，喇嘛们在寺庙里念咒经诅咒红汉人解放军，16岁以上，60岁以下的男夫陆续被征召入伍，藏军急剧膨胀了一倍，各种兵员和辎重源源不绝运往藏东。英国报务员福特从那里的藏军兵营，不断向太空拍发神秘的电波……新生的共和国面对着艰难而严峻的考题。

（3）18军待命进藏。

1949年底，成都战役胜利结束。参加这次战役的中国人民解放军18军主力，正集结在四川乐山和眉山地区。

1950年1月7日，第二野战军首长刘伯承、邓小平发来急电，命令18军以一个团布置在新津、邛崃一线，其余部队均集结在乐山、丹陵待命，并指示张国华军长速到重庆领受任务。

18军是一支稳健善战的部队。这支在解放战争初期组建的部队，曾随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以后转战河南、湖北、贵州、四川，在解放中南、西南地区的战斗中屡建战功。

在二野司令部，刘伯承司令员和邓小平政委高兴地对张国华军长说：“毛主席从苏联发来了电报，把解放西藏的任务交给你们啦！”当时，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正在苏联访问，谈判签订中苏友好条约事宜。

邓小平政委指示张国华军长：到西藏去，就是靠政策走路，靠政策吃饭，政策就是生命，要用正确的政策去扫除中外反动派的妖言迷雾，去消除历史上造成的民族隔阂和成见，把康藏广大僧俗人民和爱国人士团结到反帝爱国的大旗下来。

接受了解放西藏的任务以后，18军在眉山一带进行了进藏前的思想动员和组织整顿。

为了做好调查研究，为主力部队开辟道路，一支以侦察和工兵队伍组成的先遣支队，于2月3日先行出发；以后这支先遣队又进行扩充和调整，组成进藏先遣部队，由18军副政委王其梅、第二参谋长李觉率领。

18军主力是8月下旬陆续出发，向西藏挺进的。8月28日，晴空万里，部队在眉山三苏公园举行了隆重的进藏誓师大会。大会在震耳的礼炮和悠扬的军乐声中开幕，鲜红的五星红旗慢慢升到蓝空，战士们庄严宣誓：“一定要把灿烂的五星红旗插到喜马拉雅山上去！”军政委谭冠三走上主席台，铿锵有力地问：“同志们，刺刀磨快没有？”“磨快了！”“枪擦好了没有？”“擦好了！”全体指战员对于进军西藏充满了必胜的信念。

党中央和毛泽东对于18军进藏非常关切。

根据西藏社会和地理的特殊情况，中央一再指出：进军西藏“政治重于军事，补给重于战斗”，部队要“一面修路，一面进军”。毛泽东对许多重要问题都有细致的考虑，他曾指出：甘孜至昌都是否能随军队进攻速为修路通车？昌都能否修建机场，是否适于空投？同时，毛泽东特地批准购买30架高空运输机，以支援进军西藏的需要。

数万人马，向康藏高原挺进，后勤供应之艰难是可想而知的。为此，

二野从成都战役缴获的汽车中，抽出四、五百辆，充实 18 军进藏急需。

部队所需要的粮食全由川西筹集，另从重庆制作 20 万斤以上的饼干供进藏部队食用。

部队每前进一程，运输补给线就延长一段，人员供应也就越发困难。先遣部队刚到甘孜不久，就发生了严重的粮荒。52 师师长吴忠在当时签署的报告上写道：“部队携粮已吃完，空投未成，征粮困难。为长期打算，节衣缩食，争取时间，已动员部队每天每人吃一斤粮，并组织部队挖野菜（亦不多），捉地老鼠，捕麻雀充饥……”当时，就连王其梅、李觉等军首长也吃地老鼠。

就这样，我人民解放军爬山涉水，晓行夜宿，经雅安、甘孜，过理塘、巴塘，部队陆续抵达金沙江东岸。隔江相望，便是等待解放的祖国领土——西藏。

（4）三支劝和团的遭遇。

但北京始终在耐心地等待着西藏地方当局的觉醒，希望通过和平谈判的方式来解放中国大陆最后一块土地。为此，曾经做过多方面的努力。

早在 1950 年春天，在弯弯曲曲的康藏山路上，有一支小小的人马在行进着。被护卫在中间的那位披着袈裟的法师，在颠簸的马背上还诵经祈祷，他就是有名的密悟法师。他率领了一支劝和团。这支小小的劝和团从成都启程时共有 5 个人，即密悟和他的两个徒弟——如意、胜兴，以及贾题韬和阿旺嘉措。

这支劝和团自己联系了一支马帮商队，同他们一起走。到了甘孜要过金沙江了，他们没有马牌（通行证）过不去，就搭起帐篷住在江边等候。

这时，甘孜白利寺大活佛格达率领的第二支劝和团也来了。他在西康威望很高，顺利地过了金沙江。密悟法师一行还是过不去，只得望江兴叹。

第三支劝和团——青海劝和团于 1950 年 5 月组成，由达赖的哥哥当才活佛任首席代表，青海黄南州的活佛夏日仓呼图克图、大通县的活佛先灵任代表。

青海劝和团于 7 月份分两路自西宁和同仁起程，8 月在柴达本盆地的大河霸会合，一同赴藏。

劝和团到达那曲后即被扣留，迟玉锐等 4 名汉族干部被藏军押往山南软禁。

在各路赴藏劝和团中，影响最大的要算甘孜利寺格达活佛那一支了。

格达是一位出身贫苦的爱国活佛，当年红军长征路过时，他曾任博巴（藏人）苏维埃政府副主席，与朱总司令建立了友谊。

为了使西藏早日和平解放，格达活佛致电朱总司令，要求去拉萨促进和谈工作。朱总司令复电，对格达活佛的爱国热情深表嘉许。

7 月 10 日，格达活佛以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的身分，由甘孜启程赴藏。那天有很多当地群众前来送行，有些老人还跟在后面，高声为他祝福。不料格达活佛竟在昌都遇害身亡了！

原来，格达活佛一行是 7 月 24 日到昌都的。他广泛接触了僧俗各界人士，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介绍解放军进驻甘孜地区后，如何尊重藏族群众。在昌都的亲帝分裂主义分子对他又恨又怕。特务分子在格达活佛喝的茶水里下了毒药。活佛中毒后，即腹痛、头痛、口吐黄水、鼻孔流血流脓，第二天——8 月 22 日就圆寂了。

死后全身乌黑，皮肤触手即行脱落……格达活佛遇害，激起各族人民的极大义愤。

18 军官兵更是群情激愤，向隔江对峙的藏军挥拳怒骂。

格达活佛 8 月 22 日被毒死，25 日中央军委批准了昌都战役的计划，26 日西南军区下达《昌都战役的基本命令》。

战争之神的正义之剑，将要划出霍霍闪电了。

(5) 新任总管阿沛·阿旺晋美。

昌都，位于西藏东部澜沧江上游扎曲和昂曲两大支流交汇处，当时居民有三千余人，扼进藏南、北、中三路之要冲，噶厦在此建立了总管府，指挥着占藏军总兵力三分之二的九个代本（团）和民兵八千余人。这八千余人分布在沿江一千多里正面防线和昌都附近宽七百多里的纵深地区。

当解放军临近金沙江东岸的时候，原昌都基巧（专员、总管）拉鲁·才旺多吉任期已满，他上书噶厦请求准予回拉萨。按照旧例，昌都总管必须由一名现任噶伦出任。但在拉萨的三位噶伦谁也不愿在这种时候赴任昌都。文武官员更是畏缩不前。于是，摄政达扎决定，突破清朝给西藏设立 4 名噶伦的定制，提升孜本（人事审计官）阿沛·阿旺晋美为增额噶伦，前往昌都接替拉鲁。42 岁的阿旺晋美临危受命，慷慨赴任，很有点悲壮的意味。

清朝皇帝退位的那一年——1911 年，在拉萨以东一百多里路的甲玛沟，有一户贵族世家诞生了公子。他便是阿旺晋美。阿旺晋美从小就聪慧过人。在别的藏族小孩还在玩羊拐骨的年龄，阿旺晋美被送到拉萨的一家私塾学习藏文去了。14 岁那年，他拜在一代佛学大师喜饶嘉措门下，学习文法、诗学、历史和哲学。喜饶嘉措大师学问渊博，对学生要求十分严格，为人刚直有如青枫，在藏区享有盛名。阿旺晋美跟着大师，暮鼓晨钟苦学 3 年，又拜东藏神秘灵异之地——三岩地区红教派的大苍活佛为师，习诵佛学经典，度过两个寒暑。当他 20 岁那年重返故乡甲玛沟时，已经称得上是满腹经纶了。

甲玛沟是个只有一百四、五十户人家的农牧结合的山乡。20 岁的阿旺晋美接替母亲管理自家的庄园。他在读书之余，同农奴们一起收割青稞，一起放牧牛羊。凄惨的现实使他萌生了最初的民主思想。他越来越认识到西藏的制度需要改进……对于这项任命，有的人认为凶多吉少，实在不是一个好差使，但阿旺晋美处之泰然，他面见摄政达扎，居然陈述了一条令满庭皆惊的意见：“上司抬举我，委以重任，我愿从命。”

但是现在人民解放军已向昌都方向前进，也许指日可到。我们迟早总是要同解放军接触，总是要谈判的。请上司给我权力，我去昌都后暂不接任总管，而是直接去找解放军谈判。‘找水源，去雪山。’我一路东行，找到解放军为止。”摄政王达扎惊得半晌无话，满庭文武大员脸色干差万别，各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官员扩大会议讨论的结果，向噶厦提出意见书，支持阿沛的要求。这简直像三月里草原的风一样，刮遍了圣地拉萨，但是，风再大，扬起一层沙灰又打着旋于折了回末。官员扩大会议在给噶厦的意见书里又认为，阿沛已是堂堂噶伦，不宜贸然与解放军谈判。先责成在印度的孜本夏格巴等人同共产党接触，待时机成熟，再由阿沛出面谈判。

噶厦和达扎批准了官员扩大会议的意见书。

8 月 28 日到达昌都，阿沛披两肩征尘，顾不上休息，便亲自巡查江防，考察民情，亲随和卫士们常见他眉头紧蹙，一言不发。一周之后，他致电噶厦：“因时世浑浊，民不堪命，这里有的宗（县）内仅七、八户还有糌粑，

其余全以圆根（即蔓青，一种类似萝卜的蔬菜）为食，乞丐成群，景象凄凉。”针对噶厦命令他进攻玉树一事，他建议“停止进攻，汉藏双方最好和平解决，如果不行，也应先从边境一带撤出所有部队”。

可惜，噶厦没有采纳他的建议。

（6）毛泽东念念不忘以战促和。

毛泽东关注着西藏的动静。

关于昌都战役，他胸有成竹，指示“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四面包围敌人，力求全歼，不使漏网”。他要在藏军心理准备不足的情况下毁灭其全部有生力量，避免以后再与藏军漫山遍野地打游击与消耗战。他要使噶厦全面丧失抵抗能力。

8月15日，毛泽东看完西南军区作战计划后电示：“一个师进攻昌都是否够用？藏方似有相当强战斗力，必须准备。”另外两条批示是关于补给运输的：“一，甘孜至昌都是否能随军队进攻速为修路通车；二，昌都能否修建机场，是否适于空投？”西南军区关于昌都战役的作战计划是，南北两线合围，兵分五路出击。

旦嗖嗖射出，必将石破天惊，地动山摇，整个世界屋脊为之震动。

8月28日，毛泽东给西南局并西北局的电报说，如我军能于10月份占领昌都、有可能促使西藏代表团来京谈判，求得和平解决（当然也有别种可能）。毛泽东念念不忘的是以战促和，还是希望和平解放那一片雪山高原。

8月31日，毛泽东批示：“购30架高空运输机，支援西藏进军。”1950年8月31日，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刚刚诞生10个月，彭德怀挂帅出征朝鲜战场正打得炮火连天，鸭绿江那边硝烟弥漫的天空更需要人民中国的战鹰。但是，毛泽东还是咬咬牙，把30架飞机批给进军西藏的部队。而西藏在毛泽东心目中的份量，岂是“30架”高空运输机所能承载的！

这里让我们先追踪北线作战的右路部队。

10月7日，执行迂回包抄任务的52师154团渡过金沙江，溯江而上，开始翻山越岭。

由于高原空气稀薄，炽烈的太阳在雪地上的反光刺坏了战士的眼睛，几乎有一半人因雪盲而暂时失明，双眼红肿，疼痛难忍，人们把绑腿布连起来一串一串牵着走。涉渡冰河更艰苦。

横断山区条条山条条水，湍急的水流冲击着冰块，像锋利的刀刃划破了人们的皮肉。有的战士因腿伤不愈，加上急行军和恶劣的气候，整条腿坏死，被迫截肢。

饥饿的威胁也极为严重，整个参战部队都受到了粮荒的困扰。154团从玉树补充的粮食很快就吃完了，中央在重庆订做的高营养食品蛋黄蜡和代食粉因资本家偷工减料被大大打了折扣，按原定指标每人每天12两就足够补充消耗的热量，但发到战士手中，12两仅够他们吃一顿。由四川运来的大米因长途跋涉、风吹雨淋，早已霉料变质。缺粮，沿路又是茫茫雪山，没有野菜和草根可食，有的战士撕吃自己棉衣中的棉花，吃粉状的细土，吃骨头和牛角烧成的灰烬。

最惨的是随军的战马和驮畜，这些“无言的战友”眼望无尽的群山日光暗淡，有的连眼睛也没有——被冰雹打瞎了。饿急了，它们就“咔嚓咔嚓”啃食冰雪。夜间，饥寒乏力的马儿把头拱进战士的帐篷。低垂的头颅贴在战士的胸部，战士醒来，把自己的口粮偷偷喂它一把，抱着它的头流下了眼泪。

马匹不断倒毙，几百里路倒下的牲畜成了无意中设置的路标，到昌都战役结束，几千匹牲畜所剩无几。饥饿的人们硬着心肠吃饥饿而死的牲畜，马倒一匹人吃一匹，吃了马血马肉，还要吃马皮，恨不得连马骨也要烧成灰咽到肚子里。

在千里迂回的急行军中，154 团和青海骑兵支队有三分之一或更多的人掉队。10 月 16 日，跑在前边的只剩下百余骑兵和百余步兵，他们以日行 170 华里的惊人速度先敌 4 小时抢占恩达，切断了昌都藏军西退之路。

南线解放军两个团攻克盐井、宁静、邦达。

堵住了藏军逃窜察隅之路。

(7) 解放军攻占昌都。

此刻，昌都正陷入一片混乱。

当解放军渡江的消息风传全城时，士兵、喇嘛和居民在昂曲河边汇成一片。持枪的士兵们东逛西窜，不知如何是好。

10 月 12 日，从昌都以南的宁静（芒康县），传来藏军第九代本德格·格桑旺堆率三百四十余人宣布起义的消息。霎时间，昌都藏军的军心崩溃了。

10 月 16 日夜，总管阿沛得知解放军已逼近昌都，类乌齐一带后方也出现了神出鬼没的汉人军队。早就不愿抵抗的总管命令，翌晨弃城西撤。17 日，弹药库的爆炸声震得昌都城颤抖不已。随之，藏政府官员、士兵们拖儿带女顺着西边的山路仓皇离开昌都。乱兵沿路抢劫，为解放军赢得民心铺平了道路。

整个昌都战役过程中，解放军只在小乌拉、岗托等三处遇到了较强硬的抵抗。岗托渡口，攻击藏军十代本的是由军工兵营、侦察营和 52 师炮兵连组成的左路部队。10 月 7 日，东岸解放军开始抢渡金沙江。一瞬间，重机枪、迫击炮向对岸藏军猛烈轰击，阵地上一片火海，藏军躲在石缝中顽强抵抗。解放军的牛皮船驶进激流，向对岸奋力划动。江面上，枪林弹雨交织成严密的火网，有一只牛皮船被枪弹和激流掀翻，船和人刹那间葬身水底。

两小时后，被巨浪冲向下流的牛皮船靠上西岸，解放军跃上江边乱石，开始向对面藏军阵地逼近。同时，炮火和枪弹暴雨般倾洒到山后的藏军队伍里，牛皮船上和两岸的解放军发出了吼声，藏军弃地撤退，夺路西逃……对于俘获的负伤藏军官兵，解放军全部收容并予以医治。对投诚的官兵、家属每人给 8 元以上的银元作路费，每三人发一匹马。当解放军的粮食运到以后，还发放给藏军官兵，使他们手中有钱，袋中有粮，并有马匹驮运衣物，走上返乡之路。被遣散的人员无不感谢解放军的宽大政策，有的叩头流泪，对解放军干部说：你们解放军是菩萨兵，是救命恩人，返回家乡后，再不替噶厦卖命了。

昌都战役于 24 日结束，历时 18 天。经过大小战斗 20 余次，全歼昌都藏军总部及三、七、八、十等 6 个代本全部和二、四、六代本之大部、并争取第九代本起义，共计歼敌 5700 余人，占当时藏军总数的三分之一。其中俘代本以上文武官员 18 名，英印特务福特等 4 名，缴获山炮 3 门，重机枪 9 挺，轻机枪 48 挺，各种冲锋枪、步枪 3 千余支及其他军用物资部分。

昌都战役的胜利，正如刘少奇所说的那样，“是解放西藏的淮海战役”。整个西藏被解除了心理和实力上的抵抗，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和平谈判。

(8) 达赖喇嘛亲政。

昌都一役，予藏军以毁灭性的打击。从那片雪城高原上反弹而起的石

子落进了印度洋，掀起一场轩然大波。

1950年10月21日，昌都战役尚未熄火之际，印度政府就给中国政府送交了一份备忘录。

备忘录说：“假如因为中国在西藏的军事行动而使反对中国参加联合国的国家有机会来歪曲中国的和平目的，那么中国的地位将会因此而削弱。”印度洋的大波很快涉及到大西洋。11月1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华盛顿记者招待会上诬称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西藏的行动是“侵略”。11月15日，萨尔瓦多驻联合国代表向联合国秘书长赖伊提出所谓“入侵西藏”问题提案。萨尔瓦多是中美西岸的一个国家，它的政府一向是在美国控制下的。据国民党中央社成功湖15日消息，成功湖方面也都认为萨尔瓦多的提案“是出于美国的主使”。11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短评：《斥美国对西藏的阴谋》。

正义终于使横暴者却步了——11月24日，联大总务委员会讨论决定：延期审理此案。

昌都战况传到拉萨，噶厦立即召开了由重要官员和三大寺堪布参加的大会。与会者大都垂头丧气，怀着对解放军无可奈何的愤怒。东藏一败涂地，战无可战，讲和又不甘心，到底何去何从？人们在会上争来吵去，对时局却没有提出任何可行的对策。达扎摄政的脸色越来越暗，最后长叹一声，决定请乃穷、噶东二位护法神指点迷津。

在拉萨西郊哲蚌寺下面，有一个专供护法神的乃穷寺。意为“永恒不变的妙言小岛”。

供奉着西藏的主要护法神“佩阿甲布”。而乃穷曲均则是所法神预言未来的使者，噶东寺的曲均也是这样的使者。上千年来，西藏每逢重大的决策，都要向这些预知未来的神巫请教。

这一次自然更要求教于他们了。

在神秘庄严的气氛下，乃穷和噶东两寺的曲均被请到降神的佛殿。乃穷曲均身穿红色锦缎的裤子，内外八套衣袍，重逾百斤。足蹬前面翘起的齐膝皮靴。胸前挂着一面金质护民镜，四周点缀着绿松石，环衬出一块紫水晶，紫晶的核心是耀眼的银片，上刻有密宗神的祈祷词。

仪式开始。

乃穷曲均跳演了一阵，只泛泛他说要竭诚礼拜，多念经文，方能保民平安。

“那么，下一步是和是战？应由谁掌管全藏政教大权？”守在达赖佛殿的官员急切地问道。

“还是要多念经文，竭诚礼拜。”乃穷曲均依然含含糊糊。

“尊贵的乃穷神啊，为了西藏的政教大业，请问是战是和？谁来执掌大权？”大员们都瞪着眼睛盯着乃穷曲均，乃穷曲均头上冷汗淋漓，避过他们犀利的目光，终于承认“不灵了”。看来，只好请教噶东神了。

噶东神汉折腾好一阵，趁人们不注意想溜走，仲译钦波（秘书长）群培土登上前拦住了他。

群培土登神情激动他说：“这次请求指点的，是关系到西藏政教存亡、众生命运的大事，我们肉眼凡胎难以决定，请神睁开慧眼，明示今后怎么办才好。”噶东曲均转身使劲跳起来，一会儿拔出腰刀左杀右砍，吓得噶伦们忙向一边躲；一会儿就地跳起，掀起一片尘土，最后，他突然伏跪在达赖喇嘛面前，做出要哭的样子说：“达赖喇嘛是全体僧俗人民的智慧和至宝，只

要你亲自执政，就能给西藏众生带来幸福。”在座的摄政达扎闻言脸色惨白，神态沮丧。

1950年藏历10月8日，达赖喇嘛举行了亲政典礼。17岁的达赖喇嘛在这多事之秋，挑起了掌管全藏政教事务的重任，而如何收拾这败后残局，他却一筹莫展。

(9) 阿沛信使急驰拉萨。

一场大战过后，金沙江又恢复了往日的寂静，在秋日的蓝天下，像澄静的练带。

此时此刻，住在昌都解放军指挥机关的阿沛，眼前却有点迷迷糊糊。

他住在一幢藏式楼的底层，不再穿绸缎的官服，而是一身黑氍毹藏装；他孑然一身，围着他的不再有护兵和侍从。

眼下的这个结局，其实在他衔命赴任的时候就预感到了。要不然，当初拉萨的三个现任噶伦为什么都死活不肯来呢，但当预感真的变成了现实，他还是感到震惊、痛疚、惶恐、迷茫。想到雪域西藏的命运凶吉未卜，他心头隐隐作痛起来。

大战之后的昌都城是宁静的。特别是深夜和清晨。一年多来，这座东藏名城被各种喧响所困扰，在白天与黑夜交替之际发出震天巨响。现在呢，一切都寂静了。怒吼的山炮轰鸣之后，一切繁琐的音响都归于沉寂了。

阿沛这天早晨起身后不久，康巴汉子平措旺介看望他来了。平措旺介身穿解放军军装，高大健壮。这位28岁的康巴汉子是昌都解放后13天赶到的，一年前噶厦在驱汉运动中，将他也以“共产党嫌疑”的罪名驱逐出境，此人现在成了共产党的大长官，他会不会报一箭之仇，来一个报复呢？不可不防！

康巴汉子平措旺介此时身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18军民运部长、昌都工委书记，与去年被押送离开西藏的狼狈样子相此，简直是天上地下了。康巴人凶猛好斗，尤善复仇。

为了复仇，不惜子子孙孙打冤家，平措旺介如果要对噶厦的要员阿沛等人施行报复的话，应该说是不费力的。但这一次，康巴人平措旺介态度谦恭，他请阿沛噶伦从这间底楼的小屋搬到对面楼房的二楼去住。

高楼上轩敞洁净，落地窗十分明亮。远眺青山，近观绿水。使人心旷神怡。

很快，又送来了他原先穿的绸缎官服。在昌都战役中投诚的近40名藏军高级军官，也都重新穿上他们的官服。

18军副政委王其梅和其他解放军将领不断地来看望阿沛。有一次王其梅与阿沛长谈，谈到这次两军对垒，枪炮无情，双方伤亡都很大，许多藏族和汉族兄弟都倒在战场上。讲着讲着。

王其梅不禁热泪盈眶。嗓音哽咽。阿沛十分惊愕，他被深深地感动了。

昌都地区的大活佛，大贵族，前昌都藏军的高级军官，更是络绎不绝地前来拜望阿沛。

阿沛从他们的眉宇神态、谈吐和笑声中明白了他们目前的处境：对照过去像瘟疫一样散布在藏区的关于共产党解放军的种种流言，阿沛十分感慨，他心头的疑雾慢慢淡散了。

阿沛居住在楼上夜间灯火不熄，共产党大首长与他盘膝对坐，一谈就是大半宵。

记不清有多少个夜晚，那幢楼上的灯光总是明亮的。卫兵们只记得半夜时分，炊事员还要登楼去送酥油茶和夜餐；每天早晨的太阳，将温暖宜人的阳光射进那幢高楼，玻璃窗户反射出一片光华。

就在拉萨的上层亲帝势力策动达赖外逃，乱成一团之时，阿沛从昌都派随员金中·坚赞平措和噶准桑林，星夜兼程赶来拉萨送信。他们快马加鞭，日夜赶路，马跑累了，又支不到驿站的差马时，就身背马鞍，徒步前进。二千多里路程，他们只用了16个昼夜就赶到了。

金中和桑林向噶伦们呈上昌都总管阿沛给达赖喇嘛和噶厦的信件。噶伦们急不可耐地询问昌都的情况，解放军的动向和兵员多少等等，当两位信使汇报到解放军离昌都还有三天路程，结果一个晚上就突然出现在面前时，首席噶伦然巴连声惊呼：“啊啧啧！啊啧啧！”并且叹息说：“敌人像钢铁般坚硬，我们像糌粑一样松软呵。”索康噶伦询问了昌都总管署全体官兵的近况，然后说：“阿沛·阿旺晋美受苦了，我们并不责怪他，我们的军队太糟糕，确实不能上阵。

如今只好耐心等待，世界形势总会起变化的。”金中和桑林送到拉萨的，是阿沛·阿旺晋美等40名官员给达赖喇嘛的信。这是一份十分重要的文献。它禀报了昌都之战失败的经过，以及投诚后广大官兵受到的良好待遇，其重点自然还在后半部分：在下昌都总管阿沛噶伦、三名在职大小堪布和第三、第八、第九、第十等五个代本为首的四十名政府文武官员顿首叩拜、三门虔诚启禀：……目前进行汉藏和谈是个时机。共产政府所规定的基本作法是，对外五民族团结一致；对内各大小民族自治政府，其工作人员根据单一民族和多种民族人数多少来确定；大民族绝不压迫小民族，特别是对西藏要采取特殊政策，首先是对大教主全知佛王达赖今后仍然主持政教，教主摄政活佛及各僧俗官员照常供职；保护宗教。

寺庙和经堂；西藏现行政治和军事制度均不予变更；藏军改编入国防武装之内；帮助西藏人民发展文化教育和农、牧、工商业，今后凡是为发展政治和谋求人民幸福的一切办法措施需要改革时，要与人民及其主要领导人协商，在大家同意的原则下进行决定；尊重宗教信仰和地方风俗习惯，过去与英美两国及国民党的一切关系，不予追究。……目前汉藏和谈很快进行的话，汉政府提出的各条款中有不适西藏情况的可将利弊详细说明，共产政府方面绝不存在举剑威吓、强迫或压制不让申述利弊的作法，一切可以心平气和地进行商谈决定。在下我等再三思索回顾，确无强迫命令的想法和作法。此室包括共产政府在内的和在下四十名文武僧俗官员敢作担保。

噶伦阿沛·阿旺晋美为首的四十名文武官员，可算是噶厦的重臣良将。昌都一战，全部归顺了共产党，而且都得到妥善的安排。阿沛本人更是被待若上宾。这使噶厦内外大为震动。一连几天，拉萨城的行头巷尾都在议论这件事。看来这红汉人解放军，既不同于国民党西康省主席刘文辉的军队，也不同于前清川边总督赵尔丰的兵丁，更是不同于1904年打进拉萨来的英国人荣赫鹏的洋兵。他们到底是些什么人呢？阿沛来信的内容真靠得住吗？金中和桑林两位信使在拉萨成了新闻人物。他们却因旅途劳顿困得要命，只想睡觉。

不料，几天之后的一个清晨，两位信使一觉醒来，忽然听到一个惊人的消息：“如意至宝”达赖喇嘛已经在头天夜里简装轻骑，逃往亚东去了！这是1950年藏历11月11日。

达赖喇嘛还将从亚东逃往印度！

(10) 达赖喇嘛滞留亚东。

原来，对于阿沛等 40 名官员的来信，噶厦大员们半信半疑，还有人又气又怕。他们感到，如果继续与解放军作战，已没有力量：派代表和谈吧，又有点于心不甘。于是，就在神前打卦抽签，问达赖喇嘛是留在拉萨，还是前去印度。结果，卦签上写着的是“出走”。因此，便秘密拟定了出国计划。

噶厦给留在印度的孜本（审计官）夏格巴发报，通知他昌都失守，拟请达赖出国，令其选择驻锡之地。几天后，夏格巴回电称：对达赖出国之事英美等国答应协助，印度将派兵接应。

藏历 11 月 11 日凌晨，达赖喇嘛临时任命大堪布罗桑札喜和孜本鲁康娃为司曹，代理摄政俱务，自己则换上普通服装，离开了布达拉宫。

达赖骑着一匹灰色良种马，带着 40 名贵族官员和 200 名藏军，沿着拉萨河谷，在曲水宗的江村渡过雅鲁藏布江。不料经江孜抵达亚东后，世界形势却发生了变化。印度政府慑于国际舆论的压力和中国政府的警告而收回了承诺；英美等国又怕达赖出国后失去现有地位，班禅掌管西藏大权。所以，当噶厦请求印度政府迎接达赖时，印度政府的回答竟然是：按照国际公法，达赖喇嘛为求得生命安全，印度准许其避难，但只能作为难民对待。印度的回电传到噶厦官员手中，全场哗然。当难民，那是他们无法接受的耻辱，但无功而返又没台阶下，达赖一行就此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境地。

就在达赖喇嘛从拉萨出走的同一天，人民解放军向在类乌战役中漏网的七代本普隆巴发起追击。普隆巴跑到洛隆宗（县）后，以一部分兵力控制了怒江上的嘉峪桥，同时收集散兵游勇和被解放军遣散的藏军二百余人，扬言要进行“反攻”。为消除隐患，巩固前进阵地，52 师师长吴忠命令 154 团歼灭该敌。团长郟晋武亲率一个加强连，奔袭 200 里，于 11 日傍晚 18 时突然出现在嘉峪桥头，夺取了被破坏的嘉峪桥，突破怒江天险；在宗本代理人 and 当地农牧民的协助下，他们又行军 180 里，于 12 日凌晨包围了洛隆的藏军。七代本普隆巴从梦中惊醒即被活捉。

1951 年元旦，昌都人民解放委员会成立，辖西藏东部两个办事处 28 个宗（县）。主任为王其梅，副主任和委员中有阿沛·阿旺晋美、平措旺介、大活佛帕巴拉、德格女士司江央白姆等人。同时成立的还有昌都地区僧俗人民争取和平解放西藏工作委员会，主任为阿沛·阿旺晋美。因为中共中央确定了和平解放西藏的战略。

解放军便在昌都附近待命，等着达赖方面的选择。

(11) 周恩来与夏格巴。

在与昌都遥遥相对的世界屋脊的另一端，阿里高原的扎麻芒保，新疆骑兵支队先遣连，已经进行了一个多月的群众工作。他们散发毛泽东画像和藏语传单，帮助群众放牧、打柴、背水、治病、拣牛粪。当时先遣连的供应十分困难，他们仍然节衣缩食，拿出自己的布匹、衣服、粮食、茶叶、块糖等物品来救济贫苦牧民。与他们接近的藏民逐渐增多了。先遣连在阿里的群众工作与和平谈判是成功的。今天，我们从历史档案里还翻出了阿里那日过力松木区代表才旦朋杰、扎西才让致毛泽东的电报：中夫人民政府毛主席：敬启者：中央人民政府军官李狄三，抵达那日过力松木区。同我们结成了朋友并听从中央人民政府命令，因此没有引起一点战争，很好的和平实现了。这次我们的两个邦保申请达赖活佛，让藏政府和中央人民政府和平协商，听

从中央人民政府命令。……令人遗憾的是，西藏上层人物中，并不都是如阿里两邦保那样，诚心诚意地愿“做中央人民政府的老百姓”，他们中有那么一些人总想煞费苦心打出一面“独立国”的小旗，与中央人民政府对垒。

早在1950年4月，就有一封电报从印度加尔各答发给“毛泽东阁下”，要求中央人民政府派代表“赴港商谈”。署名者之一是“孜本·夏格巴”——20多年后，此人以一本《西藏政治史》鼓吹“西藏独立”，颇获得一些人的喝彩。过了一个月零八天，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发了一封复电：“你们的代表团是西藏地方政府派至中央人民政府商谈西藏地方事务的代表团，不能称为西藏派赴中国外交代表团，谈判的地点必须在北京。不能在香港。”夏格巴先生和他的同伴接电后便陷入了沉默，加上蓝眼睛朋友的阻挠，迟迟未能成行。

1950年8月2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复电驻印度大使馆申健代办，指示其坚持“中央政府对西藏代表团之方针：西藏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我不能承认该代表团为西藏之外交代表”；“由印经香港去北京既有困难，请考虑转回西藏经由国内其他路线如青海、西康、云南等地前往北京”。

1950年8月19日，周恩来总理再次致电驻印度大使馆申健代办，传达了极其重要的信息：……印度政府承认中国在西藏的主权，并经过其驻北京大使表示印度政府对西藏从来没有现在也没有任何政治或领土野心，并说其他国家也不会干涉西藏……印度政府曾向我大使馆表示甚愿我西藏代表团早日到达北京，并闻英国政府已撤消其拒发签证的决定。如此，西藏代表团更可早日动身……你们以极关心和极友好的态度助其早日成行，并予以很好招待为要。

周恩来的电报，如在布满阴云的西藏天空划亮了一道闪电，若是夏格巴们顺利成行，和中央人民政府的代表在京举行谈判，虽然决不会像后来的阿沛五代表那样取得圆满成功，但是，必将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后来的历史进程。

但是。就在夏格巴代表团拟于6月5日由加尔各答搭机经香港去北京谈判之际，他们的英国朋友临时取消了签证，到使他们未能成行。

夏格巴被历史轻轻抛弃，历史在选择新的人物；这个人物正乘马匆匆赶来；历史将使他倏然间闪闪发光。

(12) 达赖授权五人代表。

滞留在中印边界亚东“东噶寺”的达赖喇嘛，整天在一种进退两难的窘迫中打发日子。

1951年1月11日，滞留在亚东的噶厦召集官员会议。这是西藏地方政府的一次重要会议。在喜马拉雅的那个边境小镇上，他们反复权衡利弊，给达赖喇嘛上了一篇呈文。呈文引用印度外交大臣梅农博士在印度首都德里会见西藏代表时的话说；看来西藏政府通过和平谈判是上策……这次西藏噶厦的一些“洋朋友”几乎是众口一词地劝说噶厦，又不约而同地伸出手来，把它推向谈判桌。想想一年多以前，“洋朋友”那样起劲地鼓动噶厦驱汉；想想三个月前那样卖力地支持噶厦凭据金沙江顽强抵抗；再想想……如今噶厦不能不感多一种深深的失落和孤独。

1951年1月18日，达赖喇嘛派员给新德里的中国大使袁仲贤带去了哈达、礼品和的一封信，信中说：过去，在我年幼未掌权期间，藏汉之间的友好手系屡遭破坏，对此深感遗憾。……近日已通知阿沛及随员从速启程赴北京。

但因路途遥远，不易及时赶到，为争取时间，我们将再给阿沛派去助手，经印度前往北京。我现派出信使扎萨索康苏巴和堪仲曲配土登。

他二人带去全体噶伦、西藏会议及人民的详细书面报告，向您呈报。请您将增进藏汉友好关系的纯正善良愿望，向尊敬的毛主席及时转呈。

并请及时回复，以便使我放心。

附赠哈达一条，上等地毯一床。

与此同时，西藏官员大会也给袁仲贤大使写了一封同一内容的信。

由于达赖喇嘛和西藏官员大会的人们这一次态度是诚恳的，行动是积极的，因而很快得到了满意的回音。仅仅十三天，前往新德里的曲批图丹（曲配土登）和扎萨索康就带回了袁仲贤大使给达赖喇嘛和西藏官员大会的复信。

袁大使在信中，对收到达赖喇嘛的信和礼物表示“衷心欣慰”，说“毛主席令我代表祝贺你的执政”，“中央同意而且欢迎你加派代表经印度乘飞机到香港转广州赴北京，我们驻印度大使馆给以一切旅行上的便利和帮助”。

喜马拉雅的上空，逐渐“阴转多云”。早春的暖风开始吹拂冰封的高原。亚东的东噶寺庙里达赖喇嘛向佛祖问卜祷告，终于批准派遣一个5人代表团赴北京进行谈判。

达赖喇嘛批准噶厦任命阿沛·阿旺晋美为首席谈判代表，任命堪穷（四品官）土登列门，代本桑颇·登增顿珠为代表，三人由陆路赴北京；任命在亚东的藏军总司令凯墨·索安旺堆和僧官仲译钦波（秘书长）上丹旦达为代表，由印度乘经飞机经香港进京。噶厦给每个代表颁发了一份盖有印章的全权证书，注明西藏全权谈判代表5人每人的姓名和身份。里面有承认西藏为中国领土等内容，可答应每年向中央政府进贡，此外不能做任何许诺等字样。

这些全权代表的领衔人物，便是西藏地方政府的噶伦、昌都军政总管——阿沛·阿旺晋美。

1951年3月29日，阿沛·阿旺晋美首席代表启程去北京。昌都军民数千人夹道相送。

阿沛的颈项上挂满了洁白的哈达。他骑在马背上凝望着身前身后的同胞，把马步放得很慢很慢。

这位42岁的首席全权代表，湿润的眼角在莹莹发光。

山城重庆的春晨多雾。4月20日的晨雾淡散后，一架飞机升上晴空，载着阿沛代表一行飞经西安去北京。

中央人民政府关注着这架载有重大使命的飞机。中午12时15分，飞机降落西安机场加油，中央民委李维汉主任电话通知：因北京风大，请西藏和谈代表团改乘火车来京。早已迎候在那里的中央民委副主任汪锋，细致妥贴地安排了西藏代表在古城半天的活动，举行了丰盛的晚宴，晚宴上西藏和谈代表们意外地遇到一个人。这便是青海的喜饶嘉措大师。他原是阿沛求学时的老师，现在是青海省人民政府的副主席。喜饶嘉措大师是享有盛名的佛学大师，在全国藏区名闻遐迩。阿沛在这里见到自己的老师，真是又惊又喜。喜饶大师是个爱国活佛，为了劝说西藏地方当局与中央人民政府早日和谈，曾经在电台发表过藏语讲话。因此，他对自己的得意弟子阿沛率领西藏代表赴京和谈十分赞赏。

席间谈笑风生，对阿沛多有勉励，阿沛很受鼓舞。

当晚11时35分，在汪锋的陪同下，阿沛等西藏部分代表乘坐列车离

开西安。

1951年4月22日傍晚，北京车站的迎客站台上簇拥着数百名欢迎的人群。19点10分，当阿沛·阿旺晋美和其他西藏代表走下列车的时候，他们很快便被鲜花和儿童包围了。

引领着儿童和鲜花的，是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周恩来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朱德总司令，还有中央各部委的部长和主任们。共和国总理目如朗星，解放军总司令威武而和善，他们有力的大手一一紧握着雪域高原和谈代表的手。他们朗朗的笑声，亲切的问候，驱散了北国春夜的寒风。阿沛代表一行刚刚踏上北京的土地，就感觉到了春花的芳香和春意的浓烈。

游龙般的车队在星夜灿烂的长安街上行驶，西藏代表们被送进豪华的北京饭店。

4月28日晚上，周恩来总理、李济深副主席、陈云和黄炎培副总理等宴请西藏和谈代表。

周总理身穿深灰色呢制中山装，浓眉如雁翎高耸，双目似慧星四射，祝酒词像敲击燧石一样，点燃人心头的一盏灯，一团火。共产党里的大人物真是一个个都像夏夜天空的大星那样让人敬仰啊。

(14) 历史性的记载。

4月29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的第一次谈判，在北京军管会交际厅举行。

中央人民政府的全权代表有4名：首席全权代表李维汉，全权代表张经武，张国华，孙志远。

李维汉是中外闻名的老共产党人，党内的统战和民族问题专家，时为中共中央统战部长兼中央民委主任。张经武是井冈山时代的红军师长。开国后任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同时还兼任军委人民武装部部长。青年将军张国华其时尚未到达北京。他是5月15日方才赶到的。孙志远是西南军政委员会的秘书长，戴着度数很深的眼睛，看上去像个文质彬彬的教授。

西藏地方政府的代表有5名：首席全权代表阿沛·阿旺晋美，全权代表凯墨·索安旺堆，土丹旦达，土登列门，桑颇·登增顿珠。

除了阿沛之外，凯墨·索安旺堆就是西藏代表里最有实力的人物了。他身为藏军总司令，握有兵权，又是噶伦索康的叔叔，而且他从亚东达赖的身边来，噶厦对他面授机宜，他的权威性自然是不容忽视的。土丹旦达是一名僧官，译仓的大秘书长，为人耿介，在西藏有一定威望，土登列门系达扎摄政的副官长，是个实权派人物，噶厦的一些大员们见了他都笑脸相迎，避让三分；桑颇·登增顿珠是个贵族公子，藏军第二代本——团长。

此外，还有两位列席谈判的干部，这就是平措旺介和乐于泓。乐于泓后为西藏工委宣传部长。担任翻译工作的是中央民委干部彭哲，由于他的青海口音较重，后来平措旺介也帮助进行翻译工作。

第一次谈判气氛舒缓而融洽，双方代表互相验看了全权代表证明书后，未谈具体问题。

只是洽谈程序、步骤。李维汉说：“我们是一家人，大家商量把事情办好。”谈判桌上散发了中央人民政府关于和平谈判的十项条件，即西南局为进藏部队制定的“十项公约”，供代表们参考。同时还研究了关于“五·一”节请阿沛和班禅上天安门主席台的问题。最后阿沛首席代表提出：黑河、新疆解放军均在推进，达赖能否留住西藏已成问题。希望解放军不再推进，他

们将以代表团名义，电告达赖，请他勿去印度，李维汉首席代表答应请示中央。

5月2日下午谈判继续进行。

中央人民政府的代表与西藏地方政府的代表为了寻找一个共同点，在进行坚韧的努力。

西藏代表表示接受中央关于和谈的十项条件。但认为进军问题是焦点；因为噶厦政府曾交代不得许诺，所以这个条款不能接受。

李维汉指出：进军西藏是中央的既定方针，中央人民政府帮助少数民族解放，免受帝国主义的侵略，西藏是我国西南国防的前哨阵地，更需要有强大的国防军驻守。

在休会的两天中，中央政府的代表和工作干部耐心细致地向西藏代表介绍解放军的宗旨和优良作风，并拿出清代历史文献，证明中央有权派军队入藏，而且早有先例。说明巩固国防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任务，希望他们消除顾虑，积极协助就人民解放军进藏问题达成协议。

阿沛首席代表经过反复考虑，首先接受了中央人民政府代表的意见，他劝说其他代表也逐渐接受了这一意见。

5月7日，举行第三次会谈，双方代表确定了进军西藏、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

随着和平谈判的深入，难题一个一个的解决，中央和谈代表重新将维持班禅的固有地位及职权这一问题提到议程上。但是，西藏和谈代表认为这一次是来谈和平解放的事情的，不是谈班禅问题的；而班禅的合法性噶厦政府还未承认呢。

中央政府代表李维汉拿出了原国民党中央政府李宗仁代总统给十世班禅的封文，还有班禅在青海塔尔寺坐床的一些照片。”西藏代表终于承认了班禅的合法地位。

既然承认了班禅大师，就得恢复班禅大师固有的地位及职权，就必须把这一条写进《协议》里法定化。西藏和谈代表表示还要发电报向在亚东的达赖喇嘛请示。

亘到5月28日，和谈代表团接到达赖来电，表示完全同意班禅问题列入协议，至此，代表团全体成员心里的一块石头方才落地。

20多个日日夜夜，周恩来关注着谈判的一切。他精细入微地听取汇报，亲自安排西藏和谈代表的参观活动，嘱咐要把协议的藏文本翻译好……黄河与长江的大波推出了这样一个日子，喜马拉雅的石壁上镌刻着这样一个日子，中国大陆的解放史上记载着这样一个日子——1951年5月23日。

下午4时许，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签字仪式。主持签字仪式的朱德、李济深、陈云肃立在巨幅五星国旗下，他们的左首站立着中央和谈代表团李维汉等4位代表。坐在长桌前签字的是阿沛·阿旺晋美等5位西藏和谈代表。他们使用着书写藏文所特用的竹笔。

5月24日晚上，为了庆祝协议的签订，毛泽东主席举行了盛大宴会。应邀出席的有班禅大师及其堪厅随员；西藏地方政府的5位全权代表及其随员，中央人民政府的4位全权代表及有关人员，应邀作陪的，有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朱德、刘少奇、李济深，政务院副总理董必武、陈云、郭沫若、黄炎培，以及首都各界著名人士180余人。

宴会的气氛十分热烈，毛泽东、班禅和阿沛都在宴会上讲了话。毛泽

东兴致勃勃讲了很多，他着重强调了团结。他说：几百年来，中国各民族之间是不团结的，藏民族内部也不团结，这是满清政府和蒋介石政府统治的结果，也是帝国主义挑拨离间的结果。现在，达赖喇嘛所领导的力量与班禅额尔德尼所领导的力量和中央人民政府之间都团结起来了……今后，在这一团结的基础上，我们各民族之间，将在各方面，将在政治、经济、文化等一切方面，得到发展和进步。

5月28日，《人民日报》用藏汉两种文字公布了协议全文，发表了社论，并报道了谈判经过。辽阔的中国大地上，有许多地方群众集会或游行，热烈欢庆祖国大陆全部解放。班禅大师也发表声明，表示拥护“十六条协议”。

1951年7月13日上午，在距离亚东半日路程的国境界山乃堆拉山口，出现了一行穿着各式服装的人。为首的是一个身穿灰色制服的清瘦的中年人。他，便是从北京出发，飞经香港、新加坡、新德里，星夜兼程赶来的中央人民政府驻西藏全权代表张经武将军。他带来了毛泽东主席给达赖喇嘛的亲笔信。在张经武代表的亲切劝说下，同时也在护神吉祥天女“神卦”的指引下，十四世达赖丹增嘉措于7月21日启程返回拉萨。

1951年10月2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8军的主力渡过了一条蔚蓝色的大河，进入了世界屋脊名城——拉萨。

第五部 炮击金门内幕

(1) 中央指定叶飞指挥。

1958年7月，正是东南沿海的台风季节。

这一天，福州军区第一政委叶飞，正同机关、部队一道，帮助当地农民抢收水稻。突然，军区司令部参谋匆匆赶来，请政委回作战室接北京来的保密电话。

叶飞拿起电话，耳机里传来了总参谋部作战部长王尚荣的声音：“叶政委吗？中央决定炮轰金门，指定由你指挥！”那时福州军区新任司令员是韩先楚，已经到任接替了叶飞的工作。叶飞虽然仍兼军区第一政委，但工作的重点主要是在地方了。这是一个重大的军事行动，应该由军区司令员指挥，为什么要政委来指挥呢？叶飞有点疑问，就问道：“到底是不是中央决定要我指挥的？”王尚荣答：“是中央决定。”王尚荣感觉到叶飞有怀疑，就说：“刘培善同志在这里，你可以问问他。”刘培善接过电话说：“是的，是毛主席决定要你指挥。”叶飞说：“韩先楚司令员现在在北京，应该由韩司令员指挥啊！”刘说：“那你就不要问了。”叶飞只好回答：“既然如此，那行，我接受命令来指挥。”叶飞接受任务后，立即召开省委会议，安排工作。决定江一真代替他主持省委日常工作，并立即组织前线指挥所。第二天，由福州乘车奔赴厦门，同去的有副司令员张翼翔和副政委刘培善，张兼任前线指挥所参谋长。此时，皮定均副司令员在南京军事学院学习，不在福州。

7月19日叶飞一行到达厦门，迅速展开多项准备工作，24日前完成了一切作战部署。7月27日收到中央军委的电报，内容是毛泽东致彭（德怀）黄（克诚）的信（注：此时国防部长彭德怀主持军委工作，黄克诚为总参谋长）：睡不着觉，想了一下。打金门停止若干天似较适宜。目前不打，看一

看形势。彼方换防不打，不换防也不打。等彼方无理进攻，再行反攻。中东解决，要有时间，我们是有时间的，何必急呢？暂时不打，总有打之一日。彼方如攻漳、汕、福州、杭州，那就最妙了。这个主意，你们看如何？找几个同志议一议如何？……如彼来攻，等几天，考虑明白，再作攻击。以上种种，是不是算得运筹帷幄之中，制敌千里之外，我战则克，较有把握呢？不打无把握之仗的原则，必须坚持。如你们同意请将此信电告叶飞，过细考虑一下，以其意见见告。

毛泽东信上所说“中东解决，要有时日”，指的是1958年7月14日伊拉克人民发动革命，推翻了旧统治集团，美帝国直接出兵入侵黎巴嫩，随后英国又侵入约旦。同时，美国于7月15日宣布其远东地区陆海空军进入戒备状态。中东形势骤然紧张，成为世界矛盾的焦点。美、英、法介入后，苏联也有所动作。世界进步舆论都声援中东人民的反侵略斗争。蒋介石集团企图乘机扩大事态，于7月17日宣布所属部队处于特别戒备状态”。金门、马祖与台湾国民党军先后进行军事演习，同时加强空军对大陆侦察活动和袭击准备。

叶飞接到电报后，立即找张翼翔、刘培善商议，觉得各项准备工作比较紧张，加之福建沿海遭受台风袭击，连续暴雨19天，冲毁大小桥梁43座，公路铁路塌方情况严重；部队在阴雨中昼夜作业，疲劳过度，疾病丛生；特别是空军进入福建前线的转场尚未完成，海军入闽部队尚在调动中，认为推迟炮击时间较为有利。当即复电表示：根据前线情况，准备工作做得充分些再进行炮击，较有把握。

由于推迟了炮击时间，又进行一个月的准备工作，完成了地面炮兵的集结和展开。炮兵对金门炮击的所有目标，都进行了现场交叉测量、观察，把目标都一一标在作战图上；也完成了空军的紧急战斗转场、海军舰队和岸炮部队的入闽部署，制定了炮兵、空军、海军协同作战方案，一切作战准备都就绪了。

（2）炮击金门序幕是空战。

炮击金门的序幕是空战。没有这场空战掌握了福建前线的制空权，就没有下一步的炮击。

当时沿海机场的飞机起飞，不能朝大海方向，只有往后飞，升空后再调头。如果朝前起飞，就飞到台湾海峡上空了。我空军要在福建前线站住脚，首先必须要战胜敌人的空军，不然，掌握不了制空权。为了加强福建前线空战的指挥，原志愿军空军司令员聂凤智调任福州军区空军司令员。海军进入福建后，彭德清也调来往厦门海军基地司令员。

7月的一天，空军进入福建。看到我们自己的飞机飞临福州上空，人民欢欣鼓舞，机关办公的、工厂做工的、学校上课的、全从屋子里出来，很多人爬到屋顶上吹呼。因为人民群众以前吃够了敌人的空袭的苦头，天天有警报，不得安宁，在福建前线的空战中，美国自己的飞机不来，只是掩护台湾蒋军空军基地，在台湾海峡上空巡逻飞行，掩护蒋军飞机在第一线作战。我军的飞机每次只能出动一半，另一半保护机场。国民党空军没有这个顾虑，机场由美国空军保护。

空战后期，国民党空军使用了响尾蛇空对空导弹。空战中，我军有两架飞机不明不白地被打落了，开始我军不知道是怎么被击落的，后来才弄清是新式武器干的。

这场争夺制空权的空战持续了半个多月，甚为激烈。国民党空军损失 50 多架，大约占它总数的三分之一。我军损失 20 多架。空战后，敌人老实了。制空权被我军掌握了，为大批炮兵开进厦门，为炮击金门打下了基础。

接着，炮兵调来约 3 个师，还有 1 个坦克团。这次调动都是晚上行动，重炮加上坦克，夜间通过福州开往厦门，轰轰隆隆，连街道都颤动了，空军、海军、大批炮兵和坦克进入福建，老百姓高兴极了，纷纷议论，都认为这一次不但是要解放金门，而且一定是要解放台湾了。

8 月上旬，地面炮兵全部进入了阵地。海军 130 岸炮部署在厦门对岸角尾。炮兵阵地从角尾到厦门、大嶝、小嶝，到泉州湾的围头，呈半圆形，长达 30 多公里。大金门、小金门及其所有港口、海面，都在我远程火炮的射程之内。一切都准备好了，只等待北京来命令。

(3) 毛泽东在北戴河亲自指挥作战。

8 月 20 日，北京来电话，要叶飞速去北戴河。他立即乘专机赶去。21 日下午 3 时，毛泽东派人找叶飞去他的住处。叶飞一见到主席，就详细汇报了炮击金门的准备情况，炮兵的数量和部署，以及实施突然猛袭的打法。彭德怀、林彪也参加了汇报会。

毛泽东一面听叶飞汇报，一面看地图，精神非常集中。汇报完后，毛泽东突然提出这么一个问题：“你用这么多的炮打，会不会把美国人打死呢？”那时，美国顾问一直配备到国民党部队的营一级。叶飞回答说：“哎呀，那是打得到的啊！”毛泽东考虑了十几分钟又问：“能不能不打美国人？”“主席，那无法避免！”毛泽东听后，再也不问其它问题，也不作什么指示，就宣布休息。大家知道，这是毛泽东要进一步考虑问题了。

晚饭后，王尚荣拿了一张条子给叶飞，那是林彪写给毛泽东的。林彪这个人很会捉摸毛泽东的意图，他知道毛泽东很注意能否避免打到美国人问题，所以写了这个条子提出：是否可能通过王炳南（正在华沙同美国进行大使级谈判）给美国透露一点消息。林彪此人也有点莫名其妙：告诉美国人就等于告诉台湾，这怎么行呢？看到条子，叶飞很吃惊，便问王尚荣：“主席把这信交给我看，有没有什么交代？是不是要我表态？”“主席没说什么，只说拿给你看。”第二天继续开会。毛泽东下决心了，看来没有理睬林彪的建议。

他说：“那好，照你们的计划打。”并要叶飞留在北戴河指挥，跟彭德怀在一起住。

究竟是什么意思？叶飞不懂，也不好问。彭德怀也没派参谋来叫他住到他那里去。

晚上叶飞散步后回到房间里，正在发愁，恰好王尚荣来，他说：“老兄，主席不是交代你住到彭老总那里吗？”叶飞说：“我哪好去往啊？！”王知道叶飞为难，就说：“我替你想个办法，把专线电话架到你的房间里。”这下就解决问题了。

他们商定，前线直接同叶飞通话，叶飞再通过王尚荣转报毛泽东，毛泽东的指示也由王尚荣转告叶飞。叶飞问：“彭老总那里怎么报告呢？主席交代我同他住一起的呀！”他说：“你别管了，此事由我办。”所以，炮击金门是在北戴河指挥的。也可以说是毛泽东直接在指挥。前线则由张翼翔、刘培善代叶飞指挥。

(4) 万炮齐发调遣美舰。

8月23日中午12时，炮击开始。第一次急袭，所有炮兵阵地同时向金门开火，一个小时密集发射了几万发炮弹。火力十分猛烈和密集，整个金门岛笼罩在一片硝烟之中。蒋军猝不及防，死伤惨重。我军的炮火打得很准，一下子摧毁了敌人的许多阵地，特别是集中火力猛击金门胡璉的指挥所；打得非常准确，可惜打早了5分钟！后来得到情报，我军开炮的时候，胡璉和美国顾问刚好走出地下指挥所，炮声一响，赶快缩了回去，没有把他打死。要是晚5分钟，必死无疑。在阵地上的美国顾问被打死之人。对此，美国人一直没有吭声。

毛泽东决定大规模炮击金门，是不是就要解放金门、马祖呢？当时，包括福建前线我军指挥员，还有台湾蒋介石，包括美国艾森豪威尔在内，都没有搞清楚，毛泽东这一重大决策，是同当时不可一世的美国进行较量，是一个有国际、国内重大意义的战略行动。这是当时一切中国人、外国人都没有弄明白的。

毛泽东选择这个时机大规模炮击金门，摆出我军要解放台湾的姿态，一是警告蒋介石，二是同美国进行较量，把美国的注意力吸引到远东来，以调动当时正在侵略中东的美国第7舰队，支援中东人民的斗争。

福建前线我军实施对金门大规模炮击时，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在华盛顿3天睡不着觉，摸不清我军此举的意图。他从我空军入闽，在空战中已击败了蒋介石空军，牢牢地夺取了福建前线上空的制空权；我海军入闽，已基本控制了福建沿海的制海权；大批炮兵及坦克部队调入福建，鹰厦铁路已修通，福建前线包括汕头等地已修建大批空军作战基地等种种迹象判断，我军这次大规模炮击金门行动，决不只是为了要解放金门、马祖，而是要大举渡海解放台湾的前奏，于是下令将地中海美第7舰队一半舰只调到台湾海峡，和第7舰队会合，加强第7舰队、中东局势缓和下来了。

艾森豪威尔不是毛泽东的对手，完全被毛泽东调动了。杜勒斯于9月4日发表声明，公开要扩大美国在台湾海峡地区侵略范围，对中国人进行军事挑衅和战争讹诈。美国从中东的第6舰队调来一半舰只，加上从本国和菲律宾调来的，美军在台湾海峡就有航空母舰7艘、重巡洋舰3艘、驱逐舰40艘。美国第46巡逻航空队、第1海军陆战队航空队和其它好几批飞机也调来台湾，美国第一批陆战队3800人已在台湾南部登陆。侵台美军司令部还公然扬言，要在8日的演习中以舰炮封锁我沿海岛屿。

毛泽东把美国的注意力从中东转移到远东来后，地中海紧张局势趋向缓和。

我国外交部于9月4日发表领海线声明，宣布我领海线为12海里，向全世界宣告保卫我领海不受侵犯的坚强决心。后来福建前线部队用实际行动证明了我国人民的这一立场。

(5) 只打蒋舰不打美舰。

8月下旬，叶飞由北戴河回到厦门前线。此时大、小金门蒋占岛屿，包括金门唯一的港口料罗湾和海面，全部在我炮火射程之内，完全被我炮火封锁，金门和台湾的海上通道截断了。为了补给金门，台湾从海上运输，以海军护航，我军炮火即转向攻击其海上运输线，专门打它的海上运输船只。蒋军舰只受到严重打击，不断被我海岸炮火击沉击伤，最后，金门海上运输线完全被我截断了。金门不但弹药补给中断了，粮食、燃料的补给也中断了，储备的炮弹也在半个月炮战中消耗得差不多。储备粮只有一个月，也消耗差

不多了，于是频频向台湾告急。蒋介石即请求美军护航。以恢复金门的海上补给线。

9月7日，美蒋组成一支海上大编队。美国军舰配置在海上编队左、右两侧护航，把蒋军舰只运输船只夹在中间，美舰和蒋军舰只相距仅2海里，由台湾向金门开来。美蒋联合编队从台湾一出动，我军在雷达上就看得一清二楚。情况复杂化了，美军已经卷入，怎么办？打不打？如果一打，势必会把美舰一起带上，这就可能把美国拖下水，同美军发生直接冲突。所以，打不打美蒋海军联合编队，事关重大，不是一个单纯的军事行动，这不是前线指挥员有权可以作出决定的，只能由中央、最高统帅毛泽东才能作出决定的，叶飞立即请示毛泽东。

毛泽东回答：“照打不误。叶飞又请示：是不是连美舰一起打？毛泽东回答：只打蒋舰，不打美舰。并且交代要等美蒋联合编队抵达金门料罗湾口才打，要叶飞每一小时报告一次美蒋联合编队的位置、编队队形、航行情况，到达金门料罗湾时，要等北京命令才能开火。

叶飞为了准确执行只打蒋舰、不打美舰的命令又请示：我们不打美舰，但如果美舰向我开火，我们是否还击？毛泽东明确回答：没有命令不准还击。

命令是由总参作战部长王尚荣以直达军用专线电话向叶飞转达的。叶飞接到这个电话，极为吃惊，恐怕电话传达命令不准确，铸成大错，再问王尚荣：如果美舰向我开火，我是不是也不还击？回答是毛主席命令不准还击，清清楚楚。

这样叶飞就说：明白了，我严格按照毛主席的命令执行。

这一下叶飞就极为紧张了，因为要严格执行毛泽东的命令，只打蒋舰，不准打美舰，这很不好办。美舰和蒋舰相距仅2海里，如果哪一个炮群瞄不准确，稍有误差，就会打到美舰。至于如美舰向我开炮，我不予还击，这倒还比较好办。

叶飞为了准确执行毛泽东的命令，就亲自向31军及各炮兵群下达命令：待美蒋联合编队抵达金门料罗湾港口，北京下了命令后才开炮；各炮群只打蒋舰，不准打美舰；如美舰向我开火，我不予还击！各炮群接到叶飞这个命令，都吃惊了，纷纷追问。叶飞又把命令再复述一次，并问炮群是否都听清楚了，明白了？各炮群回答听清楚了，明白了，按毛主席的命令严格执行。

9月7日中午12时正，美蒋海军联合编队抵达金门料罗湾港口，运输船只开始在料罗湾港口码头上卸下补给物资。情况直报北京，毛泽东下令开火。全线所有炮群接到命令，即以突然的密集火力攻击蒋舰及其运输船只，集中攻击料罗湾港口码头。没想到我军一开炮，美舰丢下蒋舰及运输船只不顾，立即掉头向台湾方向逃去。这时，金门蒋军和在料罗湾的蒋舰纷纷向台湾告急。台湾问：“美国朋友？美国军舰呢？”蒋舰回答：“什么朋友不朋友？美国军舰已经掉头跑了！”他们大骂“美国人混蛋”，使用报话机通话，连密码都不用，我军的侦听机听得清清楚楚。蒋舰被我军击沉3艘、击伤数艘。台湾即下令蒋舰返航，这一场惊险的战斗就这样戏剧性地宣告结束。

（6）试探美蒋合防条约效力。

通过9月7日的炮击，中共中央、毛泽东初步摸到美国的底细。当然，美国军舰这一天未敢开火也许有一定的偶然性，美国真正的态度如何？还有待于进一步证实。

9月9日，杜勒斯公开发表声明，宣布“美国决定使护航的美舰保持在

沿海岛屿 3 海里之外”，进一步清楚地表明了美国的态度。9 月 11 日，有 4 艘美国军舰再次掩护国民党的 4 艘运输舰、7 艘作战舰向金门驶来，周恩来立即亲自布置了打击这次护航编队的战斗，准备以这一行动进一步摸清美国的战略底盘。

9 月 11 日 11 时以后，美蒋混合编队侵入金门海域的中国领海。周恩来下达命令后，从 14 时 57 分起，前线解放军炮兵又以 40 个地面炮兵营又 6 个海岸炮兵连的强大火力射击驶近料罗湾的国民党军运输舰和金门岛上的目标。

这一次国民党军的运输舰吸取了前几天的教训，不再等待美舰的掩护，一遭打击就急忙向外海逃走，因而只有 1 艘被击伤。美国军舰同 9 月 7 日的表现一样，在解放军发炮后马上退向外海，仍一炮未发。

通过 9 月 11 日的炮击，中共中央、毛泽东终于摸清了美国的战略底盘。正如叶飞后来所回顾的：事后我才明白，原来毛主席命令只打蒋舰，不准打美舰，并且规定如美舰向我开火，我军也不予以还击，这一切都是在试探美帝国主义所谓美蒋共同防御条约的效力究竟有多大，美军在台湾海峡的介入究竟到了什么程度。经过这一次较量，就把美帝国主义的底全都摸清了。美帝国主义虽然貌似凶恶强大，在全世界到处横行霸道，不可一世，其实也是一只纸老虎。

所谓美蒋共同防御条约也是有一定限度的，只要涉及美帝自身的利益，要冒和我军发生直接冲突的危险，它就不干了，就只顾自己，不顾别人了，如此而已。

这时台湾海峡的形势已经非常清楚，蒋介石千方百计想拖美帝下水，而我们则力求避免同美帝发生直接冲突，美帝也极力避免同我发生直接冲突，这就是当时台湾海峡非常微妙的三方形势。

（7）继续封锁打零炮。

1958 年 9 月 7 日和 11 日两次炮击后，国民党见乞求美国护航已经不能达到预定目的，于是变换方式对金门实施补给，企图在岛上继续坚持下去，并仍想利用金门问题把美国拖入中国内战。美国在对新中国进行军事讹诈未收到效果的情况下，开始实行脱身政策，企图压迫蒋介石放弃金门、马祖，进而造成台湾和大陆在政治上的彻底分离。针对不断变化的复杂形势，中共中央、毛泽东一面思考新的对策，一面要求人民解放军继续封锁金门，使国民党更加陷入困境，以加深美蒋矛盾，力从长远角度解决台湾问题创造条件。

9 月 13 日，毛泽东对解放军前线炮兵自月初以来开展的零炮射击活动加以肯定，电令参战部队炮兵全面开展这一活动，要求做到白天黑夜打零炮，每天 24 小时，特别是料罗湾 3 海里以内，打零炮（每天打二三百发），使敌昼夜惊慌，不得安宁，以增强全面封锁的效果。根据这一指示，福建前线炮兵在发现重要目标时才集中进行大规模炮击，而平时则转入零星炮击，使金门岛上的国民党军日夜都需要隐蔽在阴暗潮湿的坑道中，岛上的地面活动基本陷入停顿。

由于金门岛上的守军处境日益困难，急需补充粮弹和各种物资。9 月 13 日，台湾国民党军又采用了一种新的运输方式，在天还未亮的凌晨用“美”字号运输舰进行偷运。但是运输舰在接近料罗湾时又遭到解放军猛烈的炮火射击，2 艘“美”字号都中弹负伤逃回，补给再次失败。

鉴于由运输舰直接靠岸运输已不可能，国民党海军的运输人员想到了

利用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常用的履带式水陆输送车（LVT，台湾军方俗称为“水鸭子”）。当时，解放军的海空军为了避免中美军事冲突奉命不出外海，而海岸边的炮兵人力射程也在 20 公里左右，国民党海军以装载水陆输送车的大型运输舰于白天驶到金门以南解放军炮兵火力无法达到的海面水陆输送车装载货物后再从舰上下水，直接抢滩上岸卸载。9 月 14 日，台湾国民党军首次试用这种补给方式，虽然 17 辆离舰抢滩的水陆输送车在解放军炮击中损失 2 辆，但是台湾当局认为还算成功，下令继续实施。与此同时，台湾当局又利用傍晚和夜间对金门守军进行空投，近海施放水陆输送车抢滩和空投，自此成为对金门实行补给的两项基本方式。

9 月 15 日，中央军委对于封锁金门问题也作出新决定，强调：为了进一步封锁金门，炮兵要努力改进射击技术，重点打击驶进料罗湾的运输舰艇及卸载点，切实避免误击美舰，并加强对空投场的炮击；空军要加强大陆沿海空空的巡逻活动，掩护炮兵打击空投的国民党军运输机，并坚决打击进入大陆上空的国民党军战斗机；海军在确不误击美舰的前提下，夜间可予进入料罗湾的国民党军舰艇以打击。根据中央军委加强封锁的精神，从广州军区和其他单位抽调的地面炮兵、高射炮兵部队又陆续入闽，使参加炮击金门的地面炮兵部队达 14 个团另 7 个营又 14 个连，还有海岸炮兵 8 个连。

9 月 20 日以后，美国又以军舰和航空兵为国民党军护航，不过护航的方式有所改变。

美舰再度和国民党军舰混合编队，行驶至金门外海解放军岸上炮火射程之外停泊，再由国民党海军的运输舰放下水陆输送车，涉水上岸卸货。这样，解放军的炮兵已经无法炮击国民党军的舰只，而水陆输送车长度仅几米，目标甚小，又处于运动之中，火炮远距离射击很难命中。美军舰载战斗机则由停泊在台湾海峡的航空母舰上起飞，几乎每天都出动数十架次，掩护国民党空军的运输机飞抵距金门 20 公里以外的空域（正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的领海线以外），然后美机在外面巡逻掩护，国民党军的运输机则迅速飞入金门上空实行空投。这种补给方式，确实给人民解放军实施封锁带来了相当大的困难。

针对国民党补给方式的变化，解放军前线部队响应研究了对策。由于金门斗争牵涉到复杂的国际问题，军事行动必须服从政治斗争和外交斗争的需要，9 月 24 日中央军委又向前线部队重申了“以炮击为主，海军空军在确实不误击美舰美机和有把握胜利的原则下相机作战”的方针。当时，由于台风，海面涌大浪高，解放军海军快艇的吨位一般都只有几十吨，这类小艇出海已很困难，因此封锁任务主要由炮兵和空军担负。炮兵根据新的敌情研究了打击国民党的水陆输送车并封锁空投场的新战法；空军则寻找时机，在确保不同美机交战的情况下打击国民党军的运输机。

解放军炮兵为了有效地打击水陆输送车，将部分远射程的火炮和海岸炮前推，增大火力控制范围，迫使国民党军的运输舰在更远的海面停泊，使水陆输送车因增大航程更易遭受打击，同时，迫其在距岸更远的海中下水，在海浪中也容易发生沉没事故。此外，解放军炮兵经周密计算，在料罗湾各主要航道上及沿岸便于水陆输送车着陆的滩头，事先计划移动拦阻射击弹幕和不动拦阻射击火墙，一旦发现水陆输送车或小型登陆艇上岸，马上呼唤火力实施较准确的射击。开始，国民党军的水陆输送车由舰上泛水后，分波次成一列横队抢滩上陆，这样在解放军的炮火打击下每次都有几个目标被毁

伤。

另外，有的水陆输送车还在海中翻沉。如一辆满载新闻记者的输送车沉没，当场就淹死记者6人（其中有南朝鲜记者1人，日本记者1人），一时在台湾和国外新闻界引起了轰动，同时也更增加国民党的恐慌情绪。

国民党军在其水陆输送车连遭打击的情况下，又不得不改变抢滩上岸的方法，其运输舰在距金门更远的海面放下减少装载量的水陆输送车（这样航渡时可安全些），然后由输送车在多方向以单个不规律的跃进方式上岸。这种运输方式确实可以大大减少遭受炮击的危险，可是运输量同样也大为减少。

由于海上运输量远不能满足金门守军的需要，台湾当局又只得加紧空投运输。自从9月3日金门机场在解放军的炮火打击下起降中断后，国民党空军就一直利用视度较差的天候（黄昏、拂晓或夜间）对金门进行低空空投。解放军炮兵和空军针对这一情况，反复研究了打击运输机和空投场的办法。解放军炮兵以加农炮和中口径高射炮在前沿配置，对金门岛上各空投场构成空中火网，国民党空军的运输机一临空，马上以浓密的炮火射击，使其无法空投或升高盲目空投。敌机逃走后，炮火马上转移打击空投场和着陆物资，杀伤地面人员。针对国民党空军夜间空投的情况，解放军在前沿岛屿和突出部也模拟国民党军的炮光信号，诱使其运输机误投。这样，从9月23日至29日，解放军炮兵不仅击落国民党军运输机1架，击伤2架，而且使国民党空军的运输机投下的物资损失甚多，有许多还投到解放军阵地上来。台湾当局的空投计划没有一天能够如数完成。金门国民党军一天中最多只能得到100余吨空投物资，杯水车薪，无济于事。

随着金门守军遭封锁后处境日益恶化，美蒋之间的矛盾也日益激化了，已经公开表现出美国企图在金、马脱身，而蒋介石坚持不撤，仍想以金、马把美国拖在中国内战中。

（8）毛泽东为何不取金门。

正当美蒋为金门撤守问题激烈争执之时，1958年10月6日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福建前线广播站传来中国人民解放军对金门暂停炮击的消息，使台湾海峡两岸的军民乃至世界舆论都大感意外。从这时起，炮击金门进入一个打打停停的阶段，作战完全变成一场地地道道的政治战。

早在8月23日开始炮击金门前，毛泽东就确定了“走一步，看一步”的方针，对于是否夺取金门要看形势的发展而后定夺。自9月中旬摸清美国的战略底盘后，毛泽东就一直在思考下一步的方针。9月下旬美蒋在金门撤守问题上的矛盾公开化以后，毛泽东审时度势，从反对美国制造“两个中国”或“台湾独立”的阴谋，以扩大反美统一战线的长远目标出发，毅然决定改变封锁金门的方针，让金门、马祖继续留在台湾国民党当局手中。这一决定，向台湾方面乃至全世界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对台政策的一个重大变化，再次显示出和平统一祖国的诚意。

毛泽东确定的这一新的方针，是基于我国国家利益、全民族的长远利益，经过对国际国内多种因素反复研究，权衡各种利弊，才最后下定的决心。从当时的某些眼前利益来说，如果逼蒋从金、马撤退或登陆夺取金、马固然有很大好处；但是如果斩断了蒋介石乃至整个台湾当局同大陆有地理关联的这条政治纽带，从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长远目标来看，反倒有可能增加困难。

自1955年浙东沿海作战结束后，中共中央、毛泽东对于夺取金门、马

祖的考虑已完全服从解决台湾、实现祖国统一的大局。在大陆战事已结束，台湾海峡两岸的社会情况又有了很大变化之后，国共两党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已经改变。在共同维护一个中国的前提下，国共之间重新对话，并建立某种程度的合作，在事实上已经有了可能。因此，自 1955 年以后中共中央就向台湾当局发出和平谈判和重新实行国共合作的建议。由于台湾当局依仗外国势力拒不接受，中共中央、毛泽东才决定以炮击金门这种军事行动以促进政治上全面解决台、澎、马问题。在炮火封锁金门后，如果只能夺取金、马而不能同时解决台湾问题，那么国共之间在地理上的距离将由不足 10 公里扩大到 100 多公里，对话、接触将更为不便。而且蒋介石失去象征其在大陆沿海存在的最后据点，将使得美国更便于制造“两个中国”或支持“台独”。反之，将金门、马祖留在蒋介石手中，不但有可能促进今后两岸关系的改善，也会使蒋介石有资本去抵制“台湾独立”的活动，同时能扩大美蒋矛盾，争取台湾广大军民，建立更广泛的反美统一战线。另外，当时毛泽东还考虑实行牵制美国战略力量的“绞索政策”，留下金门、马祖，可能套住美国，使它在战略上难以脱身。

10 月 5 日 8 时，毛泽东指示福建前线部队：“不管有无美机、美舰护航，10 月 6、7 两日我军一炮不发，敌方向我炮击也一炮不还。偃旗息鼓，观察两天，再作道理。”根据毛泽东的决定，中央军委确定了“打而不登，封而不死”的决策。为了向党内军内解释作出这一决策的原因，10 月 5 日晚中央军委发出关于金门、马祖等沿海岛屿军事斗争的指示。

指示中说：我们目前以收复金马还是仍由蒋军占据金马，两者对今后斗争孰较有利，是我们当前必须考虑和决定的问题。当然，早日收复金门、马祖，对解除福建沿海地区的直接威胁，对打开海上交通，发展福建沿海的经济建设，对于鼓舞全国人民和我军的士气有很大好处，如果做到这一点，应该说对我们是一个巨大的胜利。但是，把这个胜利和暂时利用金马把敌人套在绞索上，把解放金马和解放台湾统一来解决的长远利益比较起来，则不如把金马暂缓解放仍由蒋军占领似乎较为有利。

军委的指示还要求福建前线部队：在目前，宜减轻对金马的军事压力，使金马蒋军能够生存下去，是必要的。同时又要求仍要使其处于紧张的状态，拖住美国不得拖身。为了打破美国的停火的阴谋，在必要时，我仍可组织像过去那样的大打。总之，临机应变，主动在我。

10 月 6 日凌晨 2 时，由毛泽东起草、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部长彭德怀的名义发表的《告台湾同胞书》发表，公开声明暂以 7 天为期，停止炮击，并向台湾当局建议举行谈判，实行和平解决。

这份《告台湾同胞书》不仅据理说明了炮击金门的理由，而且划清了台湾问题上内政和对外交涉的界限。这一公告发表后，在海内外引起了不小的震动。台湾当局虽然对此不公布，但是台、澎、金、马的军民从暂停炮击的行动、收听广播和口头传闻中也大体知道了中国共产党的态度。金门岛上的气氛也马上缓和下来。岛上十多万军民从躲藏了 40 多天的阴暗潮湿的坑道和防炮洞中走出，见到了阳光，都为眼前的危险消除而感到高兴。岛上国民党军的炮兵在解放军的停止炮击期间也一炮不打，台湾军方则抓紧这 7 天大力运输，不仅运上几十天的补给品，而且运上了美国供给的 8 英寸（203 毫米）重炮，准备长期固守。

对于彭德怀元帅的文告，台湾国民党当局随即表示“这完全是骗局”，

对此“不予理会”，但是蒋介石也十分担心这一文告会影响美国对他的支持，因而强调“宁可冒继续炮击封锁的危险，亦不愿美国盟邦退出护航。”可是美国对这一文告的反应却是表示“欢迎”，并宣布从8日起暂停护航。不过美方同时又歪曲这一文告，把中国政府基于民族大义所宣布的暂停炮击和它鼓吹的所谓“停火”混为一谈，并要求实行“永久停火”，即承认它人为制造的海峡两岸分裂的事实。

台湾当局在金门虽然不敢破坏为时7天的事实上的休战，但是为显示自己尚有战斗能力，于10月10日“双十节”这天又出动飞机到大陆上空挑衅，当天，国民党空军共起飞44批共182架作战飞机，至大陆沿海岸线地区，其中有6架窜入福建龙田上空。解放军空军当即以航空兵第14师二个大队起飞迎战，双方又进行了一场空战。空战中，解放军飞行员杜凤瑞击落F-86战斗机2架，其中一架的飞行员张乃军跳伞后被俘。杜凤瑞的飞机在空战中也遭击落，他跳伞后在空中被另一架国民党军飞机击中牺牲，这架国民党军飞机又随即被解放军高炮第105师击落。这次空战，国民党军被击落战斗机3架，解放军被击落歼击机1架，此后，国民党军的战斗机基本上不再进入大陆上空，其活动线退到福建的海岸线以外。从解放军空军7月末入闽至10月，福建上空共进行空战13次，解放军航空兵总共击落国民党军飞机14架，击伤9架；解放军飞机被击落6架（其中空军5架，海军航空兵1架），被击伤5架。

10月12日午夜，《告台湾同胞书》宣布的7天暂停炮击的期限已满，金门国民党军和当地居民又全部进入坑道和掩体。可是解放军一炮未发。13日凌晨，福建前线广播站又播送了国防部长彭德怀对福建前线人民解放军的命令。

对毛泽东的写作风格有所了解的人，一看就知道这个命令也出自毛泽东的手笔，命令全文如下：福建前线人民解放军同志们：金门炮击，从本日起，再停两星期，借以观察敌方动态，并使金门军民同胞得到充分补给，包括粮食和军事装备在内，以利他们固守。兵不厌诈，这不是诈。这是为了对付美国人的。这是民族大义，必须把中美界限分得清清楚楚。我们这样做，就全局说来，无损于己，有益于人。有益于什么人呢？有益于台、澎、金、马一千万中国人，有益于全民族六亿五千万人，就是不利于美国人。有些共产党人可能暂时还不理解这个道理。怎么打出这样一个主意呢？不懂，不懂！同志们，过一会儿，你们会懂的。

呆在台湾和台湾海峡的美国人，必须滚回去。他们赖在那里是没有理由的，不走是不行的。

台、澎、金、马的中国人中，爱国的多，卖国的少。

因此要做政治工作，使那里大多数的中国人逐步觉悟过来，孤立少数卖国贼。积以时日，成效自见。在台湾国民党没有同我们举行和平谈判并且获得合理解决以前，内战依然存在。台湾的发言人说：停停打打，打打停停，不过是共产党的一条诡计。停停打打，确是如此，但非诡计。你们不要和谈，打是免不了的。在你们采取现在这种顽固态度期间，我们是有自由权的，要打就打，要停就停。美国人想在我国的内战问题上插进一只手来，他们叫做停火，令人忍俊不禁。美国人有什么资格谈这个问题呢？请问他们代表什么人？什么也不代表。他们代表美国人吗？中美两国没有开战，无火可停。他们代表台湾人吗？台湾当局没有发给他们委任状，国民党领袖根本反对中美

会谈。

美国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其人民是善良的。他们不要战争，欢迎和平。

但是美国政府的工作人员，有一部分例如杜勒斯之流，实在不大高明。即如所谓停火一说，岂非缺乏常识？台、澎。

金、马整个地收复回来，完成祖国统一，这是我们六亿五千万人民的神圣任务。这是中国内政，外人无权过问，联合国也无权过问。世界上一切侵略者及其走狗，通通都要被埋葬掉，为期不会很远。他们一定逃不掉的，他们想躲到月球里去也不行。寇能往，我亦能往，总是可以抓回来的。一句话，胜利是全世界人民的。金门海域，美国人不得护航。加有护航，立即开炮，切切此今！

这一文告发表后，金门地区乃至整个台湾海峡的局势得到进一步缓和。在 10 月 13 日以后的一星期里，金门和对岸地区炮声沉寂，金门岛上的军民通过切身体会相信解放军是言而有信的，岛上恢复了正常的地面活动。对于中国共产党以实际行动表现出的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诚意，以及基于民族大义发出的呼呈；台湾当局虽然不响应，但是毕竟控制不住它在岛内的影响。在香港和海外侨胞办的一些报刊上，也纷纷发出重开国共和谈呼声。中共中央以打促和的方针，已经开始收到一定成效。

(9) 单日打、双日停的戏剧性战争。

从 10 月 6 日起至 10 月 20 日金门地区休战的时间内，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和美国三方都在认真观察各方动态，并继续做出试探，结果最后演变为一种极其特殊的带有戏剧性的作战形式，出现了古今战争史上的奇观。

自 10 月 13 日彭德怀的文告宣布人民解放军再停止炮击两周后，美国官方十分得意，宣称是它的强硬政策才带来台湾海峡的和平。美国官方一方面在对外声明和中美大使级会谈中要求中国方面“永久停火”，一方面又压迫蒋介石撤退或减少在金、马的驻军。蒋介石面对中共方面和平呼吁和美国要其撤退的双重压力，为维持其军心士气，于 10 月 14 日在接见澳大利亚记者时公开发表谈话称：“不撤退，不姑息”。这实际上是向美国表示他决不接受撤军的态度。

美国政府为了要蒋介石听从自己的安排，宣布将派杜勒斯于 10 月 21 日赴台同蒋介石会谈。10 月 19 日，美国竟又出动了 4 艘军舰，侵入金门海域为国民党军运输船护航。其实，美国已于 10 月 8 日宣布了暂停护航，这时解放军又未恢复炮击，在军事上本无护航必要，采取这一行动的目的，显然在于试探解放军的停止炮击是否会变为永久性的，并在杜勒斯访台前以此安抚一下蒋介石。

美军的护航行动明显违反了彭德怀文告中“金门海域，美国人不得护航”的规定，同时鉴于杜勒斯即将访台，中央军委决定提前恢复炮击。10 月 20 日下午 16 时，解放军又以 32 个炮兵营又 5 个海岸炮兵连猛烈炮击金门，目标为岛上码头、机场和炮兵观察所等处，共发射了 8800 发炮弹。炮击使国民党军的 3 艘运输舰、1 艘大型货船和 1 架 C—46 型运输机中弹，岛上守军在遭炮击 70 分钟后才开始还击。

解放军对金门的炮击虽然给国民党军带来一定的损失，却也给蒋介石增加了拒绝美国要求停火和撤退金、马的资本。10 月 21 日杜勒斯到达台北，随即和蒋介石开始会谈。杜勒斯仍坚持美国原来的意见，即要蒋介石撤退在

金门、马祖的驻军，并停止对大陆使用武力，造成两岸事实上的停火和隔离。结果双方争执起来，蒋介石恼怒地回答说，在我活着的时候不会撤军。最后，在双方都作出让步的基础上达成妥协。美国同意增加对台湾的援助，不再要求国民党从金、马撤退；蒋介石则答应“减少金、马驻军”，不再对大陆使用武力。11月23日杜勒斯离台前，双方依此精神签署了公报并立即发表。可是在公报中对于不使用武力一条，台湾公布的中文本和美国公布的英文本有微小的差别。在英文本中，用的是“not the use of force”，意思很明确地表示“不使用武力”。可是中文本则是“而大量凭藉武力”，用的是比较婉转的语言以维护面子。

看到美蒋矛盾的进一步发展，为了在民族大义的前提下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在杜勒斯回华盛顿后的第二天，即10月25日，由毛泽东起草、以国防部长彭德怀名义发表的《再告台湾同胞书》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福建前线广播站播出。

这篇文告，规定了双日对金门“四不打”，即不打飞机场、码头、海滩和船只，是希望自己包围中的对手能长期固守，已属罕见。而文告提出的愿意向自己作战的对手提供补给品，这更是古今中外战争中的奇闻。到了10月31日，中央军委又进一步发展了“四不打”的方针，决定：“今后逢双日对任何目标一律不打炮，使国民党军人员能走出工事自由活动，晒晒太阳，以利其长期固守；逢单日可略为打一点炮，炮弹一般不超过200发。”从此，正式确定了“双日不打单日打”的新方针。

这种单日打、双日停的奇特作战方式，一时使全世界的舆论感到惊奇。不过，人们都明白了这种炮击已经是一种政治上象征性的战争。实行象征性的单日打炮，是为了反对美国的“停火”阴谋和蒋介石拒绝谈判的顽固态度，表示战争仍然存在；在双日不打；实际上取消封锁，有意让国民党军固守金门，是为了将美蒋继续拖在金门、马祖这根“绞索”上不能脱身，并向台湾当局和广大军民表示中国共产党的和平解决的诚意。这种打法单纯从军事上看，确实为许多人所大惑不解，但它正是毛泽东的策略思想在战争中的一次生动体现。

在实行“双停单打”方针后，人民解放军于11月初又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炮击。这次炮击主要是出于政治上和外交上的考虑。因美国国务卿杜勒斯10月下旬在台湾大肆活动返美后，曾宣传金门战斗已经基本“停火”。蒋介石也宣传共产党军队已是“强弓之末”，已无力再打。为了加大美蒋矛盾，表示金门并未“停火”，同时使蒋介石感到拒绝从金、马减少驻军的口实，毛泽东经考虑后，中央军委又于11月3日下令对金门地区实施比较猛烈的炮击。这次炮击前，福建前线部队司令部向国民党守军事先作了预告。

从3日早上6时起，人民解放军炮兵以33个营又1个连向金门国民党军的阵地实施全面而又有重点的轰击。11月4日因是双日解放军未打炮，5日继续实施炮击，一时又造成“声势大，温度高”的场面。

由于国民党金门守军利用停止炮击的时机补充了弹药，并运进了美制大口径的8英寸（203毫米）重炮，因而又改变了10月6日前很少还炮的态度，在11月3日壮起胆子同解放军进行了较大规模的炮战，集中火力轰击解放军的炮兵阵地。但是国民党军炮兵的火力毕竟不如解放军炮兵，当天解放军发炮1.2万发，国民党军还炮2000多发，最后以国民党军炮兵的火力被压制而结束炮战。在这一天炮战中，国民党军伤亡约140人，特别是大

金门东半岛的炮兵损失较重。人民解放军的炮兵也有部分损失，在大金门正面的大、小嶝岛上的个别炮阵地因工事不坚固被打坏，部分人员伤亡。吸取了经验教训后，11月5日解放军炮兵扩大了阵地配置正面，并广泛实施了机动，还设置了假阵地迷惑对方。当天，解放军向国民党军炮阵地发炮3000发，又摧毁其炮阵地和观察所一部；国民党军还炮1000发，人民解放军却无一伤亡，成为金门炮战中的一个突出战例。这次炮战不仅达到了预期的政治、外交目的，也使新入闽参加轮战锻炼的炮兵部队经受了实战训练。

1959年元旦过后，金门岛上的国民党军炮兵突然对大嶝岛滥施炮击，造成托儿所31名儿童死亡，17人受伤。为了对这一罪行进行惩罚，中央军委决定于1月7日再对金门实施炮击。

为了表示只惩罚少数作恶分子，并利于国民党军继续固守金门，这次炮击只限于金门岛上的炮兵阵地。1月7日下午，解放军炮兵以28个营又8个连猛烈轰击金门，共发射炮弹2.6万发，国民党军还炮约7000发，最后终于以解放军的炮火占压倒优势而结束。这次炮战，实际上成为金门地区最后一次真正的炮战。炮击结束后，1月9日中央军委指示福建前线部队：“今后单日不一定都打炮。”此后单日的炮击也只转入零炮射击，对金门国民党军彻底实行不封不锁，让其悠然固守的方针。自8月23日开始的为时四个月多的炮击金门，到此正式结束。

第六部 中印之战追秘

（1）祈求和平，周恩来冒险访印。

1960年4月19日，印度首都新德里上空阴云密布，细雨霏霏。弥漫升腾的水汽犹如浓厚的暮蔼，笼罩着整座城市。国际机场上的各色信号灯，也失去了往日的绚丽光彩，远远望去，好似一篷篷朦胧的光晕。

印度总理兼外交部长尼赫鲁，站在贵宾厅宽大的落地窗前，久久地凝视着窗外的停机坪。

他身着长袍，棕色的脸庞上嵌着一对黑亮而灵变的眸子，微微翕动的嘴唇不知在自语些什么。

他步伐稳健，精神矍铄，除了那一头华发和唇间黑白相杂的胡须，任谁也不会相信，他已经是71岁的高龄了。

“这位老人推动了世界。”印度人这么说，世界上许许多多国家领导人都这样评价过他。

尼赫鲁从青年时代起就致力于印度的独立解放事业，先后5次被捕入狱。凭着坚韧不拔的意志和超人的组织才能，他和圣雄甘地一道，将印度各党派、各阶层、各种宗教信仰的民族团结到一起，终于赢得了印度的独立。随后，他又创立了不结盟运动，在美、苏两个对峙集团的夹缝中，开拓出了广阔的天地。

1955年的万隆会议，达到了他人生辉煌的顶点。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一道，极力倡导并通过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他亦成为未经选举的不结盟运动的领袖，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然而此刻，他的心境却如这阴雨的天气，晦暗、沉郁。

他在等候一位贵宾，一个老朋友。

这人就是 5 年前在万隆会议上，曾和他并肩站立，高举紧握的两手，向世界呼唤和平的周恩来。

尼赫鲁的心情是痛苦的，他感到左右为难。

两国间的边界纠纷，已经持续了 10 年。他的神经也为此震颤了 10 年。

“每一个新生政权的最初的几乎是本能的反应，就是紧紧保住遗留给他的那份领土。凡是殖民国家曾经统治过的地方，新兴的国家就一定要统治。”最初，他看到英国史学家贡纳尔·米达尔这段话时，曾经加以讥笑。没有想到，现在自己也品尝到了此中的苦辣滋味。50 年代初期，他曾想把边界争端暂时搁置起来，全身心地致力于同中国的友好，他为提高新中国的国际地位而奔走，为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而呐喊。他认为同中国友好是印度外交政策的基石，只要印、中两国联手，就能控制整个亚洲乃至影响世界。当然，他也期望在“友爱”的热流中中国能够在边界争端中给他一个面子，做一些让步。

然而，朗久、空喀山事件的枪声，以及遗留在喜马拉雅山麓的几十具中国和印度士兵的尸体，把他从一厢情愿的述梦中惊醒了。他这才懂得：“边界竟是国家间最敏感的问题”。它不仅直接影响到双方版图的消长、民众的情绪，而且触及到一个国家的要害——威信和尊严。

外交部一位官员匆匆走到尼赫鲁身边，轻轻他说：“总理先生，周恩来的专机准时从仰光起飞，再有 10 分钟即可到达。”尼赫鲁微微颌首，目光依然凝注在玻璃窗上。那上面有十几条因细密雨点聚集而划出的水痕。

邀请中国总理，也许是对的。万隆会议前后，尼赫鲁曾 4 次会见过周恩来。他敏锐地感觉到，周是一位极其出色的外交家，具备一个伟大领袖应有的、全部的优秀品质和出众的才能。他温和、聪睿，极其宽容而又一丝不苟，伟人所独有的各种才智竟汇聚到他一个人身上，真是不可思议。尤其是他迷人的风采和善解人意的谈吐，倾倒了几乎所有结识过他的人。尼赫鲁明白，自己在万隆会议上的成功，起码有一半得力于周恩来。

和他好好谈谈，也许他会理解自己的苦衷，缓和边界剑拔弩张的紧张局势，可是，他会命令军队后撤吗？此时，周恩来的专机已进入新德里上空，这位共和国总理的心境也是沉重的。

中印之间约有 2000 公里的边界，虽然从未正式划定过，但在历史上按照双方的行政管辖范围，形成一条传统习惯的边界线。这条边界西段沿着喀喇昆仑山脉，中段沿着喜马拉雅山脉，东段沿着喜马拉雅山脉的南麓。它一直受到两国人民的尊重。1914 年西姆拉会议期间，英国代表背着当时的中国中央政府代表，在会外同西藏地方政府的代表团用秘密换文的方式划了一条麦克马洪线，企图把 9 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划归英属印度，才使中印两国边界的传统习惯线遭到破坏。印度独立后，尼赫鲁政府继承英帝国主义对西藏的侵略野心，不断向非法的麦克马洪线推进，蚕食中国领土，不断在边界挑起武装冲突，打死打伤我军民，在我境内设立哨所。我国政府一直采取了克制忍让的态度。这次访印，就是祈理通过和平谈判解决边境争端。

天空隐隐传来了飞机的轰鸣声。3 架波音客机从云层里露出银亮的机身。尼赫鲁做了个手势，当先步出贵宾厅的大门，走到停机坪侧早搭好的大帐篷里。

飞机划过溅着水花的跑道，最后停在机坪的中心。

舱门拉开，第一个走出机舱的是周恩来。他顾盼了一下整个机场，仿佛没有注意到前来欢迎的仅百十余人，仍然微笑着，扬着手臂走下舷梯。

尼赫鲁的心抽动了一下，他不知道这是好运气还是恶兆头。他回头望了一望，跟在身后的，除了各国外交使团的人外，只有七、八个板着脸孔的自己的属下。顿时，他心头涌起了一阵窘迫。前3次来访问时，欢迎的人群如潮如海，政府的所有官员几乎都挤到机场，期望目睹一下周恩来的风采。整个新德里万人空巷，市民都拥到车队必经的大道上载歌载舞，祈祷祝福。可如今呢？他不能不感到愧疚。多少年来，大度和好客曾经是他自诩的本性啊！

周恩来走过来了，脸庞比往昔清瘦了不少，鬓角也添了几根华发，只是握手还是那样有力，拥抱仍是那样真诚，这倒使尼赫鲁心头的窘困释然了不少。

“周总理，还认识我吗？”一个身穿西服裙，肩挎照相机的年青女记者双手紧握着周恩来的手，用流利的中国话问。

“《泰晤士报》的记者，大名鼎鼎的韦尔娜小姐，我怎么会忘呢，记得嘛，咱们碰过杯，喝的是茅台酒，不过，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杯子里可掺了不少矿泉水噢！”周围的外交使官都笑了起来，不懂华语的赶紧问翻译，“总理先生的话很可笑吗？”韦尔娜更是乐不可支，一对碧蓝色的眸子里溢出了泪水。

稍顷，韦尔娜问：“周总理，您的和平使命能完成吗？”周恩来两手一张，做了个西方人惯用的无奈的手势说：“尽力而为吧，办这样的事情，一个诚意是不够的，需要两个……”欢迎仪式进行了25分钟，便匆匆结束了。

车队沿着空荡荡的大街，驶向中国代表团下榻的总统府。

一路上、尼赫鲁提心吊胆，生怕有哪个歹徒端着冲锋枪，从荒僻的巷道里杀出来。周恩来来访前夕，各反对党大喊乱叫，要组织示威游行，举办“不投降周”集会。自己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并且保证不让出一寸土地，才把这股疯潮强压下去，可面对着被边界纠纷刺激起来的群情激愤的国民，谁又敢保证不出意外呢？直到周恩来和陈毅乘坐的黑色道奇轿车平安驶进总统府时，尼赫鲁才长舒了一口大气，顿觉四肢酸软，靠在座背上，竟起不来了。

（2）新德里，中国总理舌战群儒。

新德里，1960年4月25日晚7时30分，周恩来将举行记者招待会。

消息传来，顿时轰动了新德里的记者。

各外国领事馆及新闻台社都知道，在此之前周恩来曾提议和尼赫鲁共同举行记者招待会，这个意见遭到了印方的拒绝。为了使各国外交使团和舆论界对中国立场有进一步的理解，周恩来才决定单方面行动。

新德里的新闻记者向来以敢于藐视权威和大人物，以尖锐的诘问和发难使别人难圆其说而引为自豪。如今，居然碰上一个敢在狮子嘴上捋唇毛的。

晚7时一到，总统府圆柱厅里已是人头攒动、空无一席了。记者们静候周恩来登场。

经受过风浪和战火考验的周恩来阅历惊人的丰富，他似乎已经预见到招待会上可能出现的尴尬场面，为了取得先声夺人的效果，平息一下有些记者有目的的愤怒火气。人一到齐，工作人员便开始散发早打印好的周恩来的声明，上面扼要简洁地阐述了中国的立场：边界从未划定，问题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在谈判未达成协议之前，双方应维持边界现状，不应片面行动，更

不允许使用武力来改变这种状况。最后，周恩来将双方的共同点或接近点归纳为六条，一并印在显赫的位置上。

晚 7 时 20 分，周恩来、陈毅带领随行人员走近圆柱厅的边门。韦尔娜突然闪了出来，惶急地说：“总理先生，有帮人准备不顾外交礼仪向您发难，您可要小心啊！”周恩来微微点头，从容不迫他说：“谢谢您，韦尔娜小姐。”说完继续前行。

韦尔娜又迅疾地抢到前边，语音凄颤地说：“周，这不是招待会，是射击场，您是唯一的靶子，上千只枪口都瞄准了你，你不能进去。”周恩来严肃了，轻轻抚了抚韦尔娜瘦削的肩膀。“放心吧，新德里的子弹打不倒我。”韦尔娜没有危言耸听。的确，印度新闻托拉斯的一伙人，预先抢占了有利位置，准备在周恩来一走进大厅时，就狂呼口号，给他一个下马威。可惜得是，他们的注意力被手中的周恩来的声明吸引住了。以至周恩来跨进大厅，踏着红地毯，缓缓走上靠前排居中的讲台时，才有一个尖细的声音喊：“中国佬，滚出去！”但这阵小小的骚动还没等掀起大浪，就被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淹没了。

周恩来用睿亮的双目扫视了一下会场，然后开始了 45 分钟的讲演，他的语音沉稳，略带沙哑，却极富魅力。台下的记者在笔记本上“唰唰”地记录着。周恩来再次重申了中国的立场。

最后情真意切他说：“中国、印度，都有着 5000 千年的古老文明，印度的圣河佛殿、经典颂文，曾经给中华民族的成长注入过丰厚的营养。中国的四大发明，特别是造纸术和火药，也为印度的经济、文化的繁荣做过贡献。几千年来，我们一直和平相处，休养生息，在历史的长河中，中、印之间从未发生过真正的战争。我希望，我们这一代人，即使遇到再大的问题，也应坐下来，通过协商、谈判解决。切不可对上辜负了列祖列宗的遗德，对下贻害后世子孙。”……周恩来的演讲刚一结束，圆柱厅里便爆起掌声的大潮，韦尔娜拍着巴掌，兴奋地站了起来。数百名记者受到感染，也纷纷离座站起来。

在新德里召开记者招待会，是一种令人畏惧的煎熬。印度内政部长夏斯特里在一次招待会上曾被质问得面红耳赤，当场出丑。财政部长德赛竟在招待会中途被嘘下讲台。这一点各国的领导人和政治家都有耳闻。但是，令人无可争辩的是，自从周恩来跨进这座圆柱厅的第一步起，他就控制了整个会场，那些准备发难、炮轰的记者们，居然随着周恩来的一举手、一投足，语音的抑扬起伏，老老实实地聆听了 45 分钟，这确实令人不可思议。

周恩来端起茶杯，侧身呷了一口茶。他从不正对听众喝水，事无巨细，都处处体现出对他人的尊重，这就是周恩来的魅力之所在。

周恩来转回身，清了清喉咙，说：“有位朋友告诉我，在座的有不少是战神鸠摩罗的子孙，准备好了炮弹轰击我。我觉得，心里有火、有气，就应该发出来，我愿意承受。因为，我是你们的朋友。”这一下，会场居然沉静下来，出奇的静。终于，有一个留大胡子的人站起来说：“我是印度新闻托拉斯的记者，请问周恩来先生，中印边界的领土划分已经是十分明确的了，难道还有什么必要再进行谈判，再重新划分吗？”周恩来耐心地回答：“如果你对中印边界的百年历史多做些研究，并且能真诚地倾听一下中国政府的呼声，我想，你是不会提出这种问题的。”这位印度人刚坐下，身旁一位欧洲人站了起来：“我是英国路透社记者詹姆斯，总理先生口口声声要靠谈判

来解决问题，请问，原本属于别人的东西，你认为有什么资格和必要去讨论这东西的归属吗？”周恩来严肃他说：“詹姆斯先生，在国与国的领土纠纷中，你刚才的比喻显然不十分恰当，我愿就这个比喻再做些说明，如果一个强盗夺走了别人的东西，那么原物的主人不该向强盗讨还吗？”詹姆斯气急败坏他说：“你……你敢说印度是强盗。”周恩来但然他说：“强盗，有，但不是印度，而是英国的殖民政策。中国和印度是朋友，而且应该永远是朋友。”后排一位记者拍了拍詹姆斯的肩膀，站起来问：“总理先生，你们不打招呼，在有争议的地区擅自修了一条公路，这难道也是在表示和平、尊重和友谊吗？”台下响起得意的嘘声、口哨声。

周恩来诚恳地答：“不错，我们是在喀喇昆仑山侧修了一条公路。这就是青藏公路，是为了改善新疆、西藏地区的交通困难状况而修筑的，其中有几段因山脉阻隔，穿越了阿克赛钦地区的一角。我们原本以为，这是众所周知的中国领土。后来印度政府提出了抗议，我们愿意就此问题进行协商解决。如果这不算和平、尊重、友谊的话。那么印度政府越过传统的边界，在有争议地区建立军事据点，武装巡逻，不但不打招呼，而且逐步推进，动枪动炮，这又算是什么呢？如果说彼此都伤害了感情的话，我们中国也仅仅是因为一条用于和平建设的公路。”台下的记者们交头接耳、窃窃私语，周恩来的雄辩虽早有耳闻，但今日才是第一次领教。

“我是印度独立报记者托姆拉。总理先生，你不认为，中印之间的领土争端，愈演愈烈，直到今天动枪死人的境地，完全是你们自恃大国身份，对印度横行侵犯的结果吗？”周恩来冷峻他说：“不对。缅甸、不丹、尼泊尔都是小国，也都和我们有着麦克马洪线的困扰，可为什么我们能和平地达成边界协议呢？事物的逻辑并不是当一个大国与一个小国发生纠纷的时候，大国就必然是无理的、蛮横的。如果这样的逻辑成立，那么印度同巴基斯坦、锡金的边界纠纷，也是大国欺侮小国吗？事实上，印度无论从哪方面看，都不是一个小国，她的综合国力，她的人口，她的国际地位和威望，尤其她引以骄傲的几千年的古代文明，一丝一毫也不比中国差，这怎么说得上是大国对小国的侵犯呢？”托姆拉激怒地涨红了脸，晃动着粗短的胳膊，扯着嗓子喊：“不管怎么说，你们是侵略者，是你们伤害了印度的感情，你们要滚出去……”周恩来的面孔异常冷峻，语气却异乎寻常的平稳：“如果说到伤害感情，我想反问一句，究竟是谁伤害了谁？去年我国在平定西藏叛乱时，明知有些人背后搞鬼，我们并没有责怪，而是在采取军事行动前，电告贵政府，保证对印度侨民提供保护。达赖喇嘛逃往贵国避难，中国政府根据‘对政治犯可以给予保护’的国际惯例，予以了宽容。在边界纠纷中，中国军队没有前进一步，连例行的边界巡逻也停止了。我们伤害谁了吗？可是印度政府呢？面对领土纠纷拒不谈判，至今不断派出军队在我领土内巡逻。多次开枪，打死打伤我边防军民。去年，在我国处理自己的内政西藏问题时，各城市都举行了大规模的反华游行，声援西藏叛乱集团。更令人无法容忍的是，去年4月，在贵国孟买，政府怂恿一批歹徒，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肖像贴在中国总领事馆的墙上，往肖像上抛掷变质鸡蛋、烂西红柿和砖瓦泥块。请问，这是什么？这不仅是伤害了我们的感情，而且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侮辱。”托姆拉惶急地辩解道：“那是一小部分人，绝不能代表印度政府……”坐在周恩来身侧的外交部长陈毅猛然站了起来，抓起话筒怒不可遏地喊道：“够了，不要狡辩了，我只说一句，中国是受到损害了，中国是受到了损害了，

毛泽东主席有句话：“人个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谓予不信，皇天可鉴。”……大厅里的人被陈毅的话全部震慑住了，记者们你看看我，我瞅瞅你，苦笑着摇头，尴尬地喘气。

在座的每个人都明白，陈毅不光是外交部长，而且是身经百战的元帅。

周恩来接过话筒说：“请原谅，我的外交部是一时愤慨所致，并非威言恫吓。我想最后再说一句，中印两国都曾是帝国主义的殖民地，饱受过帝国主义列强的欺凌和蹂躏。中印两国应该友好、和睦。自家的事好商量，绝不能让边界纠纷再继续扩大，以致做出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来。”韦尔娜站起来，极严肃庄重地说：“我还有一个问题，总理先生能够坦诚相告吗？”周恩来扬扬手说：“我想，我会尽其所能的回答你。”“那好，据我所知，您今年已经62岁了，比我的父亲还要大8岁，可是，你为什么仍然那么年青、美俊，像个小伙子，能回答吗？”全场上静默有顷，猛然炸锅般爆出一阵畅快的大笑，将刚才剑拔弩张的火药味驱赶得纤缕不存。

与刚才舌战群儒，大展辩才的情形相左，此时的周恩来，倒真有些腼腆了。他望了望身旁忍俊不禁的陈毅，又摊了摊两手，嗫嚅着说：“这样的问题，我可以不回答吗？”“不行。”这两个字，居然是上千名记者用不同语言异口同声发出的轰鸣。

周恩来搓了搓两手，说：“好，我回答，我只是按照东方人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进行生活的……我……”周恩来的话音未落，台下的掌声、叫好声犹如天边滚过的巨雷，上千名记者全部站起来，跺着脚，拍着巴掌，喉咙里宣泄着各种代表欢乐和赞赏的音符。

这浑杂的持续长达7分钟的雷声里，竟然包括刚才那些曾向周恩来发难的人。

然而，周恩来的和平祈求落空了。

(3)“里窝那”进攻计划出笼。

1962年10月1日，正逢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13周年大庆。当首都北京的夜空鸣响着隆隆礼炮，绽开着五彩缤纷的花朵的时候，印度首都新德里国防部作战厅里，正在进行着决定印度命运的作战会议，主持会议的是印度国防部长梅农。参加会议的有击军总参谋长塔帕尔上将，前陆军参谋长蒂迈雅上将，参谋局长考尔中将，东部战区司令莱普森中将，第33军军长乌姆拉欧·辛格中将，第4师师长尼兰詹·普拉沙德少将，参谋部助理迪隆少将，参谋部作战处长帕利特准将；此外，还有3位文职官员，内阁秘书凯拉，国防部秘书克萨林，情报局局长马立克。

身为文职官员的梅农，虽然担当着国防部长的重任，但当他面对着一个个肩扛金花、绶带斜挂的将领时，总有一种情不自禁的压迫感。为了保持自己的尊严，他的看家法宝便是斥责、嘲笑他们。因此，属下的将领对他多有不满，可又不得不感激他，因为他用频繁的调动不断晋升他们的军衔，同时又大幅度地提高了军官、特别是将军们的薪金。他在任期间，军队的武器装备也得到了很好的改善，尤其是他同尼赫鲁之间极亲密的私人关系，没有一个军官不对此感到畏惧。

梅农首先做了简短的开场白后，说：“尼赫鲁总理已前往伦敦参加英联邦总理会议，临行时授权让我制定一个将中国军队清除出去的作战计划，我已经指令总参谋部拟定了，这就是“里窝那”作战计划，下面就请帕利特准将宣读作战计划的文本。”帕利特准将摊开文件夹，说：“取名‘里窝那’并

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这是一个地名，意大利的一个港口，二次大战时，总参谋长曾在那儿作过战，仅此而已。”接着，他宣讲了作战的任务和要点，在东部，要占领塔格拉山脊，将中国军队赶出塔格拉山；在西部，要拔除中国军队的 21 个据点，占领全部有争议的阿克赛钦地区。为了加强东部的军事力量，拟在最快时间内组建特种部队第 4 军，考尔中将亲赴东北边境指挥，并兼任第 4 军军长。进攻的准备，要在 10 月 10 日前完成。

帕利特准将刚刚讲完，蒂迈雅上将就高声喊叫起来：“不可能，这简直是天方夜谭，你拿什么去组建第 4 军？凭什么同中国军队打仗？怎样在 10 月 10 日前完成进攻准备？你知道那儿的地形地貌吗？全是 1 万 4 千英尺以上的连绵不绝的大山，在地图上量出 3 个小时的行军距离，实际要走上 3 天。后勤保障全部要靠空投，可是，那儿连一块空投的平地都找不到，制定这种计划，不是疯子，就是傻瓜。”考尔中将敲了敲桌面，严肃他说：“蒂迈雅将军，请你放尊重些，这份作战计划，是我和塔帕尔上将一块制定的，你尽可以批评、修正，但决不许可诋毁，更不能全盘否定。要知道，印度的每个人都不耐烦了，指责我们为什么不把中国人赶出去。许多报纸骂我们是胆小鬼，不能担负起保卫祖国的重任，做为一个军人，你能忍受吗？再不行动，政府就要垮台，我们都要被送上绞刑架，你懂吗？”蒂迈雅冷笑连连他说：“如果这个计划出自别人之手，或许还有探讨的可能，可是你一参与，情况就完全不同了，短短的 10 年间，你从一个少校升到中将，坐上了参谋局长的宝座，你算什么，你真枪实弹的指挥过一次战斗吗？还不是凭着你那张漂亮的脸蛋，巧舌如簧的嘴。为了你的提升，我曾经辞职过一次，很可惜，没有挡住你亨通直上的官运。这一次，我豁上一切不要，也要阻止你，什么‘里窝那’完全是几张烂纸，你也绝不能出任第 4 军军长。”考尔尖利地说：“你最好放明白些，这是作战会议，不是可以随意进行人身攻击的议会，我的任命书是尼赫鲁总理临行前亲自签署的，为此你尽可能再辞职一次，不过这回，不会有人再劝你收回了。”这一刀深深刺穿了蒂迈雅的心脏。两年前考尔由第 4 师少将师长升任参谋局长职务时，蒂迈雅曾极力反对，认为他好夸大言辞，极富幻想，又无实际作战经验，担任仅次于参谋总长的职务，确实不能胜任。但尼赫鲁断然否决了他的意见，直接签署了任命书，为此，蒂迈雅一气之下，请求辞职。如果蒂迈雅坚持到底的话，那么军队内任人唯亲的裙带路线真相或许会大白于天下。然而，蒂迈雅在尼赫鲁一番恳切言辞的劝导下，收回了辞呈，尼赫鲁便给了他一个闲职。

新闻界为此做了一番沸沸扬扬的报道，责怪他的“儿童游戏式的”小孩子脾气。蒂迈雅将军受尽了凌辱。从此，便也雄风殆尽、闭门不出了。

但是，做为一个戎马一生的老军人，他始终关注着中印边界的军事纠纷、当看到尼赫鲁推行考尔的前进政策，不断往前推进，修建了一个个军事哨所时，他感到既可悲又可笑。这只是一种小孩子捋大人胡须游戏，一旦大人被扯痛了，便会给一巴掌。为此，他多次给尼赫鲁写信阐明这种做法的愚蠢可笑，希望他能下令收回军队，聚成铁拳，在关键方面给中国军队以致命的打击。然而，尼赫鲁却宠信梅农和考尔，默许他们继续往前走。第一步是把哨所建到中国哨所前面，看到对方没有动作，第二步又把哨所推进到中国哨所的后面，切断中国哨所与主阵地联系。

现在他们要推进第三步了，把中国士兵哨所拔掉赶出去。这可是潜藏着最大危机的一步。蒂迈雅根据一生的作战经验认为：前两步中国忍让了，

第三步绝不会忍让。积蓄已久的中国军队不但会打败他们的进攻，而且会趁势反击过来，消灭全部印方边境部队，甚至会趁势追击，攻占新德里。这是决定国家命运的时刻，他不能再沉默了。他自报奋勇参加了这次作战会议，又挺身而出陈述了一大通理由，然而，他除了从辛格中将那饱含同情的目光中得到些许安慰外，其它的都是漠然的冷眼和嘴角的蔑笑。他绝望了，喜马拉雅山不只是美丽的雪山女神，她还有两个恶魔的化身，一个是难近母，一个是时母，她们不仅相貌狰狞；而且性情残酷，全印度的婆罗多将毁在这两个恶魔的手中。不知是哪根神经的灵感，使他忽然想起长篇史诗《摩河婆罗多》中的这个传说。他两眼含春盈眶的泪水，缓缓站了起来，颤抖无助的手，无意间碰翻了茶杯，茶水溅到了考尔笔挺的军服上。

考尔惊呼一声，接着暴怒地搽了蒂迈雅一把，险些把老头子推个趑趄，愤愤他说：“老精怪，早下台了，还罗嗦什么，不知羞耻。”蒂迈雅仿佛没有听到，呻吟着说：“部长先生，快从梦中醒来吧！中国军队并非不堪一击，也不会永不还手。想想蒋介石的八百万军队，想想朝鲜战场上的美八军，想想刚刚被镇压的西藏军队吧！我不想说，可我不能不说——中国军队要胜过我们百倍。”这最后一句，激怒了在座的全体高级将领。

顿时，椭圆形的会桌上响起一片责骂声：“你不配当军人！”“浑蛋！”“卖国贼！”“滚出去！”“滚！”蒂迈雅抱着最后一线希望，恳怜地望着梅农。

梅农只是眨动了一下厚眼皮，连头也未抬，挥挥手说：“你走吧，你确实老了。”蒂迈雅用手背抹了抹老泪横流的脸，挪着颤巍巍的步伐，弯着沉重的腰脊，向外离去。

临近门口时，他忽然转过身，威风凛凛地大喝了一声：“狗崽子们，你们将一个个被枪毙。”随着重重的一声门响，作战厅里沉寂下来，许久没有发言，蒂迈雅的预言，仿佛将在座的人心都冻僵了，凝固了，失去了灵动的活力。

许久，这沉默都未被打破。

忽然，作战厅里响起一个悠长、平稳，时而还有起伏变化的鼾声。

国防部长梅农，旁若无人的伏在桌上睡着了。

这位动过一次脑手术的老人，尽管有爱打瞌睡的毛病，但是今天的会议，他似乎不该睡着，这是决定印度命运的会议，也是决定他命运的一个夜晚。

当两个格斗的巨人，拔出腰间锋利的剑，准备向对方的要害一刀捅去的时候，他却睡着了。

暴怒而又狂傲的考尔对着梅农的耳朵，大喊了一声：“继续讨论‘里窝那’计划。”（4）艰难的印军先遣部队。

这是什么声音，低沉、暗哑、粗重而又恐悸。

夜幕里，一个个“小甲虫”正沿着雪山女神垂在前胸的手臂颤颤的蠕动。她猜悟到了，这是坦克，当今尘世的杀人武器，它有钢铁的外衣，坚硬过铸塑自己躯体的岩石；它能喷射致人死命的炸弹，将现世的万灵之长送往另一个世界。

它后面跟着一列列的士兵，都是吮着自己乳汁长大的生灵。他们背着杀人的凶器，正兴高采烈的走过来。好像不知道等待他们的是什么？崎岖的山路，能变得再陡峭、再狭窄些吗？让他们走得慢些、再慢些。

天庭飘落的雪花，能洒得浓些、再浓些吗？让他们被热血激昏的头脑

清凉下来。他们还在急急地行走。

知道吗，你们是在去赶赴一场生死宴会，结局只有一个——杀人或被杀。

喜马拉雅女神睁开穷通千年的慧眼，看到了割断的血管流淌着血的浓浆，洞穿的胸膛喷溅着血的雨滴，进飞的弹片撕裂开血的肉体，……晶莹的雪岭被污血浸塌了，洁白的羽衣被浓烟炙黑了，无数的死之幽灵在空中飘荡、浮游，苦痛的呻吟和怨毒的诅咒充斥宇宙。

死神在颠狂地舞蹈。

两边都是可爱的子民，该庇护哪一方呢？女神的慧眼酸楚地合上了。

也许，在法轮上，这是一场无可避免的劫难。

“报告旅长，先遣支队报告，因天黑路陡，加上降雪，部队无法行进，可否就地宿营？报告完毕，上尉参谋尼兰詹。”达尔维准将走下吉普车，仰头看看黑幽幽的天幕，又抬腕看看手表，表盘上的绿色莹光指针告诉他，已经凌晨一点了。

“通知部队，安排好岗哨，就地宿营，何时开进，等待命令。”“是。”尼兰詹行了个军礼，转身向前跑去。

“走，跟我到前边看看。”达尔维披上大衣，对两个卫兵说。天寒、军队下发的羊皮大衣太重、太厚，达尔维不愿穿，便跑了几家皮毛店，买了块貂皮，又连夜赶制出来。

如今抛下娇妻爱子，露宿在这荒山僻野里，心中自有无法倾诉的苦涩。

沿途，士兵已在架设帐篷，虽然忙碌，却没有声响，显见是一支训练有素的部队。

达尔维走到部队最前面。飞雪中隐约可见一道险峻的山梁。路边，两个士兵在低声痛苦的呻吟。

“怎么回事？”达尔维关切地问。

“报告旅长，他们从山坡上摔下来，扭伤了腿。”旁边一个军上长身份的人报告。

一听说是旅长，两个伤兵坚持着要站起来。

达尔维按住他们的肩膀，蹲下身子，轻声问：“伤得重吗？”一个士兵说：“报告旅长，我的脚踝扭了。”达尔维从兜里掏出微型手电筒，仔细看了看，脚踝肿得很粗，紫红。单薄的胶鞋扔在一边。

另一个士兵说：“我和他一块滚下来了，腿扭伤了，不能动。”达尔维撸起士兵的裤腿，腿部有好几块擦伤的血渍。

这是两个年青的士兵，柔软的唇毛还不能叫做胡须。因穿着单薄，躯体在寒风里瑟瑟发抖。

达尔维站起来，对军士长说：“帐篷搭好后，马上把他们抬进去，天亮送旅部救护所。”

今夜取消灯火管制，可以燃火取暖。”“是。”军士长惊喜地喊。

“旅长，师部来电。”尼兰詹又跑过来报告。

“念。”“达尔维准将，你部是否按预定时间开进至指定位置，请速回电。”“预定时间？指定位置？见他妈的鬼。”回到旅部的帐篷，达尔维拿起话筒：“接师部，我直接和师长通话。”报务员抬头望望满面怒气的旅长，迟疑地思忖着是否该提醒旅长，通话要用密语。

“普拉沙德少将吗？我是达尔维准将，目前，我们被困在4300高地北侧，

夜暗路滑，无法前进，我已命令部队宿营……”“什么，到达旺？见鬼，到达旺还有 80 公里，眼下这个山梁我就翻不过去，坡太陡，有 65 度……”……“普拉沙德将军，再提醒你一遍。我们不能听参谋部那些浑蛋的话，尤其考尔，那是个蠢驴，傻瓜。什么‘前进政策’到前面建那么多分散的据点干什么？”……“把中国人赶出去？将军，你还在做梦，光 20 个据点的后勤保障我就应付不了。吃、喝、穿、用，全要靠人背，这儿没有空投场，我不能让我们旅的官兵都成挑夫。”……“克服困难？谁都会喊，你来试试。雪地里，我的士兵穿着单衣，他们每人只有一床毛毯，马上大雪封山了，皮鞋也没有。即便把他们赶上山去，也会风冻成肉干。”……“什么？让考尔来，我拒不执行。”达尔维愤怒地摔掉话筒。

尼兰詹站在达尔维面前，鼓足勇气说：“旅长，我不许你这样辱骂考尔将军。”“噢！？”达尔维坐在折叠椅上，点着一支雪茄，上下打量了尼兰詹几眼。

“考尔将军是我的救命恩人。”“什么时候？”“4 年前。”“什么地方？”“东边，埃尔佛尔峰。”“怎么回事？”“4 年前，我渡假时，和两个朋友一块去爬埃尔佛尔峰，恰巧碰上雪崩。我们掉进了峡谷，两个朋友都摔死了。我背的帆布袋救了我，我被挂在一根突出的树杈上。当时虽没死，可是绝望了。那时正是封山的季节，不会有人到山里来的。可是出了奇迹，考尔将军那时任第 4 师师长，封山后去视察高山哨所，恰巧路过那儿。我的呼救声被他听到了。他把尼龙绳固定在汽车上，坠下冰川，将我背了出来。”达尔维站起来，抽出嘴里的雪前，踱着步说：“嗯，很侥幸，很精彩，像小说里的故事。不过，你要知道，一个优秀的登山运动员；不一定是个好将军。”“可他是为了国家啊！把中国人赶走不对吗？”“对，对极了，可愿望是一回事，现实是另一回事，他的前进政策，制定的根据是中国不会反击。凭这一点，他就不配做军人。”“可我觉得他很勇敢，很果断……很英明，也很漂亮。”“你被恩情蒙住了眼，你没看透他。他从没打过仗，却在指挥一场战争。这是印度军人的悲哀。”达尔维脱下大衣，躺到行军床上，望望神情苦痛的尼兰詹，说：“好了，我的参谋，你尽可以膜拜他，可我不，他没救过我……”“砰，砰”两声锐利的枪声，划破了雪山的暗夜。

达尔维猛然坐起，惊问：“怎么回事？”一个军官跑进来报告说：“廓尔喀营抓到了几个藏民，我们怀疑是中国军队的侦察兵，藏民说是做毛皮生意的。双方动了手。”达尔维漫不经心地问：“解决了吗？”军官说：“都绑起来了，正在审问。”“唔，有什么情况及时报告。”“是，他们带了不少毛皮，今夜是不是可以借用一下。”“可以。”达尔维将大衣盖在身上。

“我的参谋，我可要睡了。但愿你的救命恩人这次别把你送给死神。祝你做个好梦。”(5) 24 把刺刀对准中国士兵的胸膛。

在喜马拉雅山脉的千百条峡谷中，克节朗山谷也许是最美丽的一个了。

每年春夏，冰山上的积雪融化，顺着脊坡流下来，汇成清澈奔腾的克节朗河。受南季风的影响，河边草木葱茂，百鸟啁啾。沁绿的草坪上，几十种野花，随着气候的演变，霓虹灯般调换着绚丽的色彩。逗引得千姿百态的蝴蝶，在这儿翩跹飞舞。

这是一个未染红尘的神话世界。

此刻，中国士兵吴元明跨过克节朗河的择绕桥，来到桥西哨位上，正守护着这块原始的圣地。

他今年 22 岁，四川江津县人，在这儿站岗已经一年多了。

他由衷地喜爱这个地方。

这儿莫不是家乡的再造吧！瞧，那涂满绿彩的石壁，不就是家乡的翠屏山嘛？哨位旁那片青葱的毛竹；正是儿时和小伙伴们捉迷藏的游乐场呀！

还有那熟悉的长长短短的鸣唱；还有那闻惯了的草木泥土的青涩的气息。

唯一不同的是，这儿的山大都戴着顶白帽子，一年四季总也不摘。指导员说，那白绿相间它不热吗？每年暑季，吴元明一下岗，就爱脱掉衣服，浸到克节郎河里。这水冰冷、清澈，一会儿就能凉透肺腑。茶道上说：雪水沏茶是上上品，用克节朗河的水冲茶，一定是世界上最最好的。自己在里面洗澡，是不是太可惜了。

这些天，他不那么悠闲了，印军的飞机，时常在头上转，树林里，也不时闪露出一张张长满大胡子的脸。前天，他们居然围着桥头，修了 3 个地堡。他们要抢占这块地方吗？吴元明的心缩紧了。

在这儿站岗，无疑是站在狼群之中了。

他不怕，他是共产党员了。再说，后边有主阵地，翠屏山后面（他愿意这样叫），家乡的父老姐妹都在看着他。

果然，上岗不一会儿，印军从一个个地堡里钻出来了，摆着手、叫喊、端起枪做射击状。可是吴元明不理睬他们。

一个布巾缠头，黑纱裹须的军官，带着 30 多名士兵，端着机枪、冲锋枪和上了刺刀的步枪，一步步逼了过来。

20 米、10 米、6 米。

他们想干什么？吴元明心里有点发毛，端冲锋枪的手也在微微颤抖。

‘不能退，一步不能退，这是哨位，祖国的领土，死也不能退。打死我可以，我这板机一搂，就是倒了，也能赚他们十个八个。可千万不能当俘虏。不能给家乡人丢脸。

印军停住了，印军官不知嘀咕了几句什么，一个铁塔般的大个头士兵，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走到他跟前。刺刀的尖刃离吴元明的胸膛只有一厘米。

这家伙个头太大了。吴元明只好把冲锋枪口上移，对准大个子兵的胸膛，紧握板机的手里满是汗水。

双方的目光在对峙。

四只眼睛，便是四柄利剑，在突刺、撞击、劈杀……这是胆的角斗；这是力的抗衡；这是信仰与荣誉的竞赛。

1 分钟、2 分钟、3 分钟……大个子兵的目光由狰狞、凶厉，逐渐变得犹疑、怯懦了，目光的正锋，避开了直接的对刺，缓缓下移，最后凝注在黑洞洞的枪口和吴元明紧扣板机的食指上。

吴元明的心坦然了，嘴角浮起一层蔑笑。

敌人的意志垮了。

果然，大个子兵持枪的双手开始颤抖，渐渐地，门板样宽厚的躯体竟打摆子般哆嗦起来。

上来两个印度兵，把他架了下去。他已经不会走了。

印军官恼羞成怒，一挥手，又上来一个。

这一个块头也不小，谁知更是个草包，刚上来胳膊就发麻，只好由双手端枪变成单臂挟枪，两手轮替着甩来甩去。

于是换上了第 3 个、第 4 个、第 5 个……吴元明如钢浇铁铸的一般，一动不动。

印军官亲自出马了。

后面 3 艇轻枪张开支架，抬起枪托。

20 多个士兵“哗啦”围了上来，将吴元明困在中心。

刺刀一层层、一叠叠的布满脸盘、胸膛、肩胛、后背……有一把刺刀竟对准他的眸子。

阳光下，钢刺的光波晃动得难以睁眼，眼睫毛都感觉得到森森的寒气。

总共 24 把刺刀。

24 把刀，犹如 24 颗恶狼的撩牙，随着一声呜咽，刹时便会把他撕咬得粉碎。

吴元明右手的板机扣得越紧了。

“不能开枪。”“绝不能先放第一枪。”“这是中央军委、毛主席的命令。”吴元明昂起头来，泰然地望着远处的雪山，飘绕的白云。

他觉得，自己就是翠屏山。

不，绿色的衣领是“雪线”，他是喜马拉雅山。

在“雪线”之上，还有一颗镶着国徽的“太阳”。

（6）择绕桥印军再次玩火。

天早透黑了，山林的夜，出奇的静。只有克节朗河水永不疲倦地弹奏着舒缓的小夜曲。

桥面坑道里，潜伏着 3 名中国士兵。

这是我边防团派出的前卫警戒哨。

吴元明半蹲在坑道里，一边咀嚼着苦涩的草根，一边观察着周围的敌情。

他清楚地记得上岗前连长刘道臣的话。

“根据情报，敌人这几天可能有行动。你们一定要提高警惕。”“择绕桥是主要的通道，要保护好，桥西阵地不能丢。”“敌人如果向你们开枪，你们可以还击。这是昨天军区张司令员来视察时下达的最新命令。今年以来，我们已经有 49 名战友倒在他们罪恶的枪口下，这笔血债一定要他们偿还。

什么时候反击，听命令。”对面树林里发出一阵唏唏嘘嗦的声响。

吴元明赶紧捅了捅身边的沈定湖和王确云。

今几个敌人要动真的了。

果然，树林里出现了几个黑瞎子般的人影，慢慢向白天的哨位逼近。

哨位上有两个穿军装的草人，是吴元明和战友们扎的，晚上立在那儿，和真的没啥两样。

敌人上当了，吴元明慢慢探出枪口，心里忍不住想笑。

“哒哒，”两声枪响。

印军打响了第一枪。

吴元明冲着响枪的地方“嘟嘟”就是一梭子。

只听对面“哎哟”了一声。山林又恢复了沉寂。

沈定湖贴着耳朵问：“敌人撤了吗？”吴元明悄声说：“只敲掉一个，他们肯定还要搞鬼。”“轰隆！”一声爆炸。两个草人倒了。

敌人以为枪没打准，扔出了两颗手榴弹。

沈定湖正要还击，吴元明一把拉住他，咬着耳朵说：“别急，等他们露

脸。”果然，几个印军见没动静，站了起来，晃了晃手电筒，要欣赏一下刚才的战果。

“打！”吴元明的枪口首先喷出了一溜火舌。

沈定湖、王确云的冲锋枪也像刮风一般响了起来。

敌人像受了惊的兔子，回头便跑。

晚了，愤怒的子弹雨泼般倾泻过来。

枪声停了，一个受伤的敌人还在高一声低一声的痛苦地喊叫着，他大概是刚才那伙人中唯一的幸存者了。

敌人被激怒了，3个地堡里的轻、重机枪，一齐向他们这个小小的阵地倾泻着子弹，堑壕前的泥土、石块被打得四飞迸溅。

突然，一颗手榴弹落到了堑壕里，尾部“嘶嘶”冒着青烟。

沈定湖手急眼快，抓住手榴弹又扔了回去。

“轰”的一声，手榴弹在敌人的头顶爆炸了。

吴元明高兴地喊起来：“打得好，就这样干。”敌人的地堡离战士们的堑壕太近了，只有十几米，还不如篮球架到中线的距离远，手榴弹从拉弦到爆炸大约需要5秒钟，所以扔过来的手榴弹大都还没炸。

吴元明和战友们一气扔回去18个手榴弹，他们每人携带着4颗手榴弹都还没舍得用呢！”忽听背后一声响，又是敌人扔过来的手榴弹。

吴元明慌忙去摸，咦，怎么不见冒烟？终于他摸到了，是一块石头。

“咚，”又是一声响，沈定湖赶紧摸，摸到一截松树根。

敌人没手榴弹了，就用这些东西乱扔起来。

3个战士身上每人都挨了几下子。

什么军队什么板眼，硬是一群流氓。

印军开始打炮了。炮弹掠着树梢，吱吱怪叫着落下来，把堑壕前后炸得烟雾弥漫，后边的主阵地上也是一片火海。

吴元明忽然明白了，大声说：“小沈、小王，敌人想攻占择绕桥，绝不能让他们的阴谋得逞。”3个人分了工，一人封锁一个地堡。

地堡里的敌人一露头，一梭子子弹马上就飞过去。

桥西这个小阵地成了敌人眼中的芒刺，他们开始实施集中轰炸了。

炮弹雨点般倾泻下来，堑壕早已夷成平地。

3个战士的耳朵都被爆炸的巨响震得流血。浓烈的黑烟和滚滚的热浪呛得他们喘不过气。

又是一声巨响，吴元明只觉得右腿一颤，便酸麻的失去了知觉，他知道自己受伤了，迅速抽下腰带，将腿根部狠狠扎住。

急救包和衣服都被烧焦了，像晒干的红薯干贴在身上，一动，就扑束束地掉下来。

炮声停了。

硝烟散了。

择绕桥还在。

阵地没有丢。

吴元明抹了把脸上的灰土。两个战友从土里钻出来，顽皮地向他眨眨眼睛。

月亮露出了皎洁的脸。

山林恢复了先前的宁静。

克节朗河水还在唱着那首永不厌倦的歌。

3个战士却听不到了。

永远听不到了。

他们的耳膜被震裂了。

天放亮了。

印军地堡枪眼里，伸出一个黑糊糊的布包，布包绑在一根木棒的顶端。布包上插着一根引信，正“嘶嘶”冒着蓝色的火花。敌人要炸桥，把3个战士困在桥西。

吴元明欲扑上去，可是猛一使劲，没站起来，这才意识到自己受伤了。他猛拍了小王一掌。

小王会意地纵身跃出堑壕，扑向药包。

吴元明和小沈的冲锋枪，同时封住两个地堡的枪眼，小王抑住药包，一把扯掉导火索，接着和地堡里的敌人争夺起炸药包来。

敌人抓住木棒用力往里拉，小王挟住药包死劲往外拽。

这种“拔河”比赛简直是战争中的奇观。

小王个头不高，力气也不大，使上全身吃奶的劲，仍然拽不出来。

死神就站在旁边，多延续一秒，清醒过来的敌人就会打死他。

“快放手，”吴元明着急地喊。

他不知道，小王耳朵也听不见。

小王好像已将一切抛置脑后，圆脸憋得紫红，拼上性命也要赢得这场拔河的胜利。

吴元明灵机一动，大喊：“扔手榴弹。”小王听不见，也不理会。

地堡里的敌人吓坏了，慌忙松了手。

小王没防备，一个后仰摔在地上。

炸药包脱手，顺势落到河里。绑炸药包的木棒，一多半竖在河面上。

从此，这木棒就直立在择绕桥下的急流里。

它成了印军越过麦克马洪线，向中国武装进犯的铁证。

如果哪位读者有兴趣，路过择绕桥，尽可以查证一下这木棒的来历。

次日，中国外交部代表声明，强烈抗议印度军队越过麦克马洪线，向驻守在克节朗河择绕桥头的边防哨所进行猛烈的炮击。打死打伤边防连长刘道臣等七人。这是继朗久、空喀山事件后的又一次严重的军事挑衅。中国军队将保留还击的权力，并警告印度政府，“玩火者，必自焚。”印度外交部照会，抗议中国军队越过麦克马洪线，悍然向印度边防哨所进攻，开枪开炮打死官兵13人，伤26人。这是中国政府有意恶化两国关系，妄图霸占印度领土的又一罪行。

两国唇枪舌剑，互不相让，各说各的理。

世界舆论倾向何方呢？“中国军队敢出兵朝鲜，和美国军队硬碰。

太好战了。”西方的记者说。

“中国军队镇压了西藏军队的反抗，嗜武成性。”不了解内情记者说。

“印度是个弱国，怎么敢和社会主义阵营的中国打仗。”不结盟国家的记者说。

一个时间内，中国似乎有些孤立。

他们不是别有用心，便是在凭空猜想。

其实，只要到择绕桥头转一圈，那根直立在克节朗河中的木棒，便会

告诉他们全部真象的。

(7) 中国军队被迫反击。

1962年10月，印度当局错误地估计形势，在大国支持下，向我发动了大规模的武装进攻。

我西藏、新疆边防部队被迫进行自卫还击。

这次自卫还击战，在中印边境东段和西段进行。从1962年10月20日开始，至11月21日基本结束，历时1个月，经历了两个作战阶段。

第一阶段，自10月20日至28日。主要反击方向为克节朗——达旺地区。战前，印军在东段和西段的兵力为1个军部、1个师部、4个旅部、21个步兵营，约22000人。我军投入作战的部队有：西藏边防部队4个多团、新疆边防部队1个多团和昌都、林芝、山南分区的部队。在克节朗方向，我军根据印军布势前重后轻、翼侧暴露、正面宽、纵深浅的特点和地形情况，采取了从两翼开刀，迂回侧后，包围分割，各个歼敌的战法。自20日上午7时30分开始反击至当天下午，便大部歼灭了该地印军。接着，分兵5路，齐头并进，乘胜追击，于24、25日，先后进驻车新桥、达旺等地。在西段地区，我军于20日8时25分对入侵加勒万河谷和红山头之敌发起反击，经1小时战斗，全歼该敌。21日乘胜扩张战果，至23日便全部扫除了班公湖两岸及其以北地区的31个印军据点。随即挥戈南下，反击巴里加斯地区之敌，歼其一部。昌都、林芝、山南分区部队，也于10月20日实施反击，先后拔除敌据点多处，进占易古通、马尼岗、塔克新和哥里西娘等地。第一阶段作战至此便告一段落。

第二阶段，自11月16日至21日，主要反击方向为西山口——邦迪拉地区和瓦弄地区。

战前，印度当局从全国各地调兵遣将，使东西两段总兵力增至3万人。我军投入作战的兵力也增加到13个多团并一部分炮兵。在西山口至邦迪拉方向，我军根据印军布势特点，以部分兵力反击西山口，打敌之头；以部分兵从两翼夹击申隔宗、略马东，击敌背腹；另以部分兵力实施远距离、大纵深的迂回、直插德让宗、邦迪拉之间，断敌退路。这样，便形成了对西山口、德让宗地区之敌的多路向心合击，经1天激战，我军占领西山口、德让宗、申隔宗，歼灭印军一部。19日，占领邦迪拉，并于略马东地区围歼近千名逃敌。

尔后，主力即在西山口至邦迪拉地区展开搜剿，一部分兵力继续向南追击，于21日进占吉莫山口、比里山口和鹰窠山口一线。在瓦弄方向，我军一部于16日晨发起反击，歼敌一部，印军第4军军长和第11旅旅长仓皇逃走。我军在当天下午即占领瓦弄，一部就地搜剿，另一部分兵向南追击，至21日，先后进至萨木维尔和金古底，逼近传统习惯线。在西段地区，我军于11月18日至20日，清除了残存在我境内班公洛地区的6个印军据点，歼灭大部守敌。在东段中部，我军也于11月18日开始反击，先后拔除印军据点16处，歼敌一部。

(8) 毛泽东下令中国军队“退避三舍”。

这是1962年11月中旬。毛泽东独自走出了中南海春藕斋，舞场里的乐曲还在响着，节奏悠长舒缓……稍顷，周恩来总理也走了出来，他们沿着中南海的林荫道边走边谈。

毛泽东望着涤着水面的柳丝，回头问道：“信已经交出去了吗？”“已经

全都交出去了。”11月17日，中国总理周恩来给亚非20多个国家的首脑写了一封长达20多页的致函。

全面阐述了中国政府在中印边境冲突中的原则立场，表达了希望和平解决争端的愿望。

“一边是军事仗，一边是外交仗，都要争取主动。我看打得差不多了吧？”毛泽东问。

“总参送来的报告，部队士气高昂，东、西两线都推进得很快，已经到达传统习惯线，歼灭敌人5000余人，缴获了大批武器装备。”毛泽东满意地点了点头：“基本上是歼灭战。”“为了给和平谈判造成有利条件，我们准备就地停火，部队后撤。”“我看可以，就地停火，退避三舍，我们让他们一点，也看出谈判的诚意。”毛泽东在甬道边的石凳上坐下来，随手又点上了一支烟。

周恩来双手抱在胸前：“这样做在国际上是没有先例的。”“我们做了这就是先例，总要有人先做吧。”毛泽东说这番话的时候，目光平视着远处的红墙。

1962年11月21日24时，中印边境中国边防部队接到了毛泽东签署的命令。

总参谋部用特急电报下发到各部队。电文如下：西藏军区前指、军区、丁指、康指、新疆军区并成都、兰州、北京军区：为进一步争取政治上的主动，中央决定我国政府发表声明，宣布为了促成中印边界问题的和平解决，我军决定于11月22日零时起，主动停火，并于12月1日开始，主动撤回1959年11月7日双方实际控制线的内侧20公里地区。遵此，现将部队下一步行动部署如下：……总参谋部1962年11月21日24时11月21日清晨。新德里。

一队高级轿车鱼贯驶向新德里机场。街头一片冷清，街夫正在清扫街角上的落叶和垃圾。

内政部长夏斯特紧裹着长领大衣，心急如焚地坐在轿车里。他将到阿萨姆邦紧急视察，重整提斯浦尔行政机构，给民众以胜利的希望和信心。他心里明白此行凶多吉少，别说是他，就是总统亲自来，也难有回天之力。

轿车在新德里机场候机厅外面停住了。他们正欲走进候机大厅。

在候机厅门口，报摊前面围满了人，不少人在争购报纸，有的人异常兴奋，互相握手拥抱。

部长秘书是个富有好奇心的年轻人，他走到了报摊跟前。

他看到了一行醒目的大标题：中国单方面宣布就地停火，并将马上撤兵。

他简直不敢相信这条新闻。随手抽了一份报纸跑了回来。

“部长先生，中国人宣布就地停火了！”“停火！”夏斯特大吃一惊，半天没有反应过来。

“我们该怎么办？”夏斯特思忖了片刻说道：“回去，我们先回去。”车队又向新德里市区驶去。

“去总理私邸。”夏斯特对司机说。

汽车停在尼赫鲁私邸外面的街上。夏斯特匆匆走进了客厅。

尼赫鲁一边整理上衣，一边走了出来。

“发生了什么事情？”尼赫鲁问。

“中国单方面宣布停火。”夏斯特将报纸递给尼赫鲁。

尼赫鲁接过报纸，一连看了几遍，看来他根本不知道中国停火的消息。

“他们为什么不打了！”尼赫鲁自言自语道。

1962年11月22日零时。中国军队遵照毛泽东的命令，在中印边界全线停火。

被中国军队包围的印军，大部分不知道停火的消息。包括帕塔尼亚少将对此也一无所知。

11月22日晨，整个战区一片宁静，瓦利少校带着几名印军士兵，拖着饥肠辘辘奄奄一息的身子，在邦迪拉以北的密林中寻找可食之物时，碰上了一支中国巡逻队。

一名中国军官向他们走来。

瓦利少校有气无力地拔出手枪，他的手哆嗦了一下，手枪掉到雪地上。

“你连开枪的力气也没有了。”中国军官捡起瓦利掉在手上的手枪交给他。用流利的英语说：“中国政府已经宣布全线停火。”“这真……真是个好消息，有……有吃的吗？”中国军官将一袋炒面，扔给瓦利少校。

中国巡逻队走了。

瓦利少校双手捧着炒面，凝噎无语。

帕塔尼亚少将在原始森林中已经躲藏了5天5夜了。

天亮时分，他从树洞中爬了出来，扶着树杆吃力地站起来，他身上的最后一点力气已经消耗殆尽，他感到身子轻得如一张纸。

阳光将巨大的树影投到他的脸上，他的脸色惨淡如雪，他看到在不远处的一个山头，一队印军溃兵正在寻找着什么，他们面带喜悦，好像遇到了什么令人高兴的事。

天空中传来了巨大的轰鸣声。一架军用直升机降在林中的空地上。从飞机上跳下来两个印度军官。

路透社提斯浦尔28日电：被中国人在色拉山口切断的印军司令帕塔尼亚少将昨晚被直升飞机安全载抵这里，同一架直升飞机还运来了3名受伤的印度人。

帕塔尼亚将军在山地的丛林里走了5天，没吃饭没喝水，他是在直升飞机紧张地搜寻以后才被找到的。据这里报道，被中国人切断的其他军官和士兵也开始从中国的防线后面奔向平原。

1962年12月1日，中国军队主动后撤。到1962年3月1日全部后撤到1959年9月7日的实际控制线20公里以内。这是中国政府出于保持中印友好关系的愿望，再一次用实际行动表示中国主张通过和平谈判而不是通过武力来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诚意。

中国边防部队奉命将在反击战中缴获的大批武器、车辆进行擦拭维修，将缴获的其他军用物资进行整理包装，于12月中旬交还给印度。

对被俘人员，一律不杀、不打、不骂、不侮辱、不没收私人财物。生活上给予优待，受伤者给予治疗。

1963年5月26日，春城昆明阳光明媚。在昆明机场的跑道上，停着一架印度航空公司的大型客机。

一大批中外记者等候在候机厅的门口。在候机大厅内，中印政府官员和国际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正在轻松地交谈。

几辆大轿车驶到了候机大厅门口。第一个从在轿车上下来的是印军第7

旅旅长达尔维准将，他身穿笔挺的藏灰色毛料西装，脸色红润，面带微笑向记者们摆手。跟在他身后的是几十名被俘的印军校级军官。其中只有一名满脸胡须的印军老兵格外引人注目。他就是第 11 旅的马盗营士兵车隆。

车隆被罗兹中校独自丢在原始森林中，靠树皮苦撑了 3 天 3 夜。一位头部负伤的中国军官上尉连长李荣汉，在水沟里发现了昏死的车隆。

李荣汉用负伤的身子，背着车隆，爬出了原始森林。在山角下李荣汉拦住了一辆中国军队的吉普车。从车上下来的是 54 军军长丁盛和副军长韦统泰。

“报告首长，这里有一名印军伤兵。”丁盛将军走到路边，弯下腰间：“他还活着吗？”“还有一口气。”李荣汉回答。

车隆吃力地睁开眼睛，映入他眼帘的是中国将军肩上的金星。他吓呆了，这是他第一次看到中国军队的高级将领。

韦统泰看了一下手表：“马上用车把他送到后方医院，要全力抢救，告诉院长这是我的命令！”车隆终于活了下来，而且今天将返回他的故乡。

《泰晤士报》记者韦尔娜小姐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

“车隆先生，听说是一名中国上尉和两名中国将军协力救了你的命，对此你有何感想？”车隆显得非常激动：“我当时吓呆了，我不敢相信，神话。”周围的记者都笑了。

“你在中国的感受如何？”“我乐意一辈子当中国的俘虏，他们爱我，我也爱他们，以前我恨他们，那是以前。”达尔维准将被记者们团团围住，他面对记者众多的问题，已不知如何回答是好。

“我想说，中国对待战俘是充满人道主义的，是非常尊重人权和人格的。我已经多次给我的妻子写信，告知她，我在中国很好。我早已肯定的告诉她，我将很快返回印度。”有记者问：“难道你从来没有考虑过中国会不会处决战俘？”“这一点我是清楚的，战前在陆军总部我曾经认真研究过中国的战俘政策，没想到我又亲自尝试了一下，中国不会那样做。”法新社记者问：“您对这场战争有什么见解？”“我不想谈更多的，我们的武器装备胜过中国，训练素质也不比中国差。但是我们谁也不会想到中国士兵会用身体滚过雷区，用胸口去抵枪眼。这是我们无法预料的。还有他们的俘虏政策，如果战前印军士兵了解了这一点，我想他们恐怕比现在更难指挥。”印军战俘鱼贯登上飞机。车隆拥抱着中国医护人员，声泪俱下。站在一边的印度政府官员尴尬的转过脸去。记者们抓紧时机按动照相机的快门。他们知道这种真实场面，不可能是中国政府精心安排的。

达尔维准将最后一个登上飞机，就像面对中国军队的进攻，他最后一个撤出章多一样，仍然保持着他军人的风度和尊严。

他举目遥望了最后一眼中国苍翠如碧似锦如画的山河，心头竟浮起一丝惜别之情。

达尔维准将回国后，曾两次得到提拔。1965 年指挥一个旅，参加过印巴战争。但他始终没有被提为少将。这些都没有影响他在陆军中被公认为是一名杰出的将领。达尔维的重要军事著作《喜马拉雅的失策》对中印边境战争的独特看法，使其成为一部军事名著。

印度国防部于 1965 年发表了中印边境战争中，印度陆军损失的数字：死亡：1383 名失踪：1696 名被俘：3968 名失踪人数大于死亡人数，这的确是一个奇特的现象。如果中国军队推迟宣布停火，如果印度上兵了解中国战

俘政策，那么情况又会怎样呢？在中国军队停火之后，至少有 5000 到 7000 名印度士兵，从原始森林中得以生还。

中国遣返了全部战俘，仅有 26 名印军士兵因重伤抢救无效死亡。中国方面全部附有详细的病历和抢救记录。

停火之后，印军东部军区司令森中将，第 4 军军长考尔中将，第 4 师师长帕塔尼亚少将，几乎同时向乔杜里参谋长提出了辞职。

乔杜里中将批准了森中将和帕塔尼亚少将的辞呈。他劝说考尔到旁遮普邦从事军训工作。

考尔一口回绝了。

尼赫鲁曾劝说考尔不要辞职。他在给考尔的信中写道：亲爱的毕奇：对你的辞职，我感到遗憾。我曾努力劝你不要这样，但是既然你坚持要这样做，我也就无能为力了。导致你辞职的事件是伤心的，我们中间许多人也为此感到苦恼。但是我相信，关于这些事件也不能特别责怪你。有许多人要对这些事件负责，也许这些事件只是由于当时的环境所造成的。

我相信，像你这样一个精力充沛、有爱国心的人是不应该无所事事，不为国家效劳。也许，不久你可以找到这类对国家有用的工作。……你的新挚的贾·尼赫鲁事后曾提议让考尔担任副部长一类的职务。即使这种有职无权，无足轻重的文官闲职，也遭到了强烈的反对。

后来金融资本家特贾博士聘用了考尔，考尔干了一段金融，这一行实在不是职业军人所为，考尔屡试不顺，只好悻悻辞职，从此考尔在军界、政界彻底消声匿迹了。

中印边界战争对任何人的影响都不能和尼赫鲁比肩相齐。

尼赫鲁的个人影响和政治地位一落千丈，不结盟运动几乎瓦解了。他整日病魔缠身，沮丧不堪。公开化的批评和攻击与日俱增，有人公开叫他下台，人们感兴趣的是谁来当尼赫鲁的继承人。真可谓一失足成千古恨。

1964 年 1 月 8 日，在布巴内斯瓦尔召开的国大党年会上，坐在主席台上的尼赫鲁突然中风，左侧瘫痪。1 月 26 日到 4 月 2 日，在征得尼本人同意后，秘密为他的健康举行了宗教祈祷仪式。1964 年 5 月 27 日，尼赫鲁的心脏病猝发，在家中去世。

中国军队后撤后，印军自 1963 年开始，又逐步向前推进，继续侵占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以南的中国大片领土。对此，中国政府仍以维护中印两国的传统友谊为重，继续主张通过和平谈判协商解决中印边界问题。30 年来，尽管中印两国进行了多轮会谈，但由于双方意见分歧较大，中印边界问题仍无长足进展。

30 年过去了，历史已经证明了中国的诚意。历史还将证明多久？喜马拉雅山上的积雪，年复一年，依然洁白。中印同为喜马拉雅山脉的两大文明古国。

当我们立足于世界屋脊，鸟瞰这个风云变幻的旋转球体，中国人民不希望看到来自任何一方的黑色烟尘玷染这座圣洁的冰峰。

中国 5000 年文明的历史长卷，镌刻着这个民族不容侵犯的意志和渴望和平的愿望。

喜马拉雅山上雪，应该永远洁白。

